

正文

《运河南端说码头》编辑委员会

主任：许明

副主任：虞文娟

执行主任：黄玲 谢作盛

执行副主任：董觉华 杨正平 陈展 金凌云

编委：安峰 阮利平 杨于佳 缪承武 杨俊 范勤

杨玲玲 姜晓 黄群 汪剑敏 高原 姬毓华

倪黎玮

主编：许明

编辑：阮利平

撰稿：安峰 曹晓波

采写：陈克 李迪标 汪建中 云森 周笑纹 杨于佳

摄影：金剑奇 王戈 孔顺祥

封面设计：金剑奇

地图说明

此图是清同治年间（1862—1874）的运河南端水系图，图中，从北新关往南至涨江桥河道至今未变。从涨江桥往南，有两股干流。

从正南到左家桥一股，如今已经填埋为湖墅南路，宝庆桥消失。

从东南到德胜坝再到德胜桥（即夹城巷）一段，1958年改拓为主河道。

以上两股水流形成现仓基新村“包围圈”，形成官粮基地的保护。其中标注的“马头”，是粮仓码头，也是康熙、乾隆的御码头。

运河船只从德胜坝翻坝后，过德胜桥，如今的稻香园处是个断头，1958年开通至武林门（杭州炼油厂处）。

此前，不翻德胜坝，在德胜坝北，可进入西粮泊与东粮泊，再入上塘河，但需要翻石灰坝。如翻过德胜坝，在德胜桥（夹城巷）南东拐去上塘河，无需再翻石灰坝。如此，就保证了上塘河“上河”之水的水位。

从涨江桥往西，过卖鱼桥，是去老余杭的余杭塘河。当时桥下之水，通得船只。民国初期，卖鱼桥改为公路平桥，此河不通船只。

左家桥往南有两股干流，一股正南，过万缘桥（今外万物桥），过新河坝，与杭城西城墙外护城河相连。一股向西南，过下宁桥、上宁桥到松木场，是下三府香客水道。

拱宸桥诗会 / 余光中（台湾）

茱萸的重九，不佩茱萸

登高的佳日，也未登高

诗友文朋却来了不少

不上酒楼却入了舒羽的

咖啡雅座，雕花的亭阁

斜对着拱宸大桥，两侧

拱起了陡坡，桥墩在中流

雄踞着蝮，龙生第六

遥望若狮，朦胧得惊人

桥影在窗格子外，那运河

水声滔滔犹似一千多年前

今夕却为现代诗配音
伴着众诗人所诵：空山松子
白玉苦瓜，珍珠项链，三生石
为越海归来的诗翁朗吟
最后是“登高能赋”，欧阳江河
大笔所书赠。座有故人
一甲子后携琴来相聚
先师高觉敷的公子，“文革”劫余
犹守住古琴的穆肃，不让
红卫兵破尽“四旧”，一曲《良宵引》
七弦泠泠拨罢，四座无声
不久继起有古筝，《高山流水》
奏者是好客的女主人
铮铮琮琮，一起一伏
纤手招来了远古的情操
与今夕满座的群贤，成为
钱塘一盛会，也令我晚年
重九未虚度，何况更是
在客中，在亘古的运河声里
2013.1.13

引子 / 邹滢颖	1
上卷 码头年轮	1
洋关码头：四份旧档案的解读	3
漕运码头：破译富义仓	14
驳货码头：翻坝过塘	23
御码头：皇帝老儿泊御船	36
码头之“埠”：斜阳中的北新关	48
客运码头（上）：旧船票与卖鱼桥	61
客运码头（下）：历史上的武林门码头	74
“下乡”码头：小河船话	87
三河码头：激情燃烧的岁月	97
谢村码头：泛政治化的“行为艺术”	107
2012：码头纪事	112
目 录	
目 录	
下卷 码头履痕	119
码头表情	121
码头案件：半山电厂码头的“煤”与“没”	130
码头行当：“五行八作”之外	137
码头青楼：拱宸桥畔福海里	148
码头建筑：姚宅七十年	156
码头作家：“无名氏”蛰居华光桥	167
码头一家亲：两代女子的饭碗	173

码头“小型张”：河埠头 181

撰稿手记：要翔实，也要好看 / 安峰 191

后记 195

运河悠悠

引子.....邹滢颖

一

从梳理杭州的码头文化开始，一点一点摊开文化码头输出的草图，或许这是笔者下笔前的雄心。谈到文化杭州，西湖占了大半，旧城占了小半，至于运河边的码头文化，则鲜少有人去打量去梳理，甚至很多人都不曾意识到杭州人的日常生活、言语性情中沉淀了多少五湖四海而来的因子。举个例子，杭州话专家曹晓波老师曾考证过一个“泊”字，杭州人说，“这回 b6牢你了！”，很多人想不到是用停泊的泊，《康熙字典》中对于“泊”字的释义为“舟附岸曰泊”。在运河南端的码头边，你要是守住了码头，几乎就是逮到了那四处不见踪影的人。这样的杭州话多么具有码头的气息！

所以我们期望这样的气息越来越强烈，强烈到可以一下子让我们泊牢一个未曾照过面的杭州，强烈到可以一把把我们推入一个城的传奇里，让我们从现在出发，从运河边的码头出发，慢慢地去看一个古往今来的杭州。

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运河，自公元前 486 年始疏凿，至公元 1293 年全线通航，陆陆续续共建造了 1779 年。运河南端的码头文化便滥觞于此，我们这部谈论运河南端码头文化的小书，便也起笔于此。

中国自然水系的流向多是由西向东，因此南北向的水路交通十分不便。正是南北大运河的贯通，才将大半个中国变成了一个个“丰”字相连的版图。“丰”是大运河写出来的华章，在运河两旁的大码头上，舟楫相交，人烟繁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大运河为便利南北交通，沟通南北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史称“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流金淌银的运河促成了沿岸城市的繁荣，自北京而下，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至宁波，这些大码头都如运河上的明珠，折射着千年和缓积淀的水缘文明，熠熠生辉，璀璨夺目。那一段一段地被无数隔世的劳力连接起来的大运河和北方著名的万里长城一起，用泥土和水勾画出的巨大 T 字连接支撑起一个文明对安全和繁荣的梦想。

大运河漂出了一个紫禁城，杭州却比北京更早仰赖着大运河，由此衍生出的运河文明有盛有衰，但从未被中止。

唐代承袭并发展了隋朝给杭州所奠定的基业，“江南列郡，余杭为大”；五代时，钱王使杭州“富庶于东南”；北宋时，杭州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正是“天下转漕，仰此一渠”的大运河保证了杭州的物流。据称，在北宋时期，每年通过运河由江南运到开封的粮食，多达五百万至八百万石，其余金银布帛、香药、茶叶等物品不计其数。当时杭州城内的茅山河、盐桥河、菜市河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大运河相通，成为沟通城内物资交流、保证城内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的重要渠道。杭州民谚有云：“北门米，南门柴，东门菜，西门水。”有什么样的货物就有什么样的码头布局，这样的特征一直影响到了后世。

南宋时期，杭州成为中国实际上的首都，同时也是一座世界性的城市，一座以江河湖海接纳世界的大都会。时人论曰：“国家驻蹕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巨舰停泊的地方，形成码头最后甚至成为市镇，这样宏阔壮丽的场面，堪称运河南端码头的黄金时代！

元代以后，因为杭州城内外的运河河段年久失浚，商业一度萧条，后虽曾两次大浚诸河，但浚而不深，河水仅深3尺，尚不及宋代深度的一半，漕运能力因而随之递减。不过，尽管城南的商业不振，但货船麇集的北关拱墅一带，依旧享有十里银湖墅的美称。

明清时代，朝廷执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因此南北水运完全以运河为主。统治者充分理解大运河对杭州的重要性以及江南对北方的重要性，因此多次治理江南运河，当时称下塘河。经过疏浚，杭州城内才真正形成了4条主干河道及联系运河的城内水系。清朝中叶以后，在黄河改道、帝国主义入侵强迫中国开放港口、汽轮和铁路的引进、大运河年久失修等诸多因素的重重打击下，大运河上的漕运近乎停顿，大运河几乎成了一条死河，运河杭州段也便随之暗淡，码头工人的日子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淤塞了103年的大运河，经过彻底疏浚，再次全线开通。天津到杭州间的河道一律挖深加宽，全线可通行2000吨的机动驳船和船队；同时一部分河道被裁弯取直，使原长1782公里的运河缩短为1583公里，并且直接通至钱塘江，船舶可以经过船闸来往于钱塘江和运河之间。杭州的血脉又一次畅通，运河南端的码头也再一次焕发生机。

在杭州境内的运河，由北向东贯穿全城，起自余杭县博陆镇东，终点原在德胜坝，1969年下半年开坝延伸3.95公里，至艮山港止，全长42.24公里。1983年国家决定再度延伸，开挖6.97公里新航道，并于是年11月动工，终点移至三堡船闸。近50公里的运河两岸留下数不清的驳岸、码头、船坞、桥梁、民居、仓库。在运河进城标志拱宸桥一带行走，或坐小客轮沿途浏览，一路上的码头河埠、烟水苍茫，见证着城市变迁的沧桑。

二

那些镶在市内运河南北两头的码头，按照功能主要分为客运码头、货运码头和官码头。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言，城北码头的发展要稍晚于城南码头。但从宋代开始，特别是南宋以后，城北码头的发展势不可挡，最终造就了杭州最出名的米市，以及“湖州市”，也就是杭州人后来谐称的“湖墅”。可以说，一部完整的杭城商业发展史，就是运河南端码头的成长史。直到民国初期，运河南端仍然支撑着整个杭州的商品经济，这一“支撑点”，就是船埠和码头。将拱墅的“码头文化”追溯梳理，钩沉索隐，对于运河的“申遗”工作意义重大，读者既能从这些篇章中了解运河南端码头的历史文化，同时也能享受到优美流畅、逸趣横生的“悦读体验”。

码头是利与义充分纠缠的地方，也是市井文化高度繁荣的所在。它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秘密，有自己的情义，有自己的血泪。当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交易流通的时候，当五湖四海的人们在此谈天说地的时候，无数呢喃的耳语像蝴蝶的翅膀，慢慢扇动出一个一个有关财富、梦想、爱情的风暴，有人因此暴富，有人在此潦倒，有人迷失，有人获得。运河南端的码头，它向我们摊开的是迥异于西湖的世俗文化。它更接近生存，更接近来自底层的声音，它让西湖边踩着云头的众生落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市井生活中。

码头文化的现实性就如白话小说之于诗词，它没有掩饰，充满市声，它有小人物的活色生香，也有大人物的起伏跌宕。码头边的居民、商家、苦力为讨生活终日劳碌，但他们的背后却有着幕天席地的信息源，这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另一种广阔：新货源、新时尚、新知识、新生活、新天地，他们知道得最快，也因此改变得最早，新与旧在码头上的交锋是改变一个城市面貌的巨大推手。

当我们用心梳理运河南端一个个码头时，我们牵连出了它们边上的仓库、商家、船舶、堤堰和市镇，同时也展示出码头特有的制度、风俗和传说。

城北的码头有一些迷人的遗迹，比如洋关、米市、德胜坝、富义仓、老字号、沿河吊脚楼、御码头等等，有些早已消逝，有些还有模糊的遗存，有些则进行了合适的保护，它们身上积累了太多的人文和历史，积累了一代又一代拱墅人的心血与智慧。现在，我们在运河的码头边，已经能看到和码头有关的博物展览、创意创新产业、原生态民俗、艺术创作和通过

大量田野调查积累出来的文字和图片，余光中等文化大师也已陆续“登陆”运河南端的码头并留下了相关的闪光文字，我们正在从码头文化的探寻进入到文化码头的价值输出。由于拱墅区一贯对于文化工作的重视，“文化码头”这一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拱墅这片运河南端的风水宝地，定会落地生根。而《运河南端说码头》的撰写，正是为拱墅“文化码头”打下的一块系缆石。可以说，拱墅的运河文化研究，已经进入了方兴未艾的新航程。

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眉目，那么运河就是杭州的血脉。血脉充和则眉目灵秀。暗黑的运河哺育了杭州，明丽的西湖成就了杭州。说杭州离不开跑码头，杭州站在明暗之间，泊在江河湖海，塑造着千年生生不息的影像。

上卷

码头年轮

洋关码头：四份旧档案的解读

引子

“与人相比，东西的老化则要缓慢得多。一部古老的小说或者一顶丝绸小伞上面最多只会积些灰尘，而拿过这部小说或者撑过这顶伞的那只手却早就腐朽了。事情总是这样的，难道不是吗？”

托马斯·霍利曼的《四十朵玫瑰》开头部分的这段犹如启示录般的箴言，与我们研究与思考洋关的起点不谋而合。洋关又称“商检码头”，其准确表述应当是清末民初时期杭州地区征收进出口贸易税的全权职能机构。当年那座英式券廊红砖建筑的旧址现为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但旧建筑只是个躯壳，即便在里面呆上三年，也无法还原它当年的精气神。《杭州府志》关于它的记载，也只是一堆年月日和冰冷的数据，没有温度，没有血肉。于是，我们转而走进曙光路45号，借助浙江档案馆馆藏文档去叩问洋关。

我们选择的四份文档分别是一份医生证明、一份轮船公司报告、一份领事来函、一份1898年洋关员工工资单。这些材料中，有内部资料也有旁人佐证，甚至可能还残留着当初某位襄理掸落的零星雪茄灰。当这些材料呼吸到21世纪空气的时候，只会感到陌生与茫然，因为属于它的那个时代已经消失。它现在的使命是吐露真相，可是离开了所属时代的材料，就像是被从庞大机器上卸下的一颗螺丝钉，必须返回那个产生它的时代——回到那个温暖的子宫，它才会记起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一、医师证明

1896年的圣诞节，英国人李士里过得十分惬意。洋关开辟三个月了，贸易总货额关平银4060两，税收工作一帆风顺，他这个洋关首任税务司自然脸上有光。关平银是清末海关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是所谓“虚银两”中的一种，其功能类似于筹码。因为当时征收进出口税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各地实际流通的金属银重量、成色、名称不一致，折算困难，所以才有了统一标准的关平银。征收关税时，可以依照当地虚银两与纹银的折算标准作出兑换。

开埠后进口的商品中有一种“洋药”，这个名字有些欲盖弥彰，老百姓喜欢称这种褐色的精怪为乌烟或大烟，也就是“鸦片”。

1858年英法与我国签订的《天津条约》附约规定：“鸦片改称洋药，可自由买卖及进口。”披上了合法外衣的妖精在中国的土地上走动得勤快。杭嘉湖道台邹渭清作为洋关监督，给每箱自洋关进口的鸦片发放3两8钱的津贴，有人对此迷惑不解，认为道台大人昏蒙愚昧，但无利可图，他发你津贴，有这等好事么？津贴的背后其实是利益之手在较量。离杭州不远的宁波，开埠比杭州要早，鸦片战争后进浙江的鸦片都走宁波关口，进口鸦片为宁波带来丰厚的关税收入。杭州洋关开设后想要改变鸦片进口路线图，只有抛出肥硕的诱饵。这一招果然有效，烟商本来报宁波“浙海关”进口的鸦片，纷纷改报“杭州关”进口。杭州发放津贴，看似减少了洋关关税收入，但每箱鸦片110两的“货厘”可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两下一

算，洋关认为并不吃亏。不过鸦片害国人太久太深，它的“好运”即将走到尽头，武昌首义为驱逐鸦片扫荡烟毒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契机，此后洋关不允许再进口鸦片。

不过，与乱世宜用重典的道理相同，对付流毒甚广的鸦片，仅仅使用外科手术式的精确切除，已经不足以使它彻底根绝。1912年9月，浙江军政府多管齐下，颁布禁止种植、营运、销售鸦片的法令。军政府扯下了

“洋药”的遮羞布，直接将鸦片定为毒品，不但在官方机构设禁毒专员专司负责禁毒事宜，同时也鼓励民间成立“除毒协会”，官民一体对付鸦片。但即便如此，仍有一部分鸦片烟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通常由上海经水路流入杭州。

那些心怀鬼胎的船夫或乘客用各色包装与障眼法试图蒙混过关。洋关方面此时要积极配合都督府与杭州县知事的命令，对任何私带烟土的不法之徒张网以待。即便如此，禁烟的艰难与繁复仍然出乎众人意料，这当中既有顶风作案执迷不悟的购烟者，在禁烟高潮期仍然去俄国烟商处购烟，也有在禁烟令颁布数十年后，依然点起烟灯，端起烟枪，睡上烟榻，不肯放弃的人。

洋关由于之前与鸦片有着纠缠不清、牵丝攀藤的关系，于是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来撇清瓜葛，因此洋关对于关内职员是否染指鸦片一直十分戒备。洋关职员虽然也分三六九等，但任何一级的职员只要染上这等癖好，就都有可能与外界串通，成为里应外合走私烟土的蛀虫。即便职员只是私自吸烟而不从事其他不法勾当，这种行为也将使洋关威信大打折扣、形象蒙受损失。那么如何让关内职员不碰鸦片不染毒瘾？仅仅依靠自律显然是不够的，要对潜伏于内部的瘾君子实施惩戒，必须有一套缜密的排查措施以曝光其行为。洋关自查的证据来自1936年7月海关文档，杭州医师叶百泉所开证明：

本医师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四日及九日先后应贵税务司之请检验贵关全体员役（名单附后），查所有被检验人员均无吸食鸦片及其他烈性毒品之嗜好。特此证明。

此致

杭州关税务司

医师 叶百泉（印章）

民国二十五年是公元1936年，此时距民国政府颁发禁毒令已有二十余年，而洋关却依然在检验清查关内职员是否有毒瘾在身，说明这项措施应有相当长的延续性。

二、松村来信

1936年2月，战争前夜的杭州洋关仍然一片忙碌。作为商检码头，洋关仍然在发挥作用，而它的税务司也依然是外籍人士。1935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刚刚过去两个月，运动余波未尽之时，一份寄给石塔儿头杭州驻日领事馆领事松村雄藏的物品，滞留在了杭州洋关。

这份物品在洋关每天大宗进出货物中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为了这小得微不足道的东西，松村雄藏领事亲自致函给卢税务司，请他为物品免税放行提供方便。不久，这份信函就抵达了税务司办公室的案头，此信写在19.5厘米×26.5厘米的红色竖条信纸上，字体工整，用词谦恭，显示出兼有“菊与刀”双重性格的大和民族“菊”的一面：

迳启者：

兹有敝国寄来包裹两个，一系豆沙糕，一系卫生衫及拖鞋等；均系敝国领事自用物品，请烦贵税务司放行。至纫公谊。

此致

杭州关税务司卢

附包裹清单二纸

松村雄藏谨启

二月二十五日

这份编号 186 号的公函档案透露的信息耐人寻味：

第一，信上优美流畅的手书字迹说明日本领事松村对于汉文化十分精通。因为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恐怕无法使用出“至纫公谊”这样措辞典雅讲究的书面用语。其中“纫”字表示“深深感激”，这类礼貌用语一般只在老派文人的书札里才会出现。

第二，这封公函反映了洋关码头处理公务时态度严谨刻板，其在操作规程上的一丝不苟，可能出乎一般人意料。虽然两只包裹并不值钱，而且是寄往作为外交机构的日本领事馆之物，但没有日本领事本人出具的证明材料，要洋关免税放行几无可能，这证明了洋关杜绝法外操作的措施之严密。请注意落款处的日期，二月二十五日时值初春，也幸好是这个季节，如果恰逢盛夏时节，包裹中的豆沙糕经过长时间滞留，恐怕早就腐败变质无法食用了。私人用品是这样的待遇，领事馆寄自日本的办公用纸也遇到同样情况，必须由领事本人出具信函，洋关才准予放行。公也好私也好，洋关与领事馆之间似乎并没有某种约定和默契，可以方便到免除一切相关手续。而洋关的旁边，就是日租界。

四个半月以后，为了一只寄给松村的“青蛙”，松村本人再次致信洋关：

迳启者：

兹有敝国京都鄙人知友画家竹内栖凤氏寄来戏作纸画一页（系青蛙一只），大小约计一尺四分，作为包裹寄来现已到杭，在贵国邮局。此件系竹内氏美意见赠，并无商品性质，相应函请：贵税务司特予免税放行或减轻税额。至纫公谊。

此致

杭州关税务司卢

附税单二纸

松村雄藏谨启

七月十一日

包裹“在贵国邮局”，点明了洋关与邮局之间的亲密关系。最早创办大清邮政浙江局的那个英国人，正是身为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洋关与邮局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仿佛亲生兄弟一般，所以洋关的某些包裹物品存放于邮局，其实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顺理成章的举动。松村信中提到的京都画家竹内栖凤，时年七十二岁，绘画技艺融贯东西，但在政治主张上却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甚至进行义卖为日本军部筹集捐款，不遗余力地为其扩充武器装备提供支持。因为竹内栖凤寄来的是画作，不是普通的私人用品，松村吃不准洋关是否会为他免税，所以措辞婉转而留有余地，在请“贵税务司免税放行”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或减轻税额”。由此可见洋关并未给领事大人提供任何特权待遇，洋关的“游戏规则”几乎不为任何人松动。

现在已经很难设想松村本人对此的感受，他与洋关的交集在第二年 8 月彻底结束了。1937 年 7 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苏杭地区的日本侨民纷纷撤离，驻杭日本领事馆也在 8 月初下旗撤离。同年 10 月，洋关职员撤出拱宸桥洋关，去往温州某海关。关于他们撤退的线路与时间说法不一，另有相关资料显示他们于当年 10 月 20 日“奉命撤退到金华兰溪，后又退至安徽徽州，并告遣散”，也有资料说他们是 12 月份才走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返回洋关。而且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撤离计划的正确，如果他们坚持不走，幻想与日本人和平共处，那么日后的命运将与滞留上海租界的英美侨民一样悲惨。那些侨民在上海十平方英里“孤岛”内度过了短暂的平静岁月，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大批侨民失去了人身自由。日军查封了码头，扣押了数百条英美商船，侨民们上街则须戴上有本国国名缩写的红底黑字袖章（如英国为 Britain 的缩写 B）。后来侨民们更是被关入集中营，在地狱般的集中营里苦苦煎熬自生自灭。

松村与洋关的交集虽然在炮火中断绝了，但日本人与洋关的“缘分”却迟迟不肯中断。杭州沦陷期间，日本人对洋关这几幢式样考究的英式券廊建筑“兴趣浓厚”，将其占据为宪

兵队驻地，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三、公司上书

如果单纯地观察洋关严谨的规章制度与一丝不苟的执行力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洋关是个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的机构。现有种种材料表明，晚清诸多政府机构中，大清海关是最为廉洁高效的，而在总税务司对于海关的远景规划中，海关稽查只是其中的一项功能。赫德更希望海关借助其整体运作的高效性和严密性，能够有更大的作为，最后使海关机构膨胀，犹如一个小政府，影响到晚清政治的整体格局，进而推动整个中国的变化。这个庞大的计划，既有异想天开乌托邦的一面，也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根据洋关附近原住民的回忆，洋关很可能设有牢房，甚至还建造了关押重犯的水牢。虽然这一说法缺乏原始资料证实，但赫德计划中的海关的确拥有审判权与司法权。

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于妙青与1963年出生的于康明是一对父子，二人同为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后勤科职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住在二院的职工宿舍，也就是大家口耳相传的“洋关牢房”。那是四幢田字形布局的青砖平房，于氏父子住其中一间，房屋仅开单门、单窗，面积约12平方米。房子狭小阴暗，潮湿而寒冷，一到梅雨天水门汀地面与墙壁就潮气汹涌、潮迹斑斑；屋内放置一张三尺大床和一张小床，一张用餐小方桌，再没有转身的空间。“牢房，这里当过洋关牢房的！”那是于康明的父辈与其他老人当年时常会提及的字眼，但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讨论。洋关办公楼距离最近的那幢平房，顶多也就50米。

这里真的是关押走私犯或扣押货物的场所吗？人证物证大多已经湮没无存，但是以洋关的规矩森严，会设有这样的牢房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杭州的洋关码头存在了41年，有一条规矩令当时所有的轮船公司印象深刻。为了规范航线，方便缉查，洋关方面严格规定了由上海到杭州的航行线路必须从黄浦江南面出发，经闵行、松江、枫泾、嘉兴，再由运河抵达杭州拱宸桥关口。“如果查有私自改道者，应将船货充公”，这在《苏浙沪通商章程》第二款上标得十分清楚。

这样的条款给使用重载船只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沪杭两地往返的运河一线，是杭州进出口商品的必经之路。按照洋关的既定航道，轮船要走石湾石门区块，但是当地河道淤积非常严重，到了冬季枯水期，河水干涸，不但重载船只止步不前，连轻型轮船也不敢轻易冒进。船老大情急之下，只能改走平望、乌镇和新市一线，但是这种偏离既定航道的违规操作一旦被人拿获，就可能受到“船货充公”的处罚。轮船公司方面虽然事出有因，但处理方居高临下有章可循，交涉中轮船公司肯定处于下风，即便可以疏通关节，取得谅解保全船货，但为此牵涉过多的精力财力，也是得不偿失。

当时的源通公司就是受洋关航行路线限制而陷入左右为难境地的公司之一，为杜绝后患，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源通公司决定上书洋关税务司。他们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即风闻国民政府财政部会同苏浙沪三口税务司，可能对通商章程进行修改的当口，“仰恳我税务司将敝公司等绕道必经之路，如平望、乌镇、新市添入沪杭航线，预备石湾石门水浅时改走”

。请求将允许绕行的航线白纸黑字地载入章程条例，给轮船公司吃下定心丸，让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绕道而行。否则他们就不得不永远像偷吃禁果的孩子一样，名不正言不顺，在不合理但具有强制力的章程面前抬不起头。

四、工资单

外籍人士管理的杭州洋关，文档里时常出现中英文杂糅的情况，甚至在英文关税报表的边线处，还会出现由下至上写的《千字文》：“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千字文》是国人的启蒙读本，很多人都能倒背如流，于是那一千个字便被权充作排列顺序的序号。

1898年7月的一份洋关工资单上就体现了这种中英文并存的现象，其中所有员工无论职

务高低，其名字均以中英文双语标注。

洋关内等级分明，收入差距很大。工资单上人员构成分作四块，一是司徒安等雇员，工资最高 45 块银元，最低 12 块；第二是屠顺金等熟练工，工资最高 8 块，最低 4 块；第三是官方雇佣的仆人，包括听差李章生，码头小工李阿七、蒋阿秀等，工资最高 7 块，最低 1.55 块；第四是沈载璋等邮局职员，工资最高 25 块，最低 3.5 块。

那一时期，洋关与邮局好比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所以邮局工作人员的工资也造在洋关的工资单里。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作者陈明远先生对清末民初货币币值的研究，当时一个银元（俗称“龙洋”）的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 2002 年的人民币 70 元。

结语

放下这四份文档，一个固执而沉默的影子，一直在泛黄的纸页里晃动不休，那就是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爵士（1835—1911）。正是他，主导了近代中国海关的运作模式，那是个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工作狂，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权倾一时但晚景落寞。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评述：“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管理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

洋关之后，杭州海关的情况又如何呢？《杭州海关志》（2003 年 6 月版）记载：1942 年 9 月 15 日，“杭州关”裁撤。新中国成立后至 70 年代中期，杭州地区海关业务由上海海关派员前来办理。1979 年 1 月 2 日，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

在我们解读的洋关四份文档之外，实际还存在着陈列在蓝天之下随时供人阅览的第五份文档，即现存于市二医院的三幢英式券廊红砖建筑。果戈理说过，当歌曲和传说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建筑也有自己的情绪和语言，有它们独特的表达，但是对于它们的解读，就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洋关 2012 年实景拍摄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

罗伯特·赫德

洋关界碑

漕运码头：破译富义仓

一、谭钟麟：漕粮是大事

1880 年 8 月，浙江巡抚衙门主人更替，权杖交接，湖南人谭钟麟接替梅启照，成为新一任巡抚大人。到任之后他立即操办了两件事，一是重修文澜阁，二是建造富义仓，这两件事皆值得细细考究。观察一个官员的政治智慧，在他上任之初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在千头万绪的纷繁事务中，他要像精通岐黄之术的老郎中一样，理清事物的头绪和轻重缓急，急病急治，慢病调养，这需要良好的大局观与精准的算度。

这一年谭钟麟 58 岁，久经官场历练，他开局走的两步棋一虚一实，用意都很深远。下令重修孤山脚下的文澜阁，看似只是修复一座被太平军毁坏的皇家藏书楼，但它的象征意味却极为强烈，它代表着谭钟麟要在浙江恢复王道秩序，重振世道人心。文澜阁既为皇家所有，这项工程相当于国家级工程，消息上达天听，也就触摸到了中国权力的中枢神经，它力扫衰颓的皇皇气象与“同光中兴”的大气候相吻合，这一点足以让慈禧太后龙颜大悦。这项工程进展很快，修复经费于 1880 年 9 月划拨，次年 3 月文澜阁就重修完工，式样上仿照了宁波的天一阁。

相比而言，选址霞湾巷开建漕运粮仓“富义仓”，在影响力上不及重修文澜阁，但实用性更大。那么它所牵连的漕粮的重要性，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呢？历史学家茅海建教授的研究结论是：“清朝北方缺粮，京师每年需漕米 400 万石，就某种意义上说来，漕运是京师的生命线。浙江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三分之一，关系不为不大。”浙江漕粮由杭州至镇江段的江南运河出长江，经扬州北上抵达京师，再运往北京通州各粮仓。这些珍贵的漕粮，第一要满足王室所需，第二要用作王公百官的俸米，第三要作为八旗官兵的口粮，这几项供应，哪一项耽误得起呢？

漕粮运抵京城，由北京和通州的 15 座粮仓收纳，简称“京通十五仓”。漕运码头的官员心态，印证了漕粮地位的举足轻重。王梓夫的《漕运码头》就写到了这样一位官员：“到（通州）大运西仓就任之后，他才明白这官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说，大运河是朝廷的命脉，那么漕运码头就是朝廷的心脏，而京通十五仓就是为心脏供血储血的脾胃肝肾。他知道自己责任的重大，更知道这里是一眼不见根底的深井。他是站在井沿上摇辘轳打水的人，如果不小心，水打不上来，不是井绳断了水罐掉进水里，就是自己一头栽进井里。”

长久以来，人们称京杭大运河为“铜帮铁底运粮河”。粮食，特别是漕粮，是大运河运输物资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所以运河别称运粮河。当然，运河上运输的粮食并非全部由南向北运往京城。史料显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这些地区的稻米由长江入运河，再南下分销到运河沿岸各地，这样一来，大运河沿岸的粮食供求就存在着一种双向调节的关系。多少年来，杭州老百姓日常消费的稻米，有不少就是由湖州方向的粮船运送而来，湖墅一带还出现了热闹的米市。“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这首流传于南宋时期的古老歌谣，标明了杭州北部地区在城市经济格局中的代名词：米。

正因为漕粮征运在晚清地方官员工作计划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谭钟麟的增建粮仓之举，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果再深入一步，考察当年波谲云诡的政治态势，谭钟麟在漕运问题上务求谨慎、步步为营的态度，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万一在这类关乎政治大局的问题上出现闪失，不需要其他利益集团的指摘攻击，官员自己就不推自倒了。而谭钟麟当年面对的政情，完全可以说是变幻无常的。

首先是宫中局势极不安宁。在谭钟麟到任浙江巡抚的当年，慈禧太后病情严重，已经到了御医束手的地步，光绪帝不得不下令各省督抚举荐名医来京为太后诊病。就在谭钟麟到任的第二年，富义仓开工以后不久，1881 年 4 月 8 日晚 9 时许，东太后慈安在宫中暴病身亡。因为病程短死得快，上午发病晚上亡故，社会上议论纷纷，不少人怀疑是西太后慈禧为了独揽大权，故意害死慈安。慈安一死，本来慈禧、慈安、恭亲王奕訢三驾马车并行的格局，陡然变成了两雄并峙，而慈禧和奕訢一向面和心不合，以后的政坛走向会有哪些变数呢？

其次，谭钟麟所要驾驭的浙江政坛也并不平静。三年前杨乃武小白菜冤案引发的官场地震并未完全平息，诸多官员因为在此案中渎职被摘掉了顶戴花翎。到了此时，这场重大的政治风波仍令浙江大小官员心有余悸。

面对政情变幻，谭钟麟使出高超的闪转腾挪功力，处理政务滴水不漏。在霞湾巷的粮仓落成当年，谭官升一级，由浙江巡抚调任陕甘总督。粮仓名字“富义仓”，由谭临行前命名，将这座粮仓与附近的另一座粮仓，江涨桥东北侧的“仁和仓”的名字加以联系，相互映照，题为八个大字：“以仁致富，和则义达”，使粮仓的名字充满了政治家十分看重的道德劝诫色彩。谭钟麟还请惯于操弄笔墨的应宝时撰写了《新建富义仓记》。据任轩先生考证，从富义仓南门进入，迎面小亭乃当年立碑处。当年，一只硕大的石龟驮着一块两米见方的石碑正对着河，碑上所刻，正是应宝时《新建富义仓记》。可惜 2001 年之后，碑与龟均不知去向。

应宝时于 1884 年撰写的《新建富义仓记》，似乎将建仓的来由表述得十分清晰，但是如果对碑文的因果逻辑链加以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巨大漏洞。不过，这份看似平常的历史文献，恰恰为我们索解建仓背后的玄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应宝时：笔下有疏漏

按照应宝时的碑文描述，可以把谭钟麟下令建造富义仓的动因概括为一句话：“购得粮食无处放，速造粮仓来储藏。”应宝时称谭钟麟当年孳孳以时粮为急，令绅士出资购谷 10 万石，分储旧有两仓廩，“不足则增之，仍不足则购衙（霞）湾民地口材而创建之。”请注意应宝时文章的两层逻辑关系：第一，杭州粮食告急，谭大人请城里士绅出资相助购粮；第二，购买的十万石稻谷在旧粮仓里容纳不下了，只能迅速扩建旧粮仓，但是稻谷太多仍然不够存放，所以要到霞湾巷买地备材赶建新粮仓，使那批稻谷有个容身之地。文章最大的逻辑错误，就出现在第二层逻辑关系之中：富义仓开建于 1880 年 12 月，竣工于 1884 年 7 月，工期长达三年零七个月，那批可怜的稻谷为了能够入库，进入它们的新居，要苦苦等待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才行！当今我国粮食储备的标准年限是：稻谷两年，小麦三年，可是当年那批稻谷必须先熬足三年七个月才有地方给它们住，它们熬得住吗？它们是不霉不烂的金刚不坏之身吗？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它们在翘首企盼的三年零七个月当中，并没有穿上隐身衣从人间消失，它们需要一个暂时过渡的场所，保证不受风吹雨淋，这个场所又在哪里呢？如果的确有这个场所，那么应宝时应当称稻谷“另择地而储之”，现在为何跨越式地直接跳到建粮仓了呢？粮仓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以造房建舍的方法解决稻谷迫在眉睫的储存难题，则是缓不济急。即便在建筑技术先进发达的现代，如果出现粮食急需入库的情况，也会采取租用空房保证过渡的应急措施，而不是到建材市场购买材料开建粮仓，更何况在清朝粮仓的建造工期那么漫长，等房子造好，黄花菜都凉了！

追根溯源到此，另外一个致命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应宝时所谓买来稻谷却发现粮仓容量不足，“不足则增之，仍不足……则创建之”，为何要事到临头才发现粮仓容量不足呢？容积计算并不复杂，为什么会在计算上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呢？这一连串的问题，迫使我们回到原点进行思考，这个原点就是：谭大人建造的粮仓是一所漕运粮仓，建造它是为了存放漕粮，只要我们理清了漕运的种种环节，就能寻找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应宝时笔下的逻辑漏洞，也就能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了。

还是让我们从头梳理吧：

碑文中应宝时称谭钟麟“孳孳以时粮为急”，孳孳通孜孜，是勤勉的意思，勤政的谭钟麟当时究竟为什么要为粮食问题着急呢？查阅《杭州府志》、《浙江续通志》等文献，均无杭州在 1884 年发生粮荒而开仓赈灾的记载，所以这里的粮食之急绝非民间缺粮，而是将要运往京师的漕粮的征收工作中出现了重大缺口，需要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谭钟麟采取的应急措施是让杭州士绅为漕粮买单，以民间富户出资的办法购买稻谷化解危机。漕运条例明确规定：“粮数不足，米色不纯者，罪之。”民间的义举为政府分了忧解了难，政府此时应积极筹备将该批稻谷检明成色，装上漕船，保证当年漕粮征运足额完成。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谭钟麟深感粮食储备不足会带来大麻烦，粮库空虚使得漕粮供应捉襟见肘，遇上荒灾等突发事件更会应对无力，引发社会动荡。粮食形势不容乐观，谭审时度势，下令购地备材，开建粮仓，以确保“库有余粮，心中不慌”。

在梳理了以上逻辑链条之后，富义仓建仓的动机变得清晰，那批稻谷的去向也就昭然若揭。这些稻谷本来就是为了应急而购买，官员们迫切需要它们来补足漕粮数额，求得心安，而不是超出粮仓容量的多余之物，需要眼巴巴等待三年零七个月后落成的新粮仓来为它们遮风挡雨。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分析应宝时笔下的逻辑漏洞了：应宝时下笔之际撷取了建仓的逻辑因果链上的起点：“漕粮告急，谭钟麟令民间购粮化解危机”，同时他把建造粮仓的直接起因，归结为旧粮仓不够存放这批粮食这一虚假前提，而对逻辑链上应有的其他环节避而不谈或忽略不计。应宝时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是笔墨功夫欠精么？恐怕未必，巡抚大人看中的笔杆子，文辞清通流利是基本要求，应宝时乃道光年举人，做过上海道台，撰写此文时的两年

前刚刚为胡雪岩兴办钱塘江义渡撰写过碑记，文笔十分娴熟。应宝时撰写《新建富义仓记》时，很可能是有意避讳，省略了那些应予交代的环节。如果文章把粮库空虚、漕粮紧缺的事实铺陈得过于详尽，只会给他人留下漕粮征收不力，官府疲于应付的印象，与碑文颂扬谭钟麟功绩的主旨有所偏离，说不定还会招来巡抚大人及其幕僚的怪罪。漕粮征运重大而敏感，多年混迹官场的应宝时不会不知其中利害，落笔时多言不如少言，开一个头一笔带过，立即转入主题最为保险，这恐怕是碑文出现逻辑断层的根本原因。

从 1884 年富义仓落成启用，到 1901 年光绪帝下令终止漕运，富义仓为漕运效力的时间只有 17 年。富义仓占地 10 亩，共有 4 座粮仓、80 间廩，可容四五万石稻谷。所谓廩，就是储存漕粮的屋舍，也是粮仓的主要计量单位。修建这么一所看起来并不复杂的粮仓，为什么要耗时三年零七个月之久呢？红顶商人胡雪岩家占地 10.8 亩的“江南第一豪宅”也只不过建造了三年时间便告竣工，造粮仓需要那么漫长的工期吗？这是因为粮仓的设计和建造有诸多讲究。建造富义仓的第一手资料现在已难以寻觅，但是比照京通十五仓中大运西仓的建筑样式和工艺，我们大致能推测出富义仓建设的相关细节。王梓夫的《漕运码头》里介绍了大运西仓仓廩格局：“每座仓廩为五间没有隔断的大房，三面是墙，正面敞开。廩顶有开气用以调节内部的温度和湿度。廩门及墙下均开窠穴，以泄地气。”廩房内部与地面的布局则更加细致：“地面先铺上尺余厚的细沙，细沙上面埋方砖，方砖上再用杉木垫底。廩房四壁则是樟木，可驱虫防腐。”只有这样周到细密的布置，才能最大限度地为漕粮存储杜绝后患，保证质量。那条漕粮条例，像高悬头顶的戒尺，时时敲打着主政者：“粮食不足，米色不纯者，罪之。”

三、廖寿丰：重任在肩

清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的一个深夜，霞湾巷富义仓码头夜色蒙蒙，河面上密密地停泊了 20 艘黑色大船。

那大船扁浅宽大、方头方艏，每一艘船的建造都需要耗费“新杉篙木六十二根，松、樟、榆、槐二十余段，油、麻、铁、炭等料三千余斤”，而板缝较大处皆用麻丝、桐油、石灰调制填塞，铁钉则用桐油和石灰调制后封堵以防锈，船体还细细地刷了几层桐油。

浙江粮道廖寿丰站在码头上，眉头紧锁。入冬后的杭城，夜晚霜寒露重，外罩一件厚重的貂子毛大衣也抵不住寒意。朝廷历年漕运定限十月开仓，十二月兑毕，今年的漕粮今日必须发运。

由于法军突袭马尾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海运瘫痪，朝廷复又将漕运重头移于运河水路。他在岸边独自踟躇，竟想到了前人的一句话——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年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明史》）。廖寿丰心中一凛，觉得怎能在此时想到灭亡者的哀叹，不禁暗中懊恼万分。

夜色中，几十个松油火把照得河面亮堂无比。富义仓的储粮房内，十多个壮汉忙个不停，稻谷一入麻袋，立即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层层从里间递到外间，再递到挑夫肩上。一众挑夫肩扛手提，腊月里穿着麻布单衣都汗流浹背，却仍是腰不松手不晃，脚下的步子稳稳当当，从仓廩到码头再到船上，无一不有条不紊……船工背的米袋差点蹭到廖寿丰的官服。虽然船工的汗味不那么雅致好闻，他们的活计也十分累人，可是廖寿丰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比自己活得自在。自己要为漕粮担惊受怕，心头的秤砣沉甸甸无法随意挪去；而船夫在卸完背上的全部麻袋以后，就可以无事一身轻，一壶浊酒半斤牛肉的一顿饱餐足以把他们打发进梦乡。

监兑此刻最为紧张，每袋米需得在记录下登船，每船载米 500 石。监兑一职由同知、通判担任，把知府比作市长，同知就是副市长，通判就是副市级，杭州局粮通判正是此次监兑。他需得将漕粮逐船兑足，验明米色纯洁，面交押运官，然后亲督到淮安，在那里接受漕运总漕盘验。过了监兑的环节，即是押运官的责任。押运官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每条漕船

皆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水手九至十名。

想到此去还有两个月水路，廖寿丰越发面色凝重。此时，富义仓的账房小步挪了过来，见他面有不快，不敢多言，只双手递过一本厚厚的账本。廖寿丰默默接过，逐一翻阅，今年的漕粮都已经堆放在江涨桥东北的仁和仓、广安新桥旁的广积仓、宝善桥西的永济仓、城内义仓和这富义仓内，另几个粮仓的漕粮和船只也都准备就绪。下属们为了粮仓满盈漕运无碍，花费了不少心血，而他这个上司却板着一副冷面孔，肩如冰冻表情僵硬，下属看了又是什么感觉呢？所以廖寿丰递还账本的时候，松弛了自己的表情，目光也变得柔和。不过，表情虽然松弛了下来，内心却并不敢有半点松懈，即便账本上的数字十分可靠，但漕运环节众多，哪一个环节都可能横生枝节造成麻烦。漕帮势力渐大，羽翼丰满，陈规陋习越来越多，那副一呼百应的架势好似他们已经有了跟政府叫板的资本。而廖寿丰为之效力的朝廷却运势衰颓，各方面的控制力都在下滑。

终于，1901年朝廷下令停办“漕运”，那些与“运”相关的东西和王朝离得越来越远，最后大清朝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

关于停办漕运的原因，《杭州运河史》是这样分析的：1.商品粮贸易增加；2.政府财政困难无法支付漕运开支；3.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光绪帝下令停止漕运与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大有关联，签约后清政府要支付赔款共计白银4亿5千万两，这给本来就紧张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清政府在停办“漕运”的同时，“保留每年以上海海运漕粮一百万石至天津，漕路衰，海运兴，再改由铁路火车运到北京”，于是，富义仓作为漕运粮仓和漕运码头的使命在1901年宣告终结。就在同一年，昔日的浙江粮道，后来担任过浙江巡抚的廖寿丰在家乡病逝，他老家离杭州不远，就在上海嘉定。

结语

谭钟麟、应宝时、廖寿丰三位人物与漕运码头富义仓开建、宣传、投用这一依次递进的时间链条形成呼应，人与码头的良性互动在此清晰呈现。当码头事关国计民生时，确实无人敢掉以轻心。

漕运停办了，码头功能衰退了，只留下富义仓这个名称以及那不停转换用途的建筑物：军火库、营房、宿舍……大人物从码头消失了，码头开始物大于人。码头虽然由盛转衰，由热闹走向落寞，但后人无须为之悲哀，因为这乃是大势所趋、时势使然。

富义仓界碑

富义仓漕运码头遗址

驳货码头：翻坝过塘

一、裘德生过德胜坝

1879年12月，即光绪五年十一月，当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与南洋舰队像模像样地在海上行驶时，大运河中依然是帆樯橹桨，人纤牛拉。

在这一年腊月，美国传教士裘德生坐上了一艘摇橹船，从上海出发，转入运河。因为船上唯一能生火的炉子被倒灌风熄灭，裘德生连口热水都喝不到。他看到“船夫在船尾摇橹，有时还有纤夫在岸上拖着船走，起风的时候，船夫会在桅杆上挂起一张帆”。整整八天，他度过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寒冷与枯燥。

裘德生到了大运河的南端——杭州，遇到了离奇的经历——翻坝。他说，杭城的地势比城外的运河高，所以，我们的船必须拉上一个坝，以便进入“上河”。这个坝，就是德胜坝，清时“货运船票”称为“顶坝”。时人认为，这是大运河南端的最高之处。

正如裘德生所说，杭城的地势南高北低，要是没有坝，城内的河流，会向城北一倾而出。当然，这并不是仅仅指德胜坝。最初的钱塘江潮汛，能影响到湖墅，“江涨桥”的名字，也

就是这么来的。看来，除了这地势的南高北低，钱塘江潮也是出现翻坝奇景的“推手”。

裘德生说的德胜坝是座土坝，“上河”与“下河”的落差较大。不过，朝“下河”，也就是朝大运河的一面，坝坡缓长。上面有贴合船底的坝槽，条石砌底，表面有厚厚一层黏土（俗称“青紫泥”）。船上拉时，人与货清空，船进了坝槽，坝顶上的绞盘放下绳子，钩住船缆绳。

在裘德生看来，那绞盘只是一个大木柱，竖插在大石盘凿成的洞中，另一端用支架加以固定（支架也许是三角形的）。大木柱的中腰有突出的几根木棍，几个坝夫着力转动，牵引坝下的船，坝槽的黏土好比润滑油，帮助船只徐徐上升。（[美]裘德生：《我在杭州的生活》）

比裘德生晚来杭州 20 年的英国传教士毕晓普夫人说到翻坝，除了赞叹土坝“平滑石板斜坡”的设计，还称赞青紫泥起润滑作用的巧妙。毕夫人还提到“竹编绳索”，不但提升稳当，下放时还能钩住船尾减速，以防船头失控冲进“上河”被水淹没。

这也是关于运河南端翻坝时难得的描述，坝顶绞盘的坝夫号子随性而喊，高兴的、不满的、色情的、竭力的。“每次过坝，船主都要缴纳几个铜板，作为报酬。”

二、德胜坝今昔

上

裘德生见到的老德胜坝在哪里？清朝的《浙江省垣水利全图》上，标在老德胜桥（夹城巷）以北约一百米处。

这是大运河南端的水运咽喉，船只翻坝，整日首尾相接，人声鼎沸。船主要是肯给不菲的小费，晚上举着火把干的也有。由此衍生的行当，不只是坝夫、脚夫、船夫。当年，在宝庆桥（黑桥）码头至德胜坝沿岸，除了吃、喝、用、住的店铺，还有不少承揽船票的官牙。货船到了德胜坝，因故不能翻坝前行时，货主可以凭完税的货单和行路的船票（也有两票合一的情况），在此另行租借船只。至于无“官牙”执照的私下租赁，几乎没有文字记载，在水运与码头制度的完备方面，清朝似乎比前朝更为讲究。

咸丰六年（1856）十月十一日，一个名叫严桂的人承揽到了郑、陈、毛三位相公的靛青（颜料）“捌拾壹担”，要出北新关。严桂在宝庆桥边的陈育才“黑桥官牙”处承租了船只，并由“官牙”出具“承揽船票”，票上还注明了靛青的表面干燥无潮湿。看来，由“翻坝”衍生出的产业，都有成熟的行规。

翻坝，那是一段长长的历史。直到 1938 年，11 岁的顾东华迁居此地的时候，现在的夹城巷 60 号还是一片低屋，他每日从北窗口看到的，就是坝下日夜不息的舟船与背扛肩挑的人流。不过，当时的德胜坝，已不是裘德生说的土坝了，而是条石砌成的石坝。因为坝面太陡，上河与下河的船只不再翻越，船上的货物只能由坝两头的人力驳运。

当时，“仓基上”是“下河”的大货场；如今的左家桥小区，是“上河”的大货场。湖墅老人项鹏说，一艘大乌篷船的货物，无论从坝上的“上河”货场驳运到坝下的下河货场，还是从坝下驳运到坝上。卸船、装船，都要近四个钟头。这也形成了一个规矩，往往是上午从“上河”驳货进“下河”（运河），下午从“下河”驳货到“上河”。当然，这是多个群体的同时行为，

码头与搬运工人的概念，在德胜坝的上下，尤为清晰。

项鹏老先生说，那时他家的后窗朝向运河，可以看到河上船无空隙，一片乌篷。江北船上的小孩是拴了绳子的，这也促使儿时的他有一步跨出窗去的念头。他的姐姐，就是那么莫名其妙地落入了水中，捞起时，已没有了气息。

当然，儿时的记忆也有乐趣，譬如“上河”与“下河”的西瓜船装卸。如今的湖墅老人说起抢夺落地的破西瓜时，仍是满脸笑容。那时候坝上坝下的搬运工人，大多住在老德胜桥西面的长板巷，那巷当年就似城外的田埂，少有树木，“走过长板巷，乌龟晒太阳”，说的就是他们。

下

1953年，靠近湖墅南路的那条运河西水流填埋后，车辆可以直接进出，虽然那时汽车不多，但也给仓基上与左家桥的货场驳运带来了方便。

要说明的是，直到1958年老德胜坝被拆除时，坝的“上河”主流长度仍只有两百米左右，在《浙江省垣水利全图》上也是如此，“上河”的货船都停泊在此处。当然，这并不是说德胜坝往南是个断头，它还有一条支流，偏向西南，从如今夹城巷60号9幢301室的南窗下流过。这河的宽度，正好通得两只并排的乌篷船，这河往南流，到清湖闸（现在大塘新村方位）与下塘河相接。

老德胜坝拆除，新德胜坝同时建立。

新德胜坝建在哪里？就在原洗衣机厂那条上塘河与运河的口上，也就是现在德胜路运河桥的东南侧。新德胜坝由闸门控制，以水泵提升水流。从那以后，去上塘河的船只，就此中断了。

新德胜坝虽然没了翻坝的风景，但泵站的建立，对于后来的运河，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功德无量”。

湖墅老人沈汉秋说：1976年，他参加“外调”（外出调查某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从无锡坐轮船回杭。半夜，船过嘉善，到“朝春漾”，正是凌晨三点来钟，船上广播响了，要大家起来洗脸刷牙。据说过了此段，轮船就不再抽取盥洗用水了。为什么？因为接近杭州，水发臭了。沈汉秋老人说，当时他真的无地自容。

20世纪80年代初，运河水开始发黑，变得油黄一片，臭气能飘出岸上一里以外，市政府决定治理运河。一位黄姓先生当年在新德胜坝泵站工作，他说：三台大水泵日夜不停地抽，抽了整一年，大年三十晚上都没停，市领导也来慰问。好在运河的污水源源不断地抽进了上塘河，太湖的清水引过来了，运河才慢慢变清。当然，沿途各厂也加大了治理污染的力度。

运河的水清了，新德胜坝泵站还是继续抽，直到上塘河的臭水也换成了清水。但是那代价却是对海水的污染转嫁，这也是教训。

当新德胜坝建立时，老坝南面原来用作停泊“上河”船只的200米河道，也在往南直线开挖，一直到了武林门外的杭州炼油厂。这是一条全新的运河主道，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夹城巷以南的运河。此前的另一条向西南流经夹城巷60号9幢的弯曲水流，随之填埋。这在缺少机械，单靠“人海战术”的年代，必然是一幅红旗漫卷的图景。

新运河的开挖，并不意味大运河与杭城水系的直接沟通，这其实是炼油厂运输的配套工程。当时，在炼油厂的南侧，尚有一个称为“草坝”的土坝。这在《浙江省垣水利全图》上，就是“猪圈坝”。它与施家坝、会安坝一样，拦截的是下塘河与下塘河的水位。这么一拦，杭州城墙内的水位，就清清平平了。

要赘言的是，现在的“稻香园”住宅区，当年俗称“江心岛”，也就是老运河一度的残流与新运河完工后形成的区间。

以下要说的是，以老德胜坝拆除的日子为界，运河流向上塘河的路径。不过，在这之前，还要先表一表下塘河。

三、下塘河

要说下塘河，先得说清“翻坝过塘”，在运河南端所指的“三塘五坝”。“三塘”，即从运河（俗称“下河”）翻坝后进入的三条“上河”：上塘河、下塘河、子塘河。“五坝”：德胜桥北的德胜坝、德胜桥东的石灰坝、艮山门外的会安坝、武林门外的猪圈坝、米市巷西的新河坝。（[清]高鹏年：《湖墅小志》）每一个坝，都可以翻越船只，当然，这说的是空船。所以，在坝的两边，都有装卸货物的船埠头。

在老德胜坝拆除前，运河水在坝北有一股往东流去，经过原金鱼洗衣机厂（现改为某楼盘）的北侧，向东南，一直到石灰坝，翻过石灰坝，流入上塘河（现在被上塘路隔断，以涵

洞连接)。

石灰坝，也称日晖坝，当年是座土坝。下三府香客去半山娘娘庙，都要在此坝前下船，走过坝，到“上河”再上船。这“上河”在现在的浙江工大校区，又分成南北两股。往南一股，通向施家桥，即本文要说的下塘河。往北，是一路浩荡的上塘河，也就是六百五十多年前的老运河。1932年，杭州市政府制定的全市《交通计划》上，运河的客运码头就打算搬迁到此坝。所看中的不仅仅是此地离市中心近，最主要的是它沟通了三条河流。

老杭州人对方位的指认是颠倒的。国人一般以北为“上”，以南为“下”。老杭州人却以杭州为立脚，称南为“上”，称北为“下”。“上八府”，说的就是钱塘江上游的旧时八府：宁、绍、台、金、衢、严、温、处；下三府，说的是杭、嘉、湖。当然，这也是因为浙省的地势南高北低，人们才按照水的流向对“上”与“下”作如此指认。

下塘河也是，按方志说法，下塘河来源于天宗水门与余杭水门。前者指小北门水门，如今的中北桥方位；后者是武林水门，在如今的密度桥。（南宋《咸淳临安志》）前者的水源是中河；后者是小河（故道现称“光复路”）与浣纱河，已先后被填埋。

这两股水，加上北护城河，其实是三股合一。在元末的张士诚还没率部开掘拱宸桥到塘栖一段新运河之前，“下塘河”的概念，就是指老德胜坝与石灰坝以南，包括整个城北的水系。

这么写也是化繁为简，杭城水系错综，越是引经据古，越容易搞晕。《咸淳临安志》记载下塘河与运河的相连，指的是老德胜坝南流经夹城巷60号9幢的那条河流，是通过清湖闸（现在的大塘新村内），后来这都成了历史。

四、上塘河与坝

既然杭人有以北为“下”的习俗，那么上塘河位于杭城北面，怎么又称“上”呢？这是因为杭人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以东为“上”，以西为“下”。杭城不少的街巷名，大致也可读出。

如今，站在绍兴路的上塘河桥上，往东看上塘河，可见河面开阔，杨柳倒垂，炊烟农舍，静谧平缓，清晨有水汽弥漫，黄昏有树木朦胧，一幅好景。这是前几年的整治之功，虽然少了原生的野趣，但上塘河的开阔与浩荡依然不变。沿上塘河北侧的步行道向东走去，堤岸很宽，高于岸边田地。

1925年6月17日《申报》载，当年治理上塘河，疏浚出的淤泥填铺在河岸的“长埂”上，竟成了“宽垣”，从半山（皋亭山）的金带桥“即将到达拱宸桥”。“垣”本意是墙，当然这是形容，但也说明淤泥之多。附近的“一般乡农”都“纷请承粮耕种”，省府下令：“永禁承粮管业”。从保护河道的角度来看，堤岸上“永禁”耕种是对的。

也许，我们就走在1925年的“宽垣”上，沿途的地名也与河、坝相关，如上塘镇、姚家坝、崇贤坝、皋亭坝。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拱墅区的范围。

从绍兴路下桥东去，第一个地名是姚家坝，在上塘河的一支分岔口上，如今是个水闸。这分岔的河水，向北流过现在的沈塘湾，再流过城市学院，与运河相通。当年，船只翻此坝进入运河，路途更近，按时人说法，至少要比走石灰坝省一个时辰，翻坝的船只整日不停。

姚家坝并非官坝，而是由乡民自行管理，因此船家吃苦头的事经常发生。尤其“下河”水浅时，从坝顶到“下河”落差大，船只下滑的速度一快，破坏程度很大。

老“土地”魏富良说，每当“湖州船”翻坝，从“上河”落到“下河”，常常倒霉。坝夫总是将船放得很快，船头进水，炉灶倾翻、锅碗打碎都算轻的，落水重时，连船头都会破损。除非船主在装卸货物时多出一点铜钱，才能稍稍减少一些损失。有关这点，魏富良也说不清为什么姚家坝人对湖州人会有成见。

湖墅，早年称“湖州”，也有称作“湖州市”的，据说最初是湖州商人在此卖米形成的

商市。还有一个现象，当笔者在上塘镇范围内问起某地时，不少当地人都会累赘一句“往姚家坝，再过去”，或是“离姚家坝不远”。看来当年的姚家坝，确实是个要地。

顺上塘河再往东走，水面更为辽阔。行约两百多米，可见一座横跨上塘河的西联桥，这是近年修建的，连接白石路与沈半路。过西联桥北堍再往东走，不远处又有一条北去的河水。曾经的善贤坝，就在此河口。

善贤坝早已拆毁，有一座善贤坝桥，依然倒映着昔日的影子。站在此桥上往北看，是原来的善贤坝，如今名为“电厂热水河船闸”。闸的两侧落差居然有四米多，这使得“下河”上的船艇，能从容地穿过北面的沈半路涵洞。黄昏时候，有热电厂的小艇过来，在下河的闸门前停下。几个下班的人走上岸来，有骑上了电瓶车的，有行走的，也有坐进轿车的，洒脱得很。

五、“丈！丈！丈！”的皋亭坝

离开善贤坝，沿上塘河再东走约五百米，是皋亭坝。

不过，您若在开阔的上塘河边，迎着白色的鹭鸶寻寻觅觅，想象着浩荡水面上这久闻大名的“坝”会是多么雄伟，那就一定会失望。这坝，也在一个岔河口上，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长桥。如果不是标有“皋亭坝”三字，几乎没人会相信这竟是一座“坝”。

这长“桥”下有七个圆洞涵口，涵口上有黑色的闸盖，河水淹了涵洞闸盖的一半，水草丛生。据附近的村民说，只有上塘河需要泄放水时，闸门才由控制站打开。

久闻皋亭坝大名，笔者很想知道北面的“下河”究竟“下”到什么程度。绕到“下河”，却是一片大工地，曾经的河道全被填埋，工地的北面就是车水马龙的沈半路。笔者还是不死心，希望哪怕能找到“下河”的一丝出水。

再从西面绕到东面，那是一个死胡同，有不少临时房屋。在它们的中间，那条久闻大名的“下河”，居然还在，从高高的皋亭坝下的某处淌出涓涓细流，顺了向东北弯曲的窄窄河道，流入沈半路涵洞。

在沈半路的北面，这条命运蹇拙的“下河”，还真让笔者怦然心动。那是因为它的原生，它的深藏不露，它与“上河”的落差以及水流幽邃，还有它不宽的两岸矗立的苍虬树木，

小河直街 88 岁的老人陈乃钊说：儿时的他，每年都要随父母去半山娘娘庙烧香，他们坐的船，是从拱宸桥的北面一条河流东去的。这一条河流，在瓦窑头附近。陈乃钊老人说，这里有座老登云桥。这说法，在《湖墅小志》上可以找到。现在绍兴路西头的登云桥，清时称“青云桥”。

老登云桥下的河水，通往皋亭坝。陈乃钊谈到幼时在船上看皋亭坝，用了一个“仰”字。他说，到了坝前，船上人全下来了，货也由坝夫搬运。当坝上的绞盘“噶噶呛呛”放下铁链，拴住船时，坝上的民工就开始呼起了号子，那号子很奇：“丈！丈！丈！丈！”几个民工绞起木棍转动绞盘，船只沿着泥泞的坝坡慢慢拉上了坝顶。然后，再从坝顶将船放入上塘河。人再登船，货再落舱。

其实，皋亭坝与皋亭山相隔八里多，皋亭山是半山的主峰，杭人习惯以皋亭山称半山。那么为什么要将那么远的山名当作这坝的名字？因为，从这里乘船再往东去，在上塘河上就再也没有一条通往运河的直径了。再早的时候，这也是运河扼守皋亭山下来的山水的主要大坝。

从历史的角度看，从上塘河翻皋亭坝进入运河，也避开了北新关和后来的洋关，“船料”与“赋税”都“逃”了。正因为船家的口传言说，皋亭坝的名声，便广为杭嘉湖知晓。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上塘河对杭嘉湖的交通仍起着很大作用。当时从菜市桥到半山桥码头，18 里水路，船票 5 分钱。那时，船过半山桥，因为逆水，又加上河道转弯，常常需要拉纤。一般是 4 个纤夫一组，枯水时，纤夫之外，连水牛都被驱赶上了。这一段临近半山（皋亭山）码头，有两百多米的石板路。

半山码头不宽，一字型船埠长两米左右，石板台阶直伸到水面。码头是有历史了，那座供行走的半山桥，前几年挖出碑来，记载其建于唐朝贞观年间，距今有一千四百多年。半山码头，或者说船埠头的存在，应该不比桥晚。

早先，班船的停靠与起航，吹的是海螺。后来改成电喇叭，喊的人先用手“啵啵啵”敲几下，再喊：“旅客们请注意了……”那时半山码头繁忙得很，有从半山桥开往临平的客船，27里路，票价8分。从临平到海宁，两船对开，每两天一个来回。回程的人，又得到半山倒船。这还不算货船。

1957年，杭州钢铁厂建设之前，每当早春二月的庙会，半山码头更是船满为患，喇叭声此起彼伏，香客之多与灵隐寺大有一比。那几天，上塘河中还有龙船巡游，首尾相接，百舸争流，甚为壮观。后来杭钢厂投入建设的三年间，上塘河与半山码头成了该厂的运输要道，装载材料与设备的船只几乎首尾相连，千年的龙舟遗风，就此中断。

如今半山码头修复了，纤夫行走的石板仍在。半山桥边的树木丛间，竖有文天祥立像。当年，这位南宋朝廷的栋梁，便是在此上岸，去与驻在皋亭山上的元军，作不屈的失败者最后的谈判。

六、子塘河

南宋《咸淳临安志》说子塘河：“自北郭税务驿亭下，直抵左家桥，系下湖泄水之处。”这话有三点值得解释一番。

一是“北郭税务驿亭”，说的是南来北往的税务官吏、押解税款者下船的接待点，也就是“税务局招待所”，专款专用，待遇不错。其次说“左家桥”，如今虽然已成湖墅南路涵洞，但影子仍在，当年位于老德胜坝的北面，所以无需翻德胜坝即可由西口进入，很方便。最后说“下湖”，就是西湖，杭人以“西”为“下”。因汛期山水高涨，西湖水有时会流向运河，这就是“下湖泄水”。

子塘河过左家桥，流经现在的浅水湾小区北侧时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往西，一支拐向正南。往西的一支经里万物桥，往南的一支过100米处，流经外万物桥。

“万物”，其实是一个误读，此桥原名“望佛”。为什么称“望佛”？

原来，此桥的北面曾有一座规模颇大的妙行寺，也称“接待寺”。以前，站在这两座桥上，都能看到这寺，故称“望佛”。（南宋《咸淳临安志》）在同治年间的杭城水系图上，此桥也称“万缘”，万变不离其宗，离不开“佛”“缘”二字。

里万物桥，如今只是小桥一座，但千万不要小瞧了它。桥下的流水，在1956年之前，是拱宸桥大同路码头到达松木场的航道，每天都有班船。到了春季香客多时，班船更是来往不绝。此河穿过现在的莫干山路，向西流，在现在的文一路小学处与北来的余杭塘河支流合并，向南流去，过下宁桥与上宁桥，在如今的跑马场路又分作两支。一支西流，到现在的西溪湿地；另一支继续南行，到松木场。在这两支河流上，曾并列过两座石桥，呈八字形，因此又称“八字桥”。好在这一路地势较低，与运河的水平面几乎持平，所以一路无坝。

如今，这河好歹留下了一些与河相关的地名，还有一段不错的河流，这就是保俶路北段东侧的西溪河。这也使得后来的人总会呆想：杭城的水流，真是无处不达。每一段都是那么风景秀美，环境宜人。要是交给如今的房地产开发商来宣传，不一定又是如何天花乱坠。可惜，天目山路往南一段，包括偌大的松木场泊船处，都早已被夷为平地。笔者曾见过一张旧照片，松木场有石拱桥一座，横跨东西，规模不小，石刻粗犷。后人说起，往往扼腕。

1919年7月，“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正好两个月零十天的时候，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蔡元培，从京杭大运河南下，顺子塘河经八字桥拐向西溪，到十八坞之花坞的某处庵堂住了下来，修身养性，以静观动。后来，汤尔和、蒋梦麟、沈尹默等也先后顺此河到达花坞，劝蔡元培出山，因为北大乱了，全体老师辞职。

这段逸闻在子塘河的历史上毕竟只是一瞬而过，如今老人们记忆最深的，还是秋季西溪

的火柿，一船一船地摇来。穿里万物桥，经左家桥，到运河码头。据说，当年在里万物桥边有一家雨伞厂，加工雨伞需要桐油，有时桐油不济，也用柿子汁来替代，称“柿子油”。这话并无佐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柿子船何日会来，现在的长者，当年的伢儿，了然于胸。他们常常拿了石块守着，看红红的柿子船嘎吱咕吱摇过来，便举手装出扔的样子，船家怕是真砸，赶紧扔几个柿子上桥，权当买路钱。

如今的外万物桥已成水泥平桥，但桥的位置没变，桥下的流水名为古新河。老人说，以前这河清澈，上河水涨，鱼虾逆流而上，也称“抢水”。那时，周边只有不多几家住户。人最多的是桥西拱墅公安分局拘留所，那里的人是轻易出不来的。外万物桥南侧，就是“三塘五坝”之一的新河坝。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市中心及中东河不少地段开始改造，迁移到外万物桥周围的住户逐渐增多。居民一多，市政没跟上，生活垃圾大多倾倒了新河坝附近。都说，不是有坝拦截水吗，这河还有什么用？他们哪里晓得，这新河坝的功用，本来就是调节南北水流的。

再早，古新河往南，过圣塘桥，虽然是西城墙外的护城河，但在弥陀山（也称“霍山”）南，此河转往松木场时，地势较高。若无此坝，南端水流就难以储存。此河以前也通得船，香客旺时，也在此坝前翻越，当然，往往都是小船。

子塘河的这一支流（古新河），后来就在垃圾的拥堵中渐渐臭了，好在前几年整治了一番，在老坝南面约一百米处，也就是米市巷街道办事处的西侧建了新坝。其实它不是坝，是闸，闸上有桥，桥上有亭，称“新河坝桥”。船是翻不过去了，景倒是不错。

七、宦塘河与1247年的大旱

宦塘河并不在“三塘”之内，也与“五坝”无关。类似的还有余杭塘河。杭州人好说“本塘鱼鳖”，其实说的就是在这些塘河中的野生水产。杭城西北的塘河不胜数，本文再说一说这一条宦塘河。

一个“宦”字，至少说明这河的开挖不是民间行为，确实，这是淳祐七年（1247）的官方行为，起因是当时的一场持续三年的大旱。

《宋史·理宗本纪》记载了这场大旱的一些情况。南宋的第五位皇帝理宗赵昀，从六月开始就减膳节食了，他还要求臣僚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毋有所讳”。因为在当时人看来，天灾就是上天对执政者不当行为的警示和惩罚。

但大旱仍然“未释”。12天后，理宗对部分批评意见付诸整改，先下诏“两淮、襄、蜀”等地，对一直“遗骸暴露”在野地的前线阵亡将士，尽数“收瘞”掩埋。到了七月，又下诏，罢免办事不力的“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政事吴潜”，一个职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官员。

三年的大旱，导致杭嘉湖三府及镇江、常州等地粮食大幅度减产，严重影响了京城临安百万军民的粮源。每日早朝奏事，全是叫苦求粮。那时候，从“苏、湖、常、秀（嘉兴）、镇江”进临安的粮船，分为两路。一路“自东”，走运河（上塘河）；一路走德清，到奉口，“沿溪”（苕溪）经梁渚，过小河。

“梁渚”就是如今的良渚，要说明的是，当时梁渚这一路溪水很窄，行船艰难，全靠纤夫肩拉。这样的水路条件，只能负荷“止可载十余石”的米舟，相当于一辆长安小皮卡，再大一点的船，就不能通行。淳祐七年（1247），好不容易在北面征集了一些大米，运河却因干旱“断流，米船不通”。

“自奉口至梁渚”一路的情况更惨，“仅有一线之脉”，也就是梁渚至北新桥一段还有一点水，往北的苕溪流水“皆干涸”。尽管灾区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京都，然而“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船”全进不得临安。

“纲运”是朝廷的计划调拨，属国家行为；“贩米客船”是商贾为利，属市场行为。到了这时，都只得“肩负”了，也就是从德清到北新桥肩扛手拉，而这种“步行费”十分昂贵。

南宋中期，一石（约120斤）米价是三贯铜钱，即三千个铜板。经过三年大旱，涨得就

不是这个数了，再加上这凭空多出的脚夫钱，《淳祐临安志》评价：“米价之增，灾由于此”。这一个“灾”字，指的不仅是旱，也指“米价之增”给穷人带来的灾难。

临安府尹赵与筹决定开挖、疏浚河流。他先派员查看北新桥至奉口的水流，制定出一劳永逸地解决临安城粮道水运的计划，然后决定根据当时溪沟的宽度，从“北新桥到狗葬”，再“开阔三丈”，从“狗葬至奉口”，加阔“一丈”。加深河底四尺，清除出的河道淤泥用于“帮筑塘路”，岸边大堤堆积成了宽路，形成了“共三十六里”的新开河。

狗葬现称勾庄，邻近吴王村。当然，这并非勾践、夫差相争时所遗留的地名。在赵与筹扩溪前，这里只是一片葬狗的荒冢，溪流“纤路狭窄”，纤夫“艰于行走”。赵与筹“差委官属，分段开掘”，也就是分段各乡承包。这一来，效率极高，当年开掘，当年完工。水流大了，纤道也宽了。

史书记载，“新河开成，漕输既便顺，堤岸亦增辟”

。于是，“往来浙右者，亦皆称其便焉”。“浙右”指的就是浙北。这说的也是粮荒解决以后，这一水路提供的便利，为当时人所称赞。（〔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这一条宦塘河，就是从小河经祥符桥，折向三墩，往北一路。可以想见，淳祐七年（1247）除夕，在湖墅的船埠头及“马头”，当米船靠近岸时，定是欢声一片。无论是正史还是稗史，都没有记载那一年临安（今杭州）曾经饿死过很多人。所以，谈起历史上的杭城米市，是不能忘记宦塘河的。

翻坝实景 1

翻坝实景 2

翻坝实景 3

御码头：皇帝老儿泊御船

一、引子

2008年1月23日，《杭州日报》载文《“御码头”地址弄错了？》，仅隔两天，又刊登《“御码头”究竟在哪里？》及两幅照片。于是，一个倔强的老人，在议论声中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老人叫朱世泰，时隔四年，91岁的他依然对“御码头”耿耿于怀。在珠儿潭小区，朱老带笔者登上四楼，走进宅室，拿出一本贴满剪报和写满工整文字的收藏本，利落地翻出了两张泛黄的报纸。对当年的争论，老人仍不能释怀：“不说清楚，是要误导后代的！”

五年前，“御码头”遗址亭园刚刚竣工，朱老写的上访信就出现在了市领导案头：“御码头”景址错了，它应该在运河西岸。朱世泰老人在信中说：康熙六次下江南，五次到杭州，都是在老码头上的岸，史书记载为“河塍上”。乾隆六次下江南，六次到杭州，除第一次在老码头上岸，后来五次均是在宝庆桥新码头上岸的。此信随即由市信访办落实到运河综保委给予答复。

综保委回复：康、乾十一次来杭，跨度百年，不可能都在同一地方上（下）岸，历史记载也仅仅说明某次皇帝在这个码头上（下）船。“综保委”这个观点，刊登在2008年1月23日《杭州日报》上。该文结尾为：“而据考证，它（‘御码头’）就在现德胜路运河桥附近，因此，把‘御码头’定在德胜路运河桥北边的运河东岸，是有充分道理的。”

朱世泰老人对此大为不满，当晚手绘出了新、老“御码头”位置。次日一早，他再赶到杭报大楼，找到报道此文的记者。朱老认为，有关部门尽管给了我回信，但历史的出入必须要有一个留给后代的说明。三天以后，《杭州日报》刊登了朱老的意见与画稿，同时也转载了清乾隆年间的《南巡盛典》中塘栖到杭州段的运河图，并对此展开讨论。

看到这几篇报道以后，一位名叫张震毅的读者旗帜鲜明地支持朱老。张以前是码头搬运工，15岁时就在德胜坝码头上班。他说：当时运河西岸，全是自然形成的河滩，唯有古新河口的黑桥头往北一百多米的一段码头，相当气派。堤岸下全是密集の木桩，堤上的石料一律是大块齐整的青石。年代虽久，有些部分已经坍塌，但仍可想见当年码头的显赫，一望即知不是普通的富商船埠头。

张震毅所说的位置，就是原来的宝庆桥码头。这正符合朱世泰的说法：作为停泊大型舟船的“御码头”，并不是哪一个河埠头与河滩可以承担的。

此文以一位市历史学会理事的电话记录作为结尾：“现在的‘御码头’确实不是历史原址，当初的‘御码头’所在位置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重建一座气派的码头。另外，选址时出于开发运河旅游经济的考虑，……作为人文景点，它的作用还是差不多的。”

二、文人笔下的皇帝上岸

1

运河南端被称为码头的泊船处，史料上有两处，均写作“马头”。作为康熙与乾隆南巡御船的停泊处，除了满足大船位的吃水要求，大致还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靠近清兵大营所在，一是要邻近寺庙。前者是出于安全保卫方面的考虑，后者与皇帝的祭拜、游览有关。

光绪年间的《湖墅小志》记载：“湖墅有两马头，为官家迎送往来之所，旧马头在河塍。”又说，“河塍近北新关，其地一面临水。”“河塍”，也称“河塍上”，指运河东岸。这也是杭人以东、南为“上”；以西、北为“下”的习惯说法。

“河塍近北新关”，从乾隆《南巡盛典》卷九十二中的“程涂”图看，北新关在如今的大关桥方位。这也证实了朱世泰老人的回忆：1958年前，此处还遗存一块汉白玉的“万寿碑”，宽1.5米，从碑基算起，高度将近6米。这就是“程涂”图上明确标出的“万寿宫”遗址。

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在此泊船？最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有现存的香积寺“马头”。昔日香积寺的香客如云香火鼎盛，自不必赘言。如今，香积寺复建，一座颇有气派的牌坊，就立在当年的“御码头”（马头）上。

2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十三，上八府一个叫金张的秀才，顺钱塘江来杭城，到褚堂巷看望娘舅，有幸遇到了康熙来杭的盛事。在当时，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就算能中进士，也只有头三名才有亲觐皇上的机会。意外得以亲眼看到皇帝仪仗的金张十分兴奋，洋洋洒洒地记下了此事。

当时金张随娘舅家的人在半道红跪迎圣驾，想再往前去，官道两旁已是人挤人了。他写道：“半道红外平如砥”，这说明，当时从半道红往北望去，官道的石板路至少还有长长一段。当皇帝仪仗中的明黄色华盖出现在大道尽头时，那位置，按金张的描述，应该大致在江涨桥附近。这一段描述，也可以侧面证实康熙皇帝的确是在河塍上的岸。

从“程涂”图看，康熙从河塍的“旧马头”登岸，要走江涨桥，才能抵达运河西岸的官道。那时还没有湖墅路一说，进城的的地名依次是：卖鱼桥、甘露茶亭直街、大夫坊、左家桥、米市巷、半道红、武林门。

这是康熙皇帝第一次来到杭州，前往绍兴祭拜大禹陵。按历史学者的说法，康熙此行是想安抚民心、化解满汉矛盾。从后来的史料来看，康熙的赈灾、赏赐、蠲免（免除部分赋税）等手段，还真达到了预想效果。再后来，康熙的四次南巡，也或多或少地对浙江的赋税做了一定减免，还出台了一些优待老人的措施。

3

《湖墅小志》说：“河塍近北新关，其地一面临水”，这说的是老码头，“新马头在宝庆桥，乃高庙南巡时改设于此”。乾隆的庙号“高宗”，因此后人尊称其为“高庙”。看《南巡

盛典》的“程涂”图，新码头四面环水，只有宝庆桥一个出口。从拱卫的角度说，比“河滕上”的老码头更有利。

宝庆桥通新马头，迎来送往日无休。

老翁夸说当年事，五次南巡泊御舟。

这首诗是湖墅士人魏标于道光元年（1821）所写，写的是乾隆皇帝五次在此泊船上岸的盛景。杭州确实太美，如果不考虑祖制，也许乾隆皇帝会超过康熙帝的六下江南。魏标所写有湖墅老人“夸说”五次见过乾隆皇帝，应该不是虚话。因为从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第一次到杭至道光元年（1821），不过只有 70 年。

其实，将宝庆桥东面这一块环水之地作为乾隆御船停泊的新码头，只是“旧酒换新瓶”。这“马头”，在南宋初年，就是朝廷接应中原人南逃的泊船登岸处。当年，临安（今杭州）人口从 20 万猛增到了 80 多万，这些人大多是坐船顺运河南下，在此上岸西出宝庆桥后，有一个官方“接待处”，设立在妙行寺内，后来这寺就被俗称为“接待寺”。

康熙皇帝第一次来杭，曾走进妙行寺，瞻仰一番后又兴致勃勃地挥笔题写了“圣因妙行寺”大匾。于是，此寺“宗风大振”，毗卢阁大殿也被推倒重建了，重建后“基宇洪敞”，成了杭州寺庙的翘楚。

1958 年，寺院被毁，改为杭州链条厂。文一路开通后，寺院又被一分为二，范围一直到如今的华润超市地块。可见，妙行寺当年的规模，并不次于灵隐。有意思的是，如今要是询问湖墅的老人，知道妙行寺的反倒没有，说接待寺，倒是无人不晓。

当年中原人的登岸之处也是如此，作为常平仓的漕运粮库，虽然后来已经废置不用，后人也一直将此地称为“仓基上”，这就是如今的“仓基新村”。以官府迎来送往为主的“官马头”，和皇帝老儿的“御码头（新马头）”，反倒在历史的尘烟中被渐渐淡忘，民心如此，无可强求。

4

还是说说乾隆来杭与新码头。

《南巡盛典》的“程涂”图记录的事件是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清高宗从塘栖镇大营出发，顺运河南下，御船行了 23 里，来到杭州仁和县境内的谢村。现在的谢村，也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货运码头。

从谢村出发，御船又行了 6 里的水路，过拱宸桥，沿岸的船埠头多了，人也多了。按当时的文字记载，是允许乡人船民跪接瞻仰的。御船又行 3 里，过北新关；再继续南行 3 里，是江涨桥；再 1 里，是宝庆桥新码头。

这么一算，从塘栖到宝庆桥，御船一共行了 36 里，按扬帆摇橹船的速度，哪怕顺风，行程也少不了要一整天。三月的白天偏短，这一天的晚上，乾隆帝应该是在新码头过的夜，或许住在御船上，或许过宝庆桥，夜宿“接待寺”。

“起辇”，已是第二天了，乾隆帝改乘銮驾，从“杭州府武林门入城”。随驾的起居注官记下了新码头到武林门的行程为 6 里，又行 8 里到了行宫，也就是现在惠民路。这大概就是乾隆皇帝第二天上午的行程。

乾隆皇帝下江南，被无数野史和影视剧编出了不少风流韵事。据说，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乾隆皇帝再次下江南，和珅也刚从近侍擢升为侍郎，他鉴貌辨色，知道乾隆帝因为香妃刚死，心情不畅，于是提出不如微服去秦淮河走走。

秦淮河本是有名的水上“红灯区”，乾隆帝夜宿花船未归。后来御船到了杭州，此事终被皇后得知，这皇后原本气就不顺，一闹二吵，居然将满头的青丝剪得个一干二净。剪发是旗人的第一大忌，乾隆帝龙颜大怒，当即下令将皇后逐出杭州行宫，也许当天就被驱赶上了新码头的内官船只，“打道回府”。皇后为此忧愤成疾，呜呼归天，这就是后话了。（蔡东藩《清史演义》）

话说乾隆皇帝到杭州那几天，最倒霉的要算是从苍南赶来的武生员李商铭了。他费尽心血写了一卷《水利策》，想呈于乾隆帝，为安邦治国献计献策。他在宝庆桥“马头”等到了御驾，内侍倒也收下了他的《水利策》折子。

这折子说的是苍南县有一条“黄浦埭”，废圯已近两百年了。当地少雨时干旱，多雨时稻禾淹烂，乡农怨声载道，官吏无动于衷。李商铭就此提出了治理的方案与费用，希望乾隆帝能恩准。内侍收下折子以后，要求李商铭随驾，等候乾隆帝“天恩垂听”。

李商铭从新码头随御驾到了行宫，不知道乾隆是没看这《水利策》，还是因皇后之事心情恶劣，并没有召见李商铭。这李武生却因此祸事临头，被杭州府尹认定是不稳定因素，拘进了大狱。后来又以“琐渎皇上”罪，革去了武生功名，遣返原籍。李商铭从此万念俱灰，隐居不仕。（《苍南县志》）

不过，顺运河南下，沿途在各埠头停泊，多少也是能察看到农业的歉丰与乡农的生活艰辛。单从这一点讲，作为一国君主，乾隆与康熙的南巡，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三、寻找新码头

1

1953年，江涨桥往南分岔而出的运河西支流被填埋，一半成了湖墅南路及行人道，一半成了现在的仓基新村。东边的运河水经过改道拓宽，形成了现在的运河。“御码头”（新码头）的堤岸没了，宝庆桥也没了。

宝庆桥，旧名黑桥，建于明朝初期。住在仓基新村1幢的虞先生已经67岁了，据他说，宝庆桥在如今仓基新村8幢的西面，红缨幼儿园方位，当年是一座三孔的青石拱桥，桥上有一座类似坝子桥上的凤凰亭，名“接官亭”，桥面中央有刻花青石板，两旁为花岗石，各为不同级别官员行走。虞先生还说：那时候，宝庆桥下的河水有四十多米宽。这话听起来似有夸大之嫌，不过，对照清《浙江省垣水利全图》与《南巡盛典》的“程涂”图，这条河的河面宽度与现在的运河确实旗鼓相当。

76岁的缪女士也住在仓基新村1幢，是“仓基上”的老“土地”。她说：“那时候的宝庆桥不比拱宸桥低，两边也是店铺、船埠头。‘宝庆’就是‘宝倾’啦！老辈儿说，有一艘做生意的大船在这里倾翻，船上都是好东西。1953年前，常常有罐儿碗盏打捞上来的。”

如今的红缨幼儿园往西，当年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叫新码头横街，方志也写为“新马头横街”。这是新码头唯一的出路，俗名“狗头颈”。自从乾隆帝走过这一路以后，传说就奇了：“每逢大比之年”，也就是三年一次的省城科举乡试，凡是从“新马头横街”走过的“高考生”，“往往有验”，中举的比例甚高，久而久之，就有了一条歇后语：“狗头颈通湖墅——登科者众”。〔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不过，此说并无确凿数字统计。

以前，有东西两条运河包围“仓基上”时，往西走，是两股河流合在一起通向古新河的水流，西去左家桥。因为宝庆桥别名黑桥，所以从宝庆桥走到这里，也称“黑桥头”，即到头的意思。此地就在如今的德胜路运河大桥的北侧，河流上有小桥一座，从清《浙江省垣水利全图》看，此桥名为松胜桥。

前几年，这小桥修葺一新，建了亭，竖了碑，桥名写的却是“黑桥”。此“黑桥”少写了一个“头”字，意义就大变了。桥“黑”了，也许后人也会像“登科者众”的传说，误读了这桥。但愿，此篇文字能还一个“原”貌。

2

新码头，这个大运河南端历来被称作码头的所在，究竟在哪儿？从清《浙江省垣水利全图》与《南巡盛典》“程涂”图看，新码头在“宝庆桥”正东的运河沿岸，如今仓基新村1幢与8幢的地块，连带南面的德胜路高架桥一片。

当然，新码头最兴盛的年头，是运河真正被叫做“运”河的时候。对于国人来说，这河是历朝历代的交通命脉，所以，新码头也有过难以想象的辉煌日子。《湖墅小志》的作者高

鹏年曾为“湖墅八景”续写过“四景”，其中一景就叫“马头春色”，说的就是新码头的盛景。

不过，这位高老先生用“春色”二字点缀新码头，绝非是形容“春天的景色”，他用的是“春”的另一层引意。那时候，新码头每日停泊有“蒲鞋头”、“跳板船”之类的小船，船中藏了“艳冶”的女人。她们常常在傍晚露面，艳妆粉黛，半掩了脸坐在船头，“鬓影仪光，相映夺目”，招引客官。

《湖墅小志》写于光绪十九年（1893），这说明了那一段码头文化，远非后来人想像得那么单薄，仅仅是背扛肩挑的“杭育杭育”。从史料看，清朝是历来禁娼最为严厉的朝代，官娼几乎灭绝。“马头”的“花船”能被写入方志，不仅仅道出了此码头的“娼盛”，也显示出了码头沿岸的繁荣。

以前的新码头横街3号（也有称作“新码头直街”的），据说是一座厅堂轩昂、庑房纵深的大宅。缪女士读小学时经常走进这座大宅，她说，房椽与窗框上雕刻的都是飞禽走兽，房梁有一人抱的粗，很长。她一再强调：这是“前清的宰相府”。为了证实，缪女士向许多邻居请教3号家的姓氏。总算有晓得的人说：“是姓王”。

晚清在杭州居住的大官里，位同宰相的只有政务大臣、大学士王文韶。难道这是他就近接待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官员所用的房屋？巧的是，这个谜底在朱世泰老人那里得到了解答，他说：“新码头3号”家的女儿王茂玉是他夫人的同学。这房子确实与王文韶有关，是王府的管家所住，也姓王。至于是否与“官码头”的迎往送来有关，就说不清了。

“官码头”，这当年的“御码头”，如今建了一座不小的仿古廊亭，竖了一块石碑，亭的匾额与石碑都写的是“白荡烟村”，还注明是“湖墅八景”之一。“白荡烟村”出在千米外的原“白荡海”，按缪女士的说法：“路都有毛两里（市里）嘞”。

笔者想起“有关部门”给朱世泰老人的回复：“当初的御码头所在位置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重建一座气派的码头”，内心纠结。

好在整治后的运河，极目远望，总让人心旷神怡。

耿直老人朱世泰

乾隆帝《南巡盛典》“程涂”图

新修的御码头碑亭

修复后争议不断的御码头

码头之“埠”：斜阳中的北新关

一、被称作“钞关”的年代

如今的北新关，原称“北新钞关”。元朝末年战乱四起，人们手中的银子被掠的掠，藏的藏，埋的埋，在市面上流通的越来越少，为了维系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蒙古人就学南宋印纸钞。到朱元璋登基时，已是纸钞遍市、泛滥成灾。有聪明人出招，要各关隘征收税赋时只收纸钞，收尽而已。后来的日子，纸钞果然日渐减少，但“钞关”的大名却留了下来。

守钞关，是天下尽知的肥差。洪武十年（1377），户部上奏称全国有三分之一地区的赋税达不到应征标准，朱元璋因此打破了禁止太监插手朝政的“铁令”，将身边亲近的太监们一个一个派出去调查核实。太监一出，那就似放出了饿狼，天下的关卡更是乱弊百出，苛捐杂税不绝。明初的赋税，除了征收“船料”（根据船的大小、宽窄收取的一种税费）以外，还要征收“厘金”（商税），这本来就没有一定之规，任由主官恣意妄为，收多收少，变数很大。贪官污吏想要找一个中饱私囊的口子，容易得如同束发整履。

宦官下派以后，“成绩显著”，朱元璋以后的13个皇帝，就代代延续了这项政策。到了

万历二十五年（1597），生生地将北新关等钞关的赋税，从原先的 32.5 万两白银，提升到了 40.7 万两。当时一艘商船从苏州贩运货物去四川，沿途“无有不征，一舟而经三十余关，一货而抽三十余次”

。（〔明〕蒋光彦：《重建杭州北新钞关题名记》）商人不但赚不到钱，连本都折得十去三四了。这在农耕社会，对商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好在当时官场中人也有良心尚存的。万历三十年（1602）的北新关主事蒋光彦就算得上是个“本心不泯”的好官。蒋光彦是福建泉州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他晓得，为官为吏，再心存廉耻，一旦入了关署，随着权力渐大，心也会变黑。如同白净的蝉蛹出土，上得了树，皮蜕一层，色重一度，越往上爬，色泽越黑，到了卸任之时，便也像是秋后的鸣蝉，深知罪孽深重，声厉内荏。当然，蒋光彦有此心存，也算是知耻。

明时规定，关署的官任职不长，多是一年半载，也是怕人捞得太多。蒋光彦到任满时，才敢放胆说了一句大话：“可幸无罪将竣役。”还好，还好，我蒋光彦守这关署，眼看到任，倒没犯事。

犯事没犯事的官员，都想在青史上留名，能平平安安做到任满者当然底气更足一点。于是蒋光彦张罗起来了，由头还是要从五年前的一场大火说起。那把火将关署的楼房庭院烧得个干干净净，只剩了断垣残壁，连前朝的石碑都被烈焰烤炙得崩裂破碎。蒋光彦在任内将关署建起来了，他要写文勒碑，理所当然地要把这一段补上。

这一补，问题也就出来了。

二、解读“宣德四年”

问题出在碑文上，碑文说：明朝开国到永乐年间（1368—1424）杭州开始设立税课局，收取商税，但只是“有分局而无专关”。正统到成化年间（1436—1487）以后，才开始设立北新关（“始创是关”）。

这是说，直到 1424 年，北新关还是只“有分局而无专关”。这里的“局”，指的是官署，意思是说北新关没有专门的“关署”负责征收赋税。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以后，才有了北新关（署），也就是碑文中说的“始创是关”。

这话，在嘉靖戊戌年（1538）的北新关署主事谢崑的笔下，又是一个版本：“北新有关，自宣德四年始”，也就是说，自公元 1429 年开始，北新关就有了专门的“关署”。

谢崑说的“宣德四年”（1429），与蒋光彦所说的“正成以后”，几乎相差 60 年。究竟哪个说法是正确的，这还是要对史料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

“宣德四年”（1429）的说法出自《重修北新关记》，此文作为《北新关志丛钞》的首篇，也成了后来人进行相关研究的必读史料。以致说到北新关建关，这“宣德四年”（1429）几乎成了所有文章必引的时间。但很少有人将谢崑的碑文细细读下去，因为，在这段文字的后面，谢崑又说：“浙之杭，百货攸萃，舟楫聚焉，故设关榷之”。这一句的重点，还是在“榷”上。“榷”，原意是拦在河水中的横木，后来才引申为税费的征收。再读下去：“但关之沿革不常，故屋宇規制甚陋”。可见宣德四年（1429）的北新关，并不是常设的，驻守的人住的也只是简陋板棚，干的事也只不过吆五喝六地逼船家出一点铜钱。直到“弘治丙辰年”（1496），来了一个主事刘景寅，才临河筑起了气度不凡的公堂。关署的收费规矩，也逐渐完善起来。

三、“一船两制”

到了宣德四年（1429），“纸钞法”行不通了，各地商户纷纷避税。朝廷没办法，又重申赋税制，京畿的商贾征税倍增，怨声载道。于是，户部规定运河的临清关、北新关除了要和运河的其他关卡一样，征收“船料”，还要增加一项运河关卡所没有的税收，这就是船载物品的“货税”。（《明史·食货五》）

这一种“一船两制”的做法（即一条船，既要征收“船料”，又要征收“货税”），也提

供了另一个信息，即当时的杭州，商贸集聚，商船众多，商货厘税的数额多到足以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对商货厘税的征收，并不是在坊市，而在商货所经过的关卡。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定下的赋税征收额度，大多是长期不变的，宋朝便是如此。但在明朝，至少到宣德四年（1429），运河关卡的赋税，还是和朱元璋刚登基时一样，朝令夕改，任意征收，“方针路线”，一日一变。

正因为如此，在“宣德四年”（1429）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北新关的赋税一直处在任意变更的状态，也就不能称之为有真正的“关署”。《北新关志卷之十三·税则》就明确地记载：“宣德四年，始设北榷，其初，止收船料。正德六年后，兼收商税。”后来的《税则》中，明确将所征收的商品税，分为18个大项，800多条物品，其收税的标准数额，一一以银两标明。

可以说，到了正德六年（1511），北新关才步入“正轨”。在“船料”以外，开始真正执行一个朝廷关署征收商税的职责。在此之前，它只不过是一个收“过路费”的交通“卡子”。

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决定发兵朝鲜，正式对日宣战。由于军饷短缺，朝廷要求加收税赋。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暂时地追加赋税，百姓只能接受。但是，仗一打完，这“兵饷”总该还税于民了吧。谁知，此税不但没减，反而就地抵成了“大工”税赋，继续照收。于是，城北瓶窑的“小民”们，开始闹事了。（俞价：《北新关裁革奉口船料记》）

这“闹事”的记载也是在碑文中，用的是春秋笔法，与《明史》对时事的记载相比，碑文的记载更为简略。但能如此记上一笔，瓶窑之事也就不仅仅是极个别民众的“聚会”了。

说这一段，也可以看出，那时的“小民”，已有了自我保护的民主意识，对明文规定的赋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很敏感。尤其是守着运河的船民，关卡的赋税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计。

“小民”虽小，官府虽强，但“小民”对说变就变、不能保持常态的制度，还是有着一定的反抗能量。

四、兢兢业业吃皇粮

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新关来了一个新主事，姓荆，名之琦。当他接到朝廷的任命时，惶惶不安，一再提出不愿意赴任，接连向朝廷递了三次奏折，请求辞官。

南宋时期，新任官员有三次“请辞”的惯例，以示对皇恩浩荡的诚惶诚恐，但明朝并没有这个惯例。荆之琦这么做，难道是在作秀，放了这么好的肥缺，来一出欲擒故纵的开场？

不过，读了荆之琦的理由，就知道他还真的不是在作秀。为什么？因为这是“蠹弊丛生之源”，在这体制内混的都是“狐鼠之辈”，再兢兢业业，不贪不佞，也总会让人轻视。但是三次辞官均被驳回，荆之琦无奈之下也只有上任了。

“吃素碰到了月大”，杭人的这句俗语嘲讽的是假念佛者，但荆之琦是真倒霉。他到任以后，先是遇到了春雨绵绵，一下再下，下得春蚕小麦全都没有了指望。后来是东北的努尔哈赤起兵，内河船只被征去军用。船只少了，征收到的船料、赋税也就一少再少。最要命的是，因为开战，户部又给各关卡追加了税额。

从赴任后的政绩来看，荆之琦还真是一个有作为的官员。船运萧条，赋税不振之际，荆之琦别出心裁地出了一招，搞起了“建设”，机遇没来先修内功。在一个“朕即天下”的时代，能有如此清醒的“执政为民”意识的官员，还真是北新关的大幸。

当时，北新关所在的路名叫“河塍”。这是南来北往的船只停泊的关卡，船家上岸，必须要走的路。无论是进关署纳税，还是进杭城采买，走这路要比走“西街”（如今的湖墅北路）方便。

但此路太靠近运河，一旦汛期水涨，这一条不宽的泥路就常常因河岸坍塌而受到破坏，因为无人修缮，遇到大雨连连的日子，不光腿脚有病的马匹四蹄难行，大多数人也只能绕道“西街”。

荆之琦要做的就是修路，他与杭城的几个“耆老”商量善筹资金，购买料石，雇工修建。从记载来看，后来的工程还真是堪称百年大计：路宽“若干丈”，这路以关署的门口为起点，往南往北，各延伸“三里许”，也就是一条六里长的路，临河一面，砌起了石坎，垒石为岸，整条路“廓然周行，坦然磐石”。此路共花费白银 2300 两，工期长达 6 个月。〔明〕陆玄锡：《北关修筑荆街碑记》）为此，荆之琦也搞得“罄空髡空”。不过，一个官员，愿意拿自己的银子来操办公益，并深深得到当时百姓的爱戴，将此街称为“荆公街”，还为荆之琦立了碑、撰了“记”，盖了“生祠”，这就不能不说是“权为民所谋”了。

生祠，也就是为活着的人盖祠堂，香火奉祀，这在旧时是很高的荣誉。陆玄锡在文章中除了颂扬荆之琦，也鞭挞了那些自我标榜善举的富豪权贵。说他们宁可争先恐后地去造庙造塔，施舍和尚，泥塑菩萨，却不愿意拿出分文来做一些修路造桥的善举，虚伪可憎。更多的文人，写诗文将“荆街”与“苏堤”并论，传颂杭城。

光绪后期，洋关设立，北新关撤销，“荆街”的说法淡出湖墅。从清时的地图看，“荆街”，也就是大兜路以大关桥为界的北段，现在拓宽为丽水路。不过，曾经的老大关桥东堍的闹市，仍在老湖墅人的记忆之中。

五、船料与课税

北新关署赋税制度的最终健全，在明后期的《商税则例》中可略见一斑。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初起，新技术被激发，商品百出。在《商税则例》的最后第十八大项内，又适时另立了“后定比例货物类”。其中如西洋细布、香坠肥皂等，又有一百八十多个条目，每一个条目，都列明多少货物该收几分几钱银两。

清朝承袭了汉人治关的全部“游戏规则”：“船料”照收，货物按大明的《商税则例》征收厘税。运河的关卡，依然“一船两制”。

笔者曾见过一张咸丰六年（1856）十月十一日的“黑桥官牙承揽船票”。黑桥，官名“宝庆桥”，码头所在，牙行林立。票上所说的这个租船牙行，是领有官府执照的正规店家。承袭到了咸丰六年（1856）时，店主是“孙广生”。为了表明他的“正统”，票面上还着重注明了店主的身分是牙行执照领取人陈育才的“裔孙”。该“船票”在落款上同时也注明租船人的姓名：“严桂”。

“船票”称严桂承揽到了郑、陈、毛三位相公的靛青（颜料）“捌拾壹担”。要着重解说的是这船票上的八个字：“杭关‘船料’船户承官”。“杭关”指的就是北新关，“船料”是要由船家承担。看来，船上的货物厘税，该由“郑、陈、毛”三位相公付了。

另有一张是套红印刷的“货运票”，上有“一路顺风”的大红字样，虽然是民国初年之物，但例举在此，可说之处有两点：一是该票注明“颜料壹箱、硫化元（青）五箱”；二是船票标注的出票处是山西“晋大昌货运票”。

可见，当时在运河关卡纳税的商贾，来自全国各商埠（以北方为主）；也说明，杭城确实是一个消费都会，尤其是丝绸印染，这几张难得见到的与运河码头相关的原始票据里，倒有两张是运颜料的。

商埠之“埠”，就是码头之意。中国商业的初起，靠的就是水运，尤其是运河。但清朝关吏、胥役的为所欲为，比明时更甚。嘉庆四年（1799），有一个曾为将佐当过幕僚的士人舒位，就以写诗的方式记下了北新关的胥役为所欲为的行径。虽然他事先有心理准备，知道“杭州关吏如乞儿”，但“昔闻斯语今见之”后，他还是大为惊讶。因为关胥根本没有按常规收取“船料”，而是持一把明晃晃的朴刀开道，挑包袱，撬箱篋，搜寻钱财。

舒位感叹说：我只听说酒要上税，没听说诗囊要搜；只听说“船料”要报，没听说船客的箱子要搜。大清的北新关胥役，在诗人笔下，如同山贼强盗。

六、太监与“长毛”

当朱元璋让太监插手赋税以后，连内宫的“公公”们都晓得这钱真来得比哈腰捡得都快。到了清朝，太监们根本不需用督查的名义遮遮掩掩，就可直接插手收税了。当然，这种媚上的提案，往往由地方提出。雍正七年（1729），江浙总督就提请将北新关税务交与织造（局）管辖。

织造局，是为宫廷提供绫罗绸缎的机构，主管江浙的国有织造“企业”，由宦官掌管。北新关的赋税，从此成了内宫花销的钱袋。这种状态维持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直到这一年，北新关的赋税才交还给了浙江巡抚府“兼收”。

道光元年（1821），北新关署的赋税，又回到了织造局手中。那时候，杭城织造局的门首漆色是朱红的，号称“红门局”。在晚清的“朝报”上，红门局里的小小胥役有过痛打抚台衙门官吏的记载。

《湖墅小志》称“湖墅”为“北郭一隅”，当时

“湖墅”的范围，“上自武林门，下至北新关”，可见当年“红门局”的手够长了。关署是杭州的门户，时称“大关”，太监把了杭州的“大关”，这天下不乱也难。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起义。江宁（南京）失守前，红门局的太监们早就逃得没影了。出逃的还有富商士绅，大多坐船奔了水路，杭州城内的人，一下子少了约有十分之四。太平军两次攻打杭城，袭北新关有过三次，关署两遭烧毁。

更惨的是，“贼所过，尽杀剃发人”，所谓“剃发人”指的就是前脑门剃光的大清顺民。“长毛”有“长毛”的规矩，对不肯披发“长毛”的人，“咔嚓”就是一刀。杭城的店家、商贾逃亡一空。到了太平军二打杭州，围城三个月，杭城中尚剩的五十万民众，吃尽粮食，吃尽“药材、南货等物”，然后是“芋蕪、草根、甘露、浮萍、杂草饱肚”。最后，吃观音土，吃人。

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进杭城是在同治三年（1864）的三月初二，据载，此时杭城已“减至七八万”口，鸟多人稀。左宗棠和他的同乡、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对杭城实施了几项“复苏”的措施。

首先是对钱塘江赋税关卡的开禁，胡光墉（胡雪岩）为此筹资设立义渡，为出逃回乡的士绅商民，免费摆渡。但北新关却没有开禁，难船虽无货物，也依然要收“船料”。

“下三府”（杭、嘉、湖）毕竟富庶，战乱前，不算地方截留，北新关每年上交户部的赋税超过22万两白银。杭城需要尽快恢复“繁荣昌盛”，但左宗棠也得考虑财政与兵饷。

七、大帅罢关

北新关不仅仅是一个关卡，也是省城的赋税机构所在。杭城“十门六关”（即十座城门，以及东新关、打铁关、观音关、八字关等税收关卡），都由北新关署派税役征收赋税。钱塘江码头的“城南务”（税署），为防潮汛，允许船只先行起塘（翻塘进入内河），但船家拿了税吏的“起塘小票”，也是要在次日到北新关署上单纳税的。

当时在关署的南面，有给船家卖税单纸笔的专营店，称“大单厂书”。那税单是一式“三连（联）”，如实填报后，一连交关署的“船柜”纳税，一连交关丁核对，另一连作为船家经过沿途各关的凭证。

太平盛世时，“厂书”（税单）的需求量很大，除了几家专门的经营店，关署街前各片店家都有代售。雍正年间，“厂书”的买卖出了一点纰漏，经浙江巡抚规定，独列一家专卖。如今，这家独一无二的“大单厂书”，也冷清得门可罗雀。

左宗棠认为，要使省城经济得到最快复苏，北新关的关费杂税必须暂停，以招揽全省物产、商贾来杭经营。只有如此，“根本”有了，“枝叶”才会昌盛，粮饷也就不成问题了。

左宗棠上奏同治皇帝，浙江省城“迭遭兵燹，凋敝不堪，市肆萧条，小民不能复业”。即使召回从业，也一时无法恢复创伤。此时，要再收他们的规费、税赋，无疑是“竭泽而渔”，最后致使“商贾糊口无资”，小民更加“穷促”。北新关试办已经三个月，所征税收寥寥无几。

守关的胥吏哪懂得什么叫朝廷利益为上？一旦设关，穷凶极恶的故态重演，搞得商人、乡民畏惧不归。因此请求取消北新关署，以顺民心。（〔清〕凌璋琳：《梓里丛谈》）

此时的左宗棠，极受朝廷倚重，被视为大清“支柱”，并刚刚获赐黄马褂一件。当同治帝阅过左宗棠《将北新关暂缓开设，按月由厘捐酌减，以抵关税》的奏折后，这位六岁登基，在风雨飘摇中才过了三年的小皇帝，居然握起御笔写下了“准批”二字。当然，这极有可能是他的母亲慈禧太后点过头的。

《清史稿·左宗棠传》对此仅记载14个字：“驻省城，申军禁，招商开市，停杭关税。”又据《清史稿·征榷》载，此后实施的“厘捐”制，就不是北新关那种只针对船家商货所征的税厘，而是对店家的交易所取。当然，运河“船料”就此取消，这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大小也是一个进步。

八、关税“变革”

杭州档案馆曾展出一张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三十日的运河货运票：“吴朝奉雇佣送至杭州顶坝，交卸口酒贰佰零贰坛”，并写明“捐厘二卡六五折”，船票由“苏州府关具”。

文中的“吴朝奉”，即托运老酒的吴姓账房。此票中“酒”前一字已经模糊，大概是指某种“黄酒”。“杭州顶坝”，指的是运河南端最终之坝，即“德胜坝”，当年是高高在上，有“顶坝”之势。这在《驳货码头：翻坝过塘》篇中有细说。

关于这张“货运票”，要说明的有两点：第一，该票上已经没有了征收“船料”的记录。第二，货物的“捐厘”，也就是赋税，可以打“六五折”。这“六五折”，还涉及到了“二卡”。从苏州府开具此票后的运行水域来看，“二卡”应该是指运河的浒墅关与北新关。

光绪年间的《湖墅小志》，有以下一段文字：“自粤匪（太平军）一乱后，北新钞关改为厘局，商货为避捐（厘捐）起见，大半从海口（即钱塘江水系）而出，从此过塘过坝者寥寥矣。”这也可以看出，为了鼓励货物在运河交纳赋税，清末的税制的确做了变革，“二卡六五折”，就是一种。

以上《湖墅小志》所说的“过塘过坝”，并非指钱塘江的“塘”与“坝”，而是指当时的上塘河、下塘河、子塘河的“塘”以及与这些“塘”相关的“坝”。一些货船，也就是通过或者擦肩而过杭州城，转往其他的几条水流，从而进入钱塘江。有关这一段，在《驳货码头：翻坝过塘》篇中有细说。

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一战，大清溃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内地租界、洋关渐起，拱宸桥以北也有了日本租界，建起了“洋关”。设洋关的本意，只是对洋商征税，到了后来，也开始对乡民的船只征税了。有拱宸桥俚歌为证：“春风飘飘旗一扇，一搭子西洋鬼子中华官；来来往往多少报捐船，只差子阴毛要得捐。”（〔清〕卜曙：《拱宸桥踏歌》）歌虽不雅，但鲜治地表达了民众对关税杂乱的怨恨。这，也已是大清的回光返照。

九、为“埠”以后

北新关，作为运河历来的船舶停靠稽征处，自左宗棠“罢关”以后，逐渐演变成了货物装卸的船埠头。由晚清到民国，尤其江墅铁路同行以后，货物吞吐量激增。1929年，仅招商、源通、宁绍、长杭四家内河轮船公司的营业额，就为159500银元。由此引发的挑夫对码头的争夺与团伙、帮会的形成，层出不穷。著名的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张啸林，就是在拱宸桥运河码头起的家。

1947年9月的《申报》记载：有两伙挑夫，在喻郑埠为争夺卸货，发生了400人的大斗殴，拼杀之惨并无细说。但地方上一再调解却毫无成效，帮会间的喝茶、品茶也根本无效。直到那一年的12月，在市府与警署的出面下，喻郑埠“拖延一年之纠纷，始告解决”。

要说明的是，这喻郑埠就是清朝的北新关，后来的老大关桥码头。也许，“喻郑”二字所包含的，是喻姓与郑姓这两位曾经的船埠“老大”所延续的势力范围。当然，笔者所要说

的，是一个曾经门户式的关卡泊船处，当年也只能称得“埠”。

2008年，运河综合整治，丽水路青莎公园重建了“北新关”。当然，这只是一个游览的去处，并非明清时期北新关的真正旧址。看《南巡盛典》卷九十二“程涂”图，当年的北新关是在北新桥与江涨桥之间，即如今的大关桥方位。以这一段结尾，并非多余，也是给后人一个北新关原址的念想。

北新关遗址 1

北新关遗址 2

北新关遗址 3

客运码头（上）：旧船票与卖鱼桥

一、旧船票

1

杭州市档案馆里收藏着两张旧船票，5公分长，3公分宽，略黄，薄如蝉翼。一张由（老）余杭码头售出，“票价伍角”，没注明到达地。另一张“票价肆角”，注明“杭州到塘栖”。比照路程，“伍角”的，应该是老余杭到杭州。按纸张与展出说明，这是近六十年前的船票，那时，杭州的轮船码头，是在拱宸桥的大同街。

当然，要是再往上说，运河上橦帆林立，以摇橹的乌篷船为多。大乌篷船有跑上海、南京、扬州的；小乌篷船有跑湖州、塘栖、德清的。那时，跑一趟单程的无锡，就算顺风丽日，也要整整两天两夜，还得担心半路遇到太湖强盗；若去京城赶考，顺风挂帆，也至少得要一个月。

晚清时运河上有了小火轮，虽然也是“与时俱进”的事，但洋务派官员还真颇费了一番周折。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给总理衙门信函《论试办轮船招商局》，就说到了此事。当时，这位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他和另一位洋务派大员张之洞创办了制造枪炮轮船的工厂后，又转念要将轮船引入民运商用。李鸿章认为此利颇大，不能让洋人独占，但也不能单等“国营工厂”造出一两只火轮来再让商人承租，而要“先招华商”，折归资本，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公司。

这一来，名义上的“官商合办”，实际上吸引的全是“商股”，故称“官督商办”。这也让那些轻民商贬洋务的“老臣”们心安理得了。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

轮船，用煤用炭烧出蒸汽做动力，海上跑的称“大火轮”，内河跑的称“小火轮”。据说小火轮从杭州跑苏州，一个来回只要一天，时人大呼“勿相信”。俚歌道：“七八丈烟囱高又大，影子跌落到姑苏；勿相信来勿相信，勿相信个西湖宝塔抬过湖”。“影子跌落到姑苏”，说的是一早从杭州出发，太阳落山就可到苏州了。

到了光绪年间，招商局内河轮船公司成立，总部设在上海。被《一个人的革命》一书称作清朝的自我掘墓人的盛宣怀，正是操办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某日，拱宸桥原大同街40号人声鼎沸，官商士绅拱手相贺，招商局内河轮船公司杭州分公司由此成立。

这也算是“国有企业”，一下子进了小火轮30艘，那阵势与气魄，生生将同一条街上的日商

“戴生昌”轮船公司压了下去，“戴生昌”在1918年变更公司名称时核查资产，也只有小火轮“十余艘”。租界内日商独家垄断内河轮船航运的历史，从此不再。（钟毓龙：《说杭州》，引自《杭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十二日，大同街40号船埠来了40个昂首挺胸的青年，他们

是浙江武备学堂从全省挑选的学生，学识优良，被浙江巡抚府保送去了北京陆军部速成学堂。中国，也从那时开始，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历史大转折。

在这 40 个学生中，有时年 20 岁的蒋志清，也就是后来的蒋介石。与他一起踌躇满志地踏上轮船的，还有杭州人黄郛，后来也成了民国的要人。那真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年代。

2

在此前一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实施新政以后，延续了近一千四百年的科举制度被废止。学而优则仕的晋身之阶突然断绝，读书人只好去寻找其他出路，有不少去经商的，也有搞轮船航运的。绍兴人王清夫、长兴人温锦生、钟学书，以及潘翔生、曹剑平，相继开设轮船公司，运河上一时风生水起。

到了民国，招商局的内河航运公司被浙江省建设厅承租。在众多私营公司的竞争下，官办公司屡败屡战。那时的船客也精明了，到了船埠头先不买票，看谁家的船先到，看谁家的报价最低，有哪些免费的服务，服务生是否殷勤，再做决定。当时的轮船票，以杭州到湖州为例，一级票 2.5 元，上舱；二级票是 1.8 元，中舱；三级票是 1.1 元。不同船票的船客享受不同等级的免费饭菜、茶水服务。

1927 年，潘翔生、曹剑平的翔安轮船公司为了揽客疯狂降价，无论远近，票价一律降至 2 角。于是，船客纷纷候在船埠头专等“翔安”船，所以翔安轮船公司的船次次人满为患。也开轮船公司的王清夫、温锦生一看这景，牙关一咬，便将船票一律降到 1 角。（钟毓龙：《说杭州》，引自《杭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翔安公司还首次引进了汽油机动力船，称“汽船”，也称“机器快班”，跑一趟湖州，比火轮快一个时辰。这样的竞争连续了两年，各家轮船公司纷纷叫苦不迭，好在航运公会出面协调，终于摆平了。

到了 1920 年，所有的轮船公司都统一了票价。在《浙江商品陈列馆季刊》里的《西湖游览指引》上，有一张苏州与杭州间的轮船价目表：每间“房舱”的价格是 4 元 5 角，估计最多能坐一家四口，当然也最适宜情侣。“官舱”是 2 元 5 角，在“官舱”内需要卧铺和餐饮的，套票 12 元 5 角。“客舱”就便宜了，也就是统舱，票价 1 元 4 角。“烟篷”，即顶舱，就更便宜了，因为那里会有铺天盖地的火轮烟囱灰屑，所以票价才 8 角。有意思的是，那时候从苏州到塘栖所有舱位的票价，和到杭州的价格都一样。

当时的小火轮吃水不深，大同街的泊船处，从严格意义上说，称不上码头，只是船埠头。哪怕 1905 年 10 月，杭州最早的铁路江墅线开通，钱塘江与大运河之间有了火车驳运货物，那承接货运的落船处，即后来的老大关桥码头一带，也只称为“喻郑埠”。

这也是民国初期的杭州，但对交通网络的设计，也算是深思熟虑。民国市政专家顾彭年先生于 1929 年在《市政工程行政》中说：杭州的船坞（埠）、码头，与铁道车站的衔接，要远离市中心，才“不至妨碍城市的交通”。所以，当年的船埠头即码头，大多设在拱宸桥南的两岸。从那年的内河航运业统计表看，前四大轮船公司拥有的轮船，“招商”是 37 艘；“长杭”是 12 艘；“源通”是 12 艘；“宁绍”是 11 艘。这要是全停泊在拱宸桥南，那气派真称得上百舸争流了。

当时运河的船只，不仅承担客、货运输，还担负银洋的押运。据 1918 年 9 月 3 日《申报》消息，当时的杭州总商会致函省会警察厅及沪杭甬路局，转告内河各轮船公司的报告：因为取消了钱票兑现的“贴水”（钱庄票据支付的费用），杭城与外地之间“大批现洋出境”，走的全是水路。这也引起了船主的恐慌，要知道北面的太湖强盗可不是吃素的，于是船主要求省会当局“出示暂禁”。如果“无锡、芜湖等处运米”到湖墅各米行，需要付现洋的，由钱庄转报总商会“填给护照”。“省会警察厅具呈后”，当月 5 日就满足了船主的要求，发了布告。

对于跑轮船的人来说，“公私合营”似乎比其他公司都要来得早些。1956年，各轮船公司合并，内河航运公司成立。客运、货运就此分设。货运码头仍在大同街，客运码头迁往卖鱼桥，也就是如今塑有铜像建了亭子的那段。

要赘言的是，卖鱼桥客运码头那组头戴铜盆帽，身穿长衫，拎着竹篾箱子的士绅塑像，表现的是民国人士的形象，那反映的应该是拱宸桥大同街原址的情景。

早时，卖鱼桥客运站这一路叫“珠儿潭”，有鳞次栉比的低屋，青石台阶的船埠头夹杂在民房中间，不少摇橹扬帆跑的乌篷船也停靠在此，客、货混泊。这些船埠头，有“一”字型的，台阶一级一级伸进水中；有“7”字型的，一块宽石板伸出，一侧向水中延出台阶。公私合营后，客船停泊处也进行了扩建，候船的“一”字型船埠头有19米宽。

1964年12月，杭州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即“市府”）协调省交通厅，拨了6万元人民币给港航公司，将珠儿潭26号到42号的老房子全拆了，建起621平方米的候船厅，还有46米长的候船雨棚，竖起了大气的立体字牌：“杭州轮船码头”。这在当年，是相当鹤立鸡群的鲜亮。

当然，泊船处也经过了挖掘疏浚，能停得一定吃水量的三层舱大轮船，“码头”一说，才真正名副其实。那时，杭城的人说去卖鱼桥，几乎成了坐轮船的代词。尤其当时去苏州的船票是3块钱，比起最慢的火车要便宜一半。不但经济实惠，也少了去上海倒火车的折腾。那时是每日一班，下午5点开船，上船睡一觉，次日一早便到苏州。

那轮船的中舱与底舱，全是铺着席子的板条座椅。一路好睡的船客醒来后脸上会布满席子的印痕，像盖满了私章，所以，杭州人也说“去苏州买席子”。渐渐地，此说成了俚语，说某人在睡觉，往往也可以说“去苏州买席子”了。

1972年4月，老波从卖鱼桥坐轮船到苏州，再到无锡，第一次近距离地“阅读”了运河。那是老波第一次从黑龙江回家过年，返回时囊中空空，决定和两位“插友”拼一张火车票。那时的长途火车票是一张纸票，路程越长，票子越长，票头是千篇一律用钢笔填写的日期。

拼车票的过程大致如下：前一人持票，在月初北上，5天内到佳木斯，再用5天寄回车票。后一人收到票，在日期上加“数”。譬如“2”日，加成“22”日。拿这种票的人一般是不敢在杭州上火车的，万一被识破，很丢面子。

老波到卖鱼桥码头去坐客轮，汽笛一响，船工“抽跳板”，一贯诚实的老波也就“破釜沉舟”了。一夜忐忑，几乎未眠，轮舱的机器轰鸣，太湖的波翻浪涌，让老波更加惴惴不安。次日一早，船到苏州码头，老波直奔火车站，不幸当真被老道的检票员“泊牢”了。大概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警察将老波关进一个窗户大开的房间后径自走了。老波四顾无人，便拎起行李，跨出窗台，火车是不敢上了，直奔轮船码头，又买了一张去无锡的船票。

苏州到无锡的时间比杭州到苏州更长，因为是白天，客船的停靠站极多，几乎是半小时就有一站，逢乡必停。汽笛鸣号，喇叭呼喊，上船下船，人声沸鼎，满船舱混杂着各种气味，包括鸡鸭小猪的气味，甚至污秽便溺的气味。

那是一个最“破私立公”的“革命”年代，运河上只有国营的港航公司客船，公社的货船也有，但客运营业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服务也差，无饭菜，无茶水，班船时间也“板”。水乡的人出门，除了自家有小船的，也可乘载客“柯黄鱼”的船。一位雷先生在1976年1月从余杭仓前回杭州，谁料误了时间，眼睁睁地瞅着班船鸣笛而去，他等不得次日的班船了，不得已叫了“黄鱼船”。比起国营轮船公司，“黄鱼船”收费就高多了，而且条件也差，如果赶上寒冬时节，“黄鱼船”上无遮无围，仅仓前到卖鱼桥的三个多钟头，人就冻得迈不开腿了。

余杭的仓前船埠头，在章太炎府第的正门口，有六米开阔的青石板一直延伸进了水底。可以说，章太炎先生一生中每一步的跨出和每一章节新思想的形成，都与船埠头（码头）有密切的关系。

直到雷先生坐船的 1976 年，杭嘉湖的乡民选择坐船外出，仍是极平常之事。所以，会有意保存前文说的那两张旧船票的，可能就是烧香老太们了。对这些老太来说，进一次杭州，或许就是一生中的大事，那船票都值得珍藏起来。

5

往往是蚕豆花儿刚开，她们便来了，在卖鱼桥上了码头。这几乎是 1956 年后三十多年来春天不变的风情，散客少了，组队的多。因为买不到那么多的轮船票，她们也有以村为单位的，一船一村，一乡组成一支船队。由一条柴油机船打头，拖着十几条坐满人的驳船，机船上站一个拿喇叭的壮汉，喊着进码头的行话。

下三府的运河支流多如人身血管，偏远乡村来的烧香老太，也成了尘封的历史里一抹亮眼的风景。她们系红带穿绿袄，肩背一只黄色烧香袋，头上也插花，鞋上也刺绣。有人手里还提着鸡鸭荸荠莲藕，那往往是要顺便到杭城拜访亲友。

1958 年前的烧香老太，总要过江涨桥去香积寺烧第一炷香。后来香积寺成了工厂，但仍有老太将香枝插在工厂的门口。再后来，她们下了船，就浩浩荡荡直接去昭庆寺，去净寺，去灵隐，去三天竺了。当然，也有专为祈福、求子而来的，她们往往继续坐船顺运河北上，走上塘河，去半山。三月初三的蚕花会，五月初一的娘娘庙会，是养蚕与求子孙心切者的必去之处。

杭城的生意人历来有“三冬靠一春”的说法，也就是冬季的三个月，及不上烧香老太来的一个月。湖墅北路 8 号有一位箍桶匠宋坤祥，现在算来也该九十多岁了。他曾告诉笔者，春时的香会，每一座寺庙前，各种摊位应有尽有。从二月十九的昭庆寺庙会，到十一月十五的海宁浒村庙会，一年里，宋坤祥去赶庙会，总要担了脚盆、水桶、水勺、锅盖，在卖鱼桥船埠头上落个十七八回。“下三府”的香客，个个要比“上八府”的出手大方。

不过，1956 年后的卖鱼桥，客船也有停运的日子。第一座新大关桥建成时，由于设计疏忽，桥洞高度不够，每逢雨讯涨水，船只无法通过。那时候似乎又回到了大同街客运时代，烧香老太从杭城返回了，猛见卖鱼桥码头贴出告示，她们没算好时间，天要留客。这时候，码头对面的红松旅馆就爆满了。

当然，以前守了码头的客栈、旅馆，不只“红松”一家。它们也不同于城里同行的经营，往往兼有为住宿者存放货物的服务。

二、卖鱼桥

1

卖鱼桥，在如今信义坊的东侧，横跨曾经的余杭塘河。后来的湖墅路，以此桥为界，有“湖墅南路”与“湖墅北路”之分。桥下的河水从西而来，东入运河。如今河断了，桥没了，入口处还在，即江涨桥的西南侧。在四百多年前的《西湖游览志》上，这桥的名字很美，叫“归锦桥”。那时候，桥两头的鱼肆是出了名的，乡民也称此为“卖鱼桥”。当然，不仅仅是卖鱼，桥两头还有闹市。有诗为证：“卖鱼桥下水平矶，鹅炙新鲜嫩又肥。五界庙前春戏散，蜜橙百果买包归。”五界庙，在卖鱼桥的西面，深受乡民喜欢的不是庙里菩萨，而是常年锣鼓不断的戏台，戏台两旁有楹联：“父老闲来消白昼；儿童归去话黄昏”，这完全是一个“群众性”的娱乐场所。五界庙后来成了珠儿潭米业公所，那已是民国后的事情。

那时，从卖鱼桥到武林门，全是石板路。1913 年 4 月 30 日的《申报》说：当时的卖鱼桥一路石板，但路、桥“破损厉害”。乡绅出捐补修，提出每过一辆人力车要“加洋五角”。可想而知，那时黄包车的硬胶轮在上下卖鱼桥时，是如何络绎不绝。尤其拱宸桥日租界“娼盛”时，俚歌道：“拱宸桥头勿比仔上海滩，大老信个衣裳油洗洗；摆勒个家主婆拨（让）

别人家困，豁脱仔瘟钱来嫖花娘。”虽然这是说下三府来的“衣裳油洗洗”的土财主，但城里来的嫖客也不少。他们南来北往，石拱的卖鱼桥是必经之地，年深日久，自然路也破了，桥也损了。

那时的卖鱼桥下，河水清清潺潺，有五六米宽，埠头连了埠头，都是鳞次栉比的店铺。店铺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他们在向河埠头延伸的同时，又将门外的道路占了，以致“卖鱼桥两岸河道被业户侵占”，把官府都惊动了。78岁的顾东华老人说，他从小生活在湖墅，自他懂事时起就记得卖鱼桥下的河水是没有船只航行的。为什么有水没有舟船？因为石拱桥拆了，建了平桥。这就是1928年的7月，“江墅公路”建成以后，它“北自拱宸桥湖墅起，南至江干三郎庙止”，这也是杭城南北通向的最早一条要道。平桥与河面间隙小，船只无法通行。

于是，一早卖农产品的乡船都汇集在了卖鱼桥东头的港湾、埠头。最热闹的，要数穿了蓝土布裙的男人，他们在一人多高的甘蔗船上，撒欢似的吆喝。其次是卖活禽的船，鸡鸭们也是“理直气壮”地高叫，让城里人两只三只地挑选。这时候，旧历年就一天比一天近了。

1953年，卖鱼桥再次改建，那是为了湖墅路的拓宽。不过，这一次的大手笔，是将一条运河支道填没了。有关这一段，在《御码头：皇帝老儿泊御船》篇有着重述说。

1966年，随着莫干山路的扩建，余杭塘河的流水被截留在了莫干山路的西面，只留下了“余杭塘上”的地名。再后来，东面的湖墅路又拓宽了，卖鱼桥没了，成了一道装饰性的石雕栏杆。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卖鱼桥西的河道还在。和那一个“全民经商”的浮躁时代一样，这条没水的河道也沸沸扬扬了起来，到处都是商铺地摊，商品之多，足以和如今的钱江市场媲美。

2

从卖鱼桥到老大关桥，旧时有九个码头，当然，以各码头的卸货所形成的行业，也成了分类清晰的同业店铺，如卖咸鲞（湖鱼、江鱼腌制的都有）的、米店、茶庄、南北货店、广杂货店、竹制品铺、手工艺铺，都此邻彼接。

如今的信义坊，当年并无“坊”的说法。出名的是“三巷两弄”，即信义巷、草营巷、豪潮巷、贾家弄、哑巴弄。它们或以富家的深宅大院出名，或以特色商铺著称。后者集中在其中两巷，即信义巷与草营巷，是卖鱼桥商铺的延伸。至于夹城巷就是以茶肆酒楼、烟馆赌铺等吃喝玩乐场所著称了，因为靠近老德胜坝，也算是“码头文化”的延续。所以，老湖墅人并没有将它纳入正正经经的“三巷两弄”以内。

信义巷与草营巷的店铺，不同于南方店肆的排门浅屋，它们极富北方商业“棉衣紧裹”的特点，深藏不露。大墙门外挂一块招牌，不识字的几乎会忽略而过。走进去以后，里屋厅堂就全是买卖所在了，席子、碗盏、绸布、杂货、缸儿锅灶，一个墙门就是一片商铺。运河的商业融合，从码头延伸，在此能见出南北的不同。

当渔民、菜农、贩米的商贾将船中之物换成银钱之后，或许钱庄是他们第一去处，将“大头”（银元）换成“小头”（银角），或者“小头”换成“大头”。叮当作响的银元敲击检验，也是一种乐趣。此后，就是逛店铺了，桥南的德大绸缎店和路西的仁号南货店那是必定要去的。这说的都是民国的年头，卖国货的与卖广货（洋货）的，揽客的招数各有千秋，热闹非凡。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卖鱼桥南的大众布店和工农百货店，也货品丰富，无所不有。不过，各种商品全要票证的时代，也让外乡的农人们又有了新的交易内容，他们会划了小船泊靠在船埠头，以农产品与市民交换各种票证。

3

还是五界庙在大明天下唱戏之时，在它的对岸，现在的大兜路，还是“蒹葭两岸响萧萧，山村烟廓外”一片。为此，文人们站在江涨桥上，也将“江桥暮雨”纳入了“湖墅八景”之

一。从“江桥暮雨”到“江桥渔火”，这同一视角中的景色切换，应该是在两百年以后的清朝后期。

这时的大兜路，因为众多的船埠头，更像一个农副产品的“超市”。鱼市、小猪行、孵坊（卖小鸡、小鸭、小鹅），以及水乡的土产，挤挤攘攘，天不亮已是人声鼎沸。时人说：“大兜晓贩趁鸡鸣，重则肩挑轻手提。市语行情听惯然，果称五月十三齐。”（清《湖墅杂诗·卷上》）

先不说“惯然”的行情市语，单说“五月十三齐”，即载船登埠而来的应时果蔬。“十三齐”，譬如笋、蚕豆、豌豆、香椿、韭菜，以及杏、梅、桃、李、枇杷、樱桃，这足以让冬季菜荒后的杭人看到了田野的新绿。蔬果、鱼行所形成的大兜买卖，应该是“大兜路”三字的由来。

老人记忆中 60 年前的大兜路，以鱼行最盛。“协昌”、“裕旭”、“协茂兴”三大鱼行，以及十几家小鱼行，仍在演绎着“江桥渔火”的尾声。过了午夜，来自德清、塘栖、新市、菱湖、双林的渔船到了。桅灯下，除了筐装的鲜鱼可直接抬上埠头，底舱的活鱼，都要用鱼兜劈里啪啦地起舱，人呼鱼跃。不过，要是在水乡的烟波浩渺中见过“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的艰辛，便也会明白这“江桥渔火”的诗意来得并不容易。

鱼行的另一种“闹猛”是开秤，一支大杆秤两米来长，酒盅般粗。当鱼筐挂到秤上的挂钩上，那秤杆要用扁担由两个伙计抬起。杆秤有 50 斤起花的，也有 100 斤起花的。“起花”，说的是头一颗秤花，“唱秤”人唱的是头一颗秤花后的刻度，各鱼行都有不同的唱腔，估计是来自师傅的口传“音谱”。这一种“唱秤”，现在很少有人唱得出了。

那“唱秤”的也好欺生，第一次投售鱼虾的，往往会将土产、烟酒放在他的脚边，求得高抬贵手。得了好处的“唱秤”，一般就不会少秤。尤其对渔民来说，他们送来的鱼数量不多，也没有分类，非常担心“唱秤”人给鱼的分类，因为“杂鱼十斤”和“鲫鱼十斤”，价格会相差很多。

除了记账的先生，鱼行的人都围了橡胶的围裙，绑了橡胶的鞋面。当然，后来大多是高帮雨靴了。他们也有行规，必须待客亲和，哪怕是鱼汛大年，送来的鱼虾多了，也不会轻易拒绝收购。尤其“协昌”、“裕旭”、“协茂兴”三大鱼行，宁可蚀本也不压价，按常规收，然后腌制、晾晒。所以，当鱼汛小年，小鱼行清淡了，三大鱼行生意照旧兴隆。

鱼行的出货，靠的是鱼贩，饭馆大户只是小头。那走街串巷的鱼贩，近百斤的担子一挑，草鱼、鲫鱼、鳊鱼、鳙鱼，品种齐全，做的是买主家门口的生意，指望的是越挑越轻。他们捏一把芦苇草，既赶蝇虫，也可以换气通风，要是挑担中的木盆装了活鱼，那芦苇就可用作覆盖物，走路时不易晃出水去。

有一位陈先生是鱼贩的后代，他说那行当全靠两张脚板，一双肩。当然，还得有保鲜的办法：盛活鱼的木盆一筐最多放两只，水是渔船上的原水。每当停下叫卖时，得不时地拨弄盆中水草。凡是大鱼，要尽快薄利出手，因为它们最容易死掉。

当年，杭城有一个专卖乌龟的老头，戴宽边的草帽，挑一副筐，担子也并不重，在街头行走时，缩脖塌肩，叫一声“乌龟”，拖了长音。有不敬者说：“卖啥像啥。”老头卖的乌龟，甲壳圆润，黄里透黑，背上有 13 块椭圆纹，浑厚得如同卵石。这种龟现在少见了，连浩荡的下渚湖中，都泛滥着外来的巴西龟。

1957 年，大兜路各鱼行公私合营，成了“大集体”，“武林门外鱼担儿”，也就没踪影了。

旧船票 1

旧船票 2

旧船票 3

卖鱼桥码头遗址

客运码头（下）：历史上的武林门码头

一、码头“夫妻”

几乎所有客运码头都分内外两块区域，内部是候船用房，外部是码头岸线，它们相互配合，衔接紧密，很像是成家立业过日子的两口子，妻子主内，丈夫主外。主内的调理家务烹制佳肴，时时恭候客人光临，在他们登堂入室时感到舒适惬意；主外的露天作业，在风雨中练就一身经得起碰撞摔打、结实可靠的筋骨皮。

武林门客运码头也是夫唱妇随的格局，丈夫比妻子大了两岁。这位“先生”有宽阔的胸膛——码头岸线总长 198 米，完工于 1976 年 9 月；那位“太太”额头明净、容貌俏丽，玻璃幕墙接受着四周倾泻而入的明亮光线，时尚而摩登——候船室竣工于 1978 年 12 月。两口子的“成家费用”花了人民币 100 万元。这个码头的前身是卖鱼桥客运码头，旧码头拆迁以后，在武林门安置了新居。

武林门客运码头的全部建筑面积有 3925 平方米，为省内内河水上客运码头之最。候船大厅采用网架结构，方正、宽敞，毫无逼仄拘谨的感觉，可谓举手投足皆有大家闺秀风范。建造者在这个客运码头的设计施工上尽心竭力、不惜工本，是因为此前，两幢地标式建筑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和杭州剧院相继动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建码头，当然要注意与之呼应协调，不宜小里小气、羞涩忸怩。而建筑材料与建筑工艺本身当时也有了新的发展，供建筑师挥洒的空间也就大了许多。

1969 年 9 月落成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后称浙江展览馆，用材极其考究，建筑预算大大超支，两万平方米的建筑地坪是彩色水磨石，台阶是黄色花岗岩，瓦片是琉璃瓦。建成后，每天早上 6 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 40 只大喇叭准时响起《东方红》的报时钟声，把这座方形建筑衬托得肃穆庄严。另一栋建筑物杭州剧院，作为展览馆的配套工程，1972 年报国家计委立项，1978 年建成，水磨石地坪，敞亮的建筑立面，在南、北、东三个方向均装饰了玻璃幕墙，由观众席入口拾级而下，半围合扇形梯级台阶，共排列着 1998 个坐席。

客运码头与上述两栋建筑几乎联袂而立，分别占据东、南、北三个地理节点，在外形上它们也有惊人相似的特点：敦厚、方正、沉稳。这样的设计风格，与北京人民大会堂可谓一脉相承。建筑学专家汉宝德先生在他的《建筑笔记》里分析过“方正”建筑的文化含义：“方正的标准在外形的要求上，是建立人造环境的权威性。”在当年的时间轴线上，总体的建筑风格趋向是严谨有余，活泼不足，即便一座码头建筑，也是一板一眼，不苟言笑的模样，呈现着某种“权威性”。

杭州剧院竣工当年，在这里召开了全市国庆庆祝大会，上演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古典芭蕾舞《葛蓓莉娅》。但是同年竣工的武林门客运码头，却迟迟没有启用。技术人员携带各种仪器，在那里做监测与分析，还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码头内部的“夫妻矛盾”，已经影响到了它的对外开放，框架结构的码头岸线一切正常，但是那位“太太”，也就是漂亮时尚的候船厅却有些“变心”了。竣工验收完成以后，大厅与地面之间突然开裂，起初裂缝像浅浅的月牙，问题倒也并不严重。但后来它却不停延伸与深入，“夫妻”裂痕的持续扩大一发不收，墙面就会滑坡、倒塌。不需要专业观察员的精准测量，光是普通人肉眼判断，已经能看出大厅南北纵墙的沉降。犹如家庭矛盾的道理一样，“太太”变心，丈夫也会跟着乱了方寸，码头与候船厅这时都偏离了原有位置，术语上称为“水平位移”。而且，候船厅的沉降并不均匀，就像一艘航行中的船只，并非随波逐流，而是在摇摆颠簸，于是这一棘手难题导致码头的开放一再推迟，投用计划甚至一度搁浅。码头刚刚建成就遭此磨难，当时港航

公司的经理乔淑铭和书记徐长余忧心如焚，他们生怕公司技术人员的监测分析不够权威严谨，数次邀专家亲临现场，仔细观察，共同把脉。但专家们谁也不敢贸然同意码头投用。观察监测工作持续了一年多，到了1980年夏天，专家们终于得出了结论：“候船厅的不均匀沉降已趋稳定，没有（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滑坡的明显迹象。”于是候船厅开始加固修补，弥合裂缝、稳固根基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2月底。1981年1月20日，位于武林门环城北路140号的新杭州客运码头正式开门迎客。有不少新婚夫妇选择到码头乘坐夜航船去苏州、无锡，开始他们的蜜月之旅。夜航船的诗意，由无边的夜色和航行的舒缓所组成。余秋雨先生评述，夜航船

“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但是由武林门开往苏州、无锡的夜航船，搭载的大多旅游观光客，并非漂泊异乡谋生的孤独旅人。那些情侣、夫妇，个个欣悦安详，如同1981年武林门客运码头的表情，甚至整个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表情，没有辛酸苦涩，唯有欢喜与憧憬。码头清波，逝水倒影，涤荡着陈年的烦躁，起锚的客轮吐气若兰，破浪而去，拖曳的水痕白沫挥出一串时代的箴言：“莫让年华付水流。”

二、码头“母与子”

武林门客运码头岸线全长198米，无论是骄阳如火，还是雨雪霏霏，它都伫立于烟水苍茫的岸边眺望来往船只。码头与船的无形纽带，柔韧而牢固。它们平日里若即若离，到头来终究相偎相依。没了码头，船只飘忽不定，像无所皈依的孤魂；没了船只，码头像清空了家具摆设、照明灯具、杯盏碗盘、欢声笑语的空巢，没有一丝活力，憔悴无神。那种无法割舍的联系，可谓“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野里”。码头牵手船舶，犹如母亲牵手孩子。

可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杭州的客运码头发往无锡、苏州的客运轮船，恰恰都来自江苏，码头的孩子并非亲生，皆是“养子”。那么杭州码头为什么不孕育一个自家孩子，好生抚养，让它为家里出力，待奉老母，而非要把自家的担子全部压到别人家孩子肩上？莫非杭州码头自己没有生育孩子的能力吗？

当然不是。要生儿育女，第一做母亲的要有强烈的生育渴望，有时还要借助祖辈或外界的影响。江苏的轮船公司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跑江浙航线，跑得久了，习惯成了自然。而当年外部环境对杭州这方面毫无要求，“竞争”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奢侈品，所以杭州“母亲”也落得清闲。杭州航运公司的大脑皮层“兴奋灶”，几十年里都停留在货物运输上，“重货轻客”好比“重男轻女”，时间长了，也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很难改变。

可是，为什么到了1980年，杭州航运公司会忽然不惜重金，筹集巨资300万元建造客轮与客驳，并在武林门客运码头迅速投用，开向烟波浩渺的太湖？是什么触动了杭州的“码头神经”，让码头的生育念头变得不可遏制？

这家公司在经历政治动荡和内耗之后，家底单薄，境况寒酸，1979年公司全年利润298.21万元。300万元的客轮、客驳的造价，不但将卷光公司上一年的全部利润，不足部分还要举债。他们愿意花如此大的代价，其背后的推力当然亦非同小可：计划经济的坚冰碎裂，市场拿着戒尺，叫醒那些沉睡中的懒惰企业。勤与懒不再仅仅是道德判断的标准，而是直接与企业的生死存亡紧密相连。

杭州的“码头母亲”，天天看着江苏的“轮船养子”在眼皮子底下忙碌，名正言顺地收取着银子，揣着鼓胀的荷包回家，那些钱按照惯例是无须孝敬“养母”的。多年来“养母”借助“养子”，依赖“养子”为她干活，因为没有利益瓜葛而相安无事。可是现在“养子”吃肉，“养母”喝汤，不平衡的局面使杭州“母亲”倍感失落——必须要养自家的孩子，必须要让孩子为家里挣钱！这种生育冲动一旦点燃，便难以扑灭。而江苏“养子”因为水上闯荡多年，技术精湛，嗅觉灵敏，杭州方面还在筹集资金准备开工阶段，他们就投放了无锡到杭州的游览航班，游船客流高峰期，一天可以运送2000人。他们的捷足先登，使杭州方面更是心急如焚。

1981年4月18日，追求效益的意识，终于引导着第一艘游船“龙井号”下水试航，驶向无锡。三天的试航，极为成功，5月29日，杭锡游览客班正式开通。因为江苏江南公司的客轮已经在运营了，“龙井号”就与对方客轮协调了时间，错落有致地互相对开，“母亲”和“养子”之间终于可以笑颜相对，犹如大快朵颐的食客，共同分享这水上的“航运盛宴”。

崭新的轮船“龙井号”拥有250个客位，全部选用了沙发软席，整洁的台散发着织物清新的芳香，漫步舱内，餐厅、小卖部、广播室、淋浴间一应俱全，24个卧铺位有单人间也有双人间。“龙井号”取名“龙井”也有深刻的隐喻：龙井是茶，运河是水，水为茶之母，“龙井”入水，犹如运河水在沏茶，茶香散发气味幽幽，一把移动铁壶携一脉清香，走到哪里都能醉人。

“龙井号”运行顺利，犹如亲儿子健壮能干，航运公司的高层额手称庆。但更重要的是，“亲子”与“养子”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协调，因为分食蛋糕而可能给两者关系带来伤害的危机，也被很好地解决了。经过筹划，省航运局批准同意，杭州至苏州的新航线开通，客轮又向着苏州进发了。

但是这一回，新辟航线触动了江苏方面的敏感神经，引发了他们的强力反弹，双方的协调异常艰难。苏州是富庶之地，苏州人历来亲水，杭苏线在1978年以后变得炙手可热，由杭州前往苏州的客流量，1978年是13.3万人次，1980年激增至32.2万人次，增长了2.4倍，黄金航线的含金量高到了炫目。此时杭州方面介入其中，横刀夺爱，苏州方面的不满就在意料之中了。

他们的理由十分充分：杭州多年不经营这条客运线路，这个市场是由我们辛苦培育、一手打造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太多的精力与汗水，杭州方面从来没有投入，现在看到有利可图，就跑来“摘桃子”了。抱歉！我们苏州码头不欢迎你们杭州船只停靠。但是杭州方面也不示弱：只许你们苏州的船来我们码头停靠，就不许我们杭州的船到你们码头那里去，这是什么逻辑呢？应该互惠互利，有来有往。既然我们不妨碍你们来掘金，你们又何必阻挡我们的财路？！

利益的纷争终于使江浙两家伤了和气，双方相持不下，“官司”打到了交通部，寻求解决的文件放到了部长的案头。时年63岁的李清同志在八路军120师工作时，就以善做思想工作闻名，在交通部任职期间的改革设想是“有河大家走船，有路大家行车”。江浙两家闹矛盾，交通部以“共同管理，共同经营，尊重历史，照顾现实”作为平息纷争的总体思路，具体协调方案则由两省厅局经磋商后达成协议，交通部不再插手。当年签署的协议书上明确规定：双方轮船对等对开的时间，定在1985年元月，“日班，1985年1月1日；夜班，1986年1月1日起，双方对等对开。”而在对等对开之前，杭州方面虽然可以参与经营，但必须尊重历史，在具体操作上作出让步：苏州在航线上投放2238个客位，六个航组运营，而杭州只能投放762个客位，两个航组。这样，就以杭州减少航组，延缓对等对开的时间，与苏州方达成平衡。

按照现代博弈学理论，这是一种合作性博弈，是对双方均有利的一种联盟方式。而这背后，有多少算度、争辩，有多少妥协、退让？其中需要掂量、拿捏的关系十分微妙，只有正式协议的谈判小组与签署者才心中有数。由杭州开往苏州的航班于1983年3月11日正式起航。杭州客轮的驾驶员，终于可以名正言顺、放心大胆地挺直腰杆，把握舵轮，让船驶向与杭州并称“人间天堂”的苏州。客轮冲破重重浓雾，从武林门客运码头出发，汽笛声悠扬绵长，但在知情人听来，心中却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三、码头来客

1992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一位身着藏青色西服的小个青年，带着七八个披着厚实军绿色大衣的彪形大汉，来到了武林门客运码头。

穿西服的小个子姓汪，是杭州国联电子有限公司的业务主管。早上董事长紧急召见，交

给他一项特殊使命。原来，沈阳的一家军工企业向公司订购了一批台湾原装进口的调理炉散件，交货时间就在眼前。对方一行七人由杨主任带队前来提货，估计下午3点左右到杭。国联公司经营小家电CKD散件，重要配件也确是原装进口，但是为降低成本，有些塑料外壳却是委托本地乡镇企业生产的。这批调理炉的塑料件此时正在康桥的一家注塑厂加工，最早明天晚上下线，加上冷却和装箱，起码要等到后天才能交货。但是客户今天已经来到了门口，怎么办？董事长给小汪下了死命令：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拖住客户48小时，做好接待工作，让他们吃好、睡香、玩得开心，绝不能节外生枝。随后，他甩出3000元人民币，嘱咐道：“省着点花哟！”

小汪倒吸一口凉气：区区三千铜钿，不够楼外楼一桌像样点的饭菜，要对付七八个人两天两夜的吃喝玩乐，够花么？看来这个月的业务提成又要倒贴进去了。他冥思苦想，想起了武林门客运码头的“天堂之旅”夜航游轮，顿时计上心头。

下午3点，两辆军用卡车准时驶入西站停车场。驾驶室里跳下七个东北大汉。恭候多时的小汪急忙迎上前去，一把握住一位中年人的大手。

“杨主任，辛苦！辛苦！”一阵寒暄过后，小汪说，我们董事长对此次合作非常重视，希望亲自和您面谈。他已从台北总部动身前往桃园机场，准备乘今晚的班机直飞香港，最晚后天早上就能到达杭州。他要求我一定要好好款待大家，留各位多玩两天。

“那敢情好！就有劳贵公司多照顾两天。”

“杨主任，我寻思着大家都来过杭州，西湖也逛得差不多了，不妨借此机会去另一个天堂玩玩。晚上我们武林门客运码头有去苏州的豪华游轮，大家在船上舒舒服服睡一觉，明早就能开开心心游苏州。既不影响休息，又不耽误时间。各位意下如何？”

大家一听，能免费游苏州，而且还是乘豪华游轮枕水而行，马上倦意全消，不约而同点头称好！

小汪早盘算好了：八个人来回船票连同“苏州一日游”的门票，撑死不超过2000元，剩下的1000元对付吃喝应该绰绰有余。当前最要紧的是尽快赶到武林门客运码头，若是错过了航班，一切都是空谈。

一行人赶到码头售票厅。客运码头售票窗口的上方，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各航班的售票信息。小汪抬头一看，只见在“天堂号”一栏，标着“双人舱客满”的字样，不由得心中暗喜：正中下怀，又能省下好几百元。但他依旧冲着窗口喊道“大姐！“天堂号”豪华舱还有吗？”售票员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早没了，黑板上写着呢！没看见？有四人舱，要不要？”“要！给我来八张。”

售票员朝窗外张望了一下，顿时满腹狐疑：“天堂号”的旅客大都是度蜜月的小夫妻，或者是年轻的三口之家，很少有这种八个人同船的“大户头”。瞧他们个个五大三粗，裹得像只嘉兴肉粽，这棉大袍里不会藏着铁家伙吧？好在售票处向西的不远，就是运河水上派出所，有什么状况“大盖帽”一叫就应。售票员还是有点不放心，便故意提高嗓门，打起半吊子的官腔：“票，可以先拿去。不过，上级通知，晚上可能有大风，说不定随时会取消夜间航班。你们留意听广播吧！”

小汪心里“咯噔”一下，默默接过票，忐忑不安地和大家走进候船大厅。其实，等船的旅客并不少，几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躲在大厅僻静处窃窃私语；一位系粉红丝巾的大妈，坐在通道口的候客席上，旁若无人地嗑瓜子；旁边戴鸭舌帽的大伯，跷着二郎腿，悠闲地看着报纸，偶尔回过头，从老花镜上方的缝隙，朝湖州方向的检票口瞄几眼；检票口两旁，十来个女商贩三五成群，坐在靠墙的塑料长椅上，互相交流着生意场、股市里、牌桌上的心得体会，大包小包新进的服装都堆在空出的座位上；三四个小孩子嘻嘻哈哈，骑着一只装有滑轮的行李箱，在光滑的水磨石地坪上溜来溜去；一位身着真皮风衣的少妇提着大哥大，一边打电话，一边急匆匆跑向门外。大厅四周挂着几只灰白色的大功率音箱，播放着时下最流行

的“西湖之声”立体声频道，《潇洒走一回》的旋律在半空中回荡“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小汪自然没心思欣赏叶倩文的歌喉，他满腹担忧音乐会突然中止，插播航班取消的通知。杨主任跷起大拇指赞叹起这个候船厅：“我曾经坐过大连到烟台的海上客轮，海军俱乐部的候船厅也没这等气派。”

“杨主任！北方很冷了吧？”

“那是当然！早下雪了。你看，俺们个个裹得像只狗熊。一过长江，捂得直冒臭汗，两天没有洗漱，身上都痒了。”

“不要紧，游轮上设有豪华淋浴房，通宵提供热水。待会儿上船，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咱们坐的“天堂号”是江浙一带第一艘内河豪华游轮，本来只面向国际贵宾、港澳台同胞，近两年才对国内游客开放。”一行人隔着玻璃幕墙，看见码头边停泊着十来艘大小不一、形色各异的船只，其中的“天堂号”游轮最为光彩夺目，比附近的“龙井号”、“太湖号”客船足足高出大半个船身，乳白色的船体，流线型的船厢，镶嵌着两排浅茶色玻璃的舷窗。船身中部两条橙红色和橘黄色彩带，使游船更显得洒脱飘逸。北方汉子兴奋不已：“这船贼漂亮，哪国进口的？船速快不？不会晕船吧？”

小汪中午刚刚翻过“天堂号”的资料，此时正好现炒现卖，他笑道：“大家尽管放心，运河的水流比较平缓，而“天堂号”又是客驳，由前方的“古运河一号”拖船牵引，船上的给水和电力亦由拖船提供，所以，船身无振动无噪声，加上舱室宽敞、视野开阔，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晕船。”

“高级！高级！的确高级！不过——”杨主任停顿了一下，将刚刚竖起的大拇指慢慢弯下来，接着说，“不过，这灰不溜秋的码头寒酸了一些。”小汪摇摇头，告诉杨主任，武林门码头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施工工艺基本沿用了卖鱼桥老码头的模式，仍旧是黑水泥浇筑的简易站台，预制板搭建的Y字型候船长亭，与码头上停靠的轮船相比就寒碜了。

这时，一位年龄最小的东北小伙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低着头，一脸的尴尬。问他咋啦？他红着脸，喃喃地说：“方才去寻厕所，看见一扇小门，就冒冒失失地闯了进去。没想到，里面坐着十来位抱孩子的年轻妇女，有的掏出雪白的奶子，正给娃娃喂奶呢！”大家哄地大笑起来。小汪连忙替他解围：“那地方是母子候船室，是省妇联倡议设立的，还属于国内首创。”

“高级！高级！南方人就是想得细致、周到，难怪比俺们东北发达。”

小汪突然想起一件顶顶重要的事情，赶紧转过身，向大门口旁的小卖部走去。他知道船上的餐厅里烟酒饭菜、茶水糕点应有尽有，但价格肯定比较贵，不妨趁现在多准备些，能省则省。小汪在小卖部要了四瓶红星牌二锅头和老奶奶花生、鱼片干、兰花豆等下酒菜，又要了些方便面、火腿肠之类。末了，还包了十几个现煮现卖的五香茶叶蛋、豆腐干。东北人见买了这么多好吃的，连声说：“多了！多了！俺们东北人的饭量没你们想象得那么大。”这时，音乐声戛然而止，大厅里刷地静下来，广播里传来标准的普通话女声：“亲爱的旅客同志们！开往苏州的‘天堂号’豪华游轮，即将起航。请大家整理好行李，准备检票登船。”接下来又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同样内容的外国话。大厅里一阵骚动，旅客转眼便在检票口排起一溜长队。

“天堂号”果真名不虚传。踏上不锈钢压花的防滑甲板，走进宽敞明亮的舱内长廊，恍若置身于一座水中豪宅。形态各异的吸顶灯、壁灯散发出温润的柔光，将紫罗兰的地毯染成淡淡的玫瑰红。船厅门口摆放着一面木雕边框的仪容镜，半人多高、两米来宽，镜背覆有苏杭美景的组合壁画。抬头是三组欧式水晶吊灯，低头是栗子色柚木拼花地板。船厅两旁，落地式丝绸窗帘齐齐敞开，窗外的景色一览无余。小汪他们的两个四人舱都在楼上，舱室的布局与列车的软席包厢差不多，但空间更加宽敞。青花素底的壁纸，配以黄白相间的地毯，软

垫沙发、多功能茶几、写字台、钢质软椅，一应俱全。一台 18 寸彩电的上方，悬挂着一幅西湖山水的风景画，给奢华的包厢平添几分雅致。八个人拥在一个舱室里，将好吃的摊在茶几上，掀开二锅头的瓶口，有的以瓶盖作酒杯，有的干脆对着瓶口，津津有味地吃喝起来。

鸣——鸣——鸣——

随着三声汽笛的长鸣，窗外的景色缓缓移动。小汪的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尘埃落定了。游轮快到拱宸桥时，旅客们纷纷走出舱外，靠在甲板的围栏上，欣赏大运河两岸的风光。夜幕降临，停泊在河埠头的水泥船上已升起缕缕炊烟，河面上弥漫着阵阵饭菜的香味。暗蓝的夜空下，隐显出人字顶、马头墙、老虎窗的黑色轮廓。一串明亮的灯光从黑暗处游出，如同一条透明的火龙，沿着河堤，贴地飞行，突然一个跳跃——那是 151 路电车，刚刚翻越陡峭的登云桥。河边人家的灯光陆陆续续亮起，将一排梧桐树的影子投射在水面上。一阵高亢嘹亮的歌声从船尾传来，那是杨主任正拎着酒瓶，在对酒高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四、码头结缘“小商品”

武林门客运码头与环北小商品市场本来就是近邻，各在环城北路的南北两侧。码头工作人员工作之余，会跑到马路对面的露天市场（当时还叫“红太阳市场”）挑挑拣拣，买点杂货。市场的起步几乎与客运码头的启用同步，后来，公路路网日益发达，码头水运的黄金时期渐近尾声，而红太阳市场却恰如一轮红日还在八九点钟的上升期，“退路入室”前，它已经拥有了几千个摊位。

对于市场搬进码头空地，有人作过分析，码头近水，水是财富象征，所谓财源茂盛达三江。但码头流动性大，如果不能扎下根，很快就会迁往他处。这句话倒是应验了，市场与码头的缘分仅仅只有五年。若说五百次的回眸才换得擦肩而过，相处五年也算是缘分不浅。

在 1992 年，地摊老板的身份已经让人刮目相看，虽然在码头搭建的市场大棚像一个简陋寒碜的大罩子，刚够把买卖双方和庞大货物群罩住，但是拥有摊位就意味着拥有财富。既然市场开进码头，某些码头工作人员就期望抓住这份“机缘”，疏通渠道，寻找关系，觅得一二摊位做点生意，为自己多开辟一条生财之道。市场大门位置在环城北路，当年即命名为“环北小商品市场”。虽然名为市场，但这个市场并未彻底市场化，工商部门此时还在参与经营。工商兼有管理者与经营者、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身份，一些期望进场的码头工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打通关节，拿到了摊位。

摊位到手以后，如何经营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一般不会自己直接从事第二职业，大多或转租出去，或请亲属朋友来摊点张罗买卖，自己可以坐收租金。不过，这一新开财源消失得太快，上级命令犹如晴天霹雳，震得那些人目瞪口呆：单位里拥有市场摊位者，无论职务大小，一律交还，否则将予以查处。上级的震怒来自两方面：第一，市场摊位有限，僧多粥少。原有摊主眼看着自家摊位被别人占着，自然愤愤不平，丢失饭碗的怨气发泄出来，告状电话接二连三打到了码头领导办公室，而各方面都不愿意看到动荡局面；再则，内部人员做了生意，上班还会一心一意集中精力吗？摊位也不是人手一份，像福利分房一样论资排辈公平分配，通过关系得到摊位者欢天喜地，无摊位者难免心情沮丧，冷嘲热讽。天长日久，势必造成人心涣散，人心散了，队伍也就难带了。这是上级统观大局，一刀斩断牵牵连连的烦恼丝，免生后患的考虑。当然了，毅然脱离单位下海经商者，单位亦不会阻拦。那些在市场行军床上摊开腓纶胸罩、摆开塑料发卡售卖的摊主，既有退役运动员，也有地位显赫的干部子弟。

市场虽然靠水，每天清早四五点钟就有人忙碌地进货批发，但是货物大都借助货车运送，水运已经不再吃香。码头的客流量也在萎缩。1995 年，杭州五家内河水运企业合并，组建为港航实业总公司，成为码头的新东家。但是纵然抱团经营，亏损却扔在延续。经历了分分合合的跌宕波折，码头形象疲惫。

2005年，开往苏州的夜航船停驶了。但是码头是不会湮没的，只要运河不干涸不枯竭，与它有缘的人终究会纷至沓来。

20世纪80年代的武林门客运码头

2012年武林门码头

“下乡”码头：小河船话

一、小河直街的“大隐”

1

17岁那年，虞振辉在杭州城内延龄大马路的德泰银号当练习生。1942年5月，他在书店认识了二十出头的王一峙，二人一见如故。虞振辉是个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一心想通过内线去重庆读书，与王一峙交往半年，推心置腹。某日二人约好走小河一路，先去“下乡”一带寻找国军游击队。王一峙说，那里他有熟人。

这一日，天刚蒙蒙亮，两人就来到小河直街老得胜饭店门前，找王一峙说的“熟人”。老得胜饭店客人稀落，门口放了“门板饭”，做的正是苦力生意。自从日本佬在康家桥设了岗哨，北面又开了一家颇为新式的“会安旅馆”，老得胜饭店生意寥寥，投宿人的光景比露宿的好不了多少。

早时，若不想匹马单行颠簸迢迢走旱路去临安、安徽，以及径山、安吉，走水路是最便捷的选择。小河直街是三水相汇，船来客往，三教九流，商贾云集，俨然一镇。日本佬刚占了京、沪、杭、嘉时，国民政府浙西行署就设在“下乡”一带，也就是杭人所称浙西北的山沟水乡一带。当时，在小河直街逗留过往的人，五花八门。

小河直街不长，去“下乡”的泊船埠头倒有五个。不过，与会安桥下的埠头相比，直街上的埠头显得小了，所以也有叫会安桥的船埠头为码头的。那时，去三墩以北的苕溪，以及余杭塘河上游的仓前、余杭，都在会安桥码头上船。

找不到“下乡”的“熟人”，王一峙说干脆坐船去何家陡门，那边有国军交通站。去何家陡门走宦塘河，祥符桥下有日伪军把守的头道栅栏，除了查看良民证，稍有不顺眼的，就人船拘禁。一般胆小的船家都停航了，能在河上跑的船家，多少都有点“根基”。

船家咕吱嘎吱地摇着橹，太阳正中，才过三墩。到何家陡门，已是下午。这里有日伪军的最后一条封锁线，船不能再往北走了。

在何家陡门的船埠头上岸，王一峙找到了交通站的“线人”，虞振辉这才晓得他的真正身份：浙西行署反敌行动团少尉。次日一早，由内线领路，翻山越野，绕过了陡门的日伪封锁线，来到长乐乡（现径山镇）的斜坑村。

这是一个临溪的小山村，在溪头山脚，有一座大宅院。有了王一峙的引见，虞振辉见到了浙西行署反敌行动团一大队副大队长兼三队队长朱思宏。

朱思宏和反敌行动团副团长兼一大队队长鲍自兴，都在省立一中读过书，对杭城相当熟悉。他问了王一峙几天来的进展，又问了虞振辉看些什么书，城里最近变化。虞振辉说，他想去大后方读书。让虞振辉想不到的是，这个国民党军人，讲的却是对国统区的不满。他说即使偏安一隅的浙西，特务也多如牛毛，稍不注意，就会招来祸水。

大队长鲍自兴，28岁，余杭丁桥人。国共合作时，听过来浙江视察的周恩来演讲。鲍自兴不愿看到大敌当前兄弟反目，暗中救援过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他的另一个副大队长张炳炎，是皖南事变时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新四军营长。后来鲍自兴得到对张的逮捕密令，就安排张炳炎安全出逃了。

朱思宏说，他们这些人也怕早晚出事，所以派王一峙去省城找新四军线索，备一条出路，

希望虞振辉在杭州能多多帮助王一峙。在朱思宏与鲍自兴的影响下，虞振辉打消了去大后方读书的念头。

鲍部的原副大队长张炳炎逃脱了抓捕后，隐身在小河直街的一个小小的文房纸张店内。王一峙、虞振辉离开斜坑村那天，鲍自兴指示王一峙去找张炳炎，通过张，再找共产党新四军。

在小河直街“陈记纸洋钱”的隔壁，有一家新开张的文房纸张店，门面不大。账房新来不久，穿一件短衫，好捧一壶水烟。他常在门口看纸洋钱作坊的学生子（学徒）拿了木榔头在木砧上敲纸洋钱：一块黄纸板，两面涂了锡箔，放在木砧上，木砧有一个银元大的模眼，木榔头下去，木砧翻身一磕，一个银元样的冥钱就出来了。

王一峙和虞振辉在小河直街下了船，很快就找到了“陈记纸洋钱”，隔壁纸张店的账房先生也正好出来。一抬头，王一峙差一点叫出“张队副”来。

2

不出鲍自兴所料，随着黄绍竑的“省政府”南迁龙泉县，浙西行署专员贺扬灵下令解散了鲍自兴所部。鲍自兴被迫率领一大队的弟兄，连夜赶到祥符桥，避入了张华夫的伪军部队。当时，宦塘河上的祥符桥是木结构，拱形，宽两米，桥上中央有木栅门，桥下水中有木栅栏。到了桥边，鲍自兴一声令下，叫放下武器，弟兄们一下子全不知所措，一百多号人死气沉沉地走过桥去。

鲍部后来被编为张华夫的第四中队，鲍自兴从国军的中校团副变成了“和平军”的上尉中队长，朱思宏调任第三中队副队长。第二天，杭城各家报纸，都以醒目的版面，刊登了“国军反水”的消息。这到底是为什么？鲍的老部下们都晕头转向，像是秤砣掉到井里——一咚（不懂）。

张华夫，早年在湖北沔阳当过红军团长。主力北上长征，张华夫率团留在湘鄂赣打游击，负伤后截去右臂，伤愈后与红军失去联系。抗战爆发后，张华夫去武汉再次寻找组织，被抓进了监狱。后来越狱，与几个狱友拉起了队伍，自称抗日自卫队司令。当他的部队被日军剿得走投无路时，就接受了收编，成了“和平军”。鲍自兴得知张华夫的底细后，一直在考虑与他联系。这一次投靠，也是万不得已。

那以后，经过多方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在鲍自兴部秘密成立，小河直街的文具店也就成了联络站。也就是在当年寻找苏南特委的途中，在长兴县槐花坎，虞振辉见到了新四军十六旅的政委兼苏南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加入了共产党。

虞振辉与苏南派遣的领导老罗一起从长兴煤山返回敌占区时，两人都穿上了汪伪军的服装。老罗一套是哗叽料子，上尉军衔，“和平军”第一师的胸徽肩章全齐。过了封锁线，到苏州木渎镇码头，上了一只拖了驳船的货轮。虞振辉记忆最深的是，在运河上过茫茫太湖时还遇上了太湖强盗。不过，在押货商人的周旋下，出了一点银元，有惊无险。那时，一条运河，兵匪混杂，苦的是乡民。

船过小河直街时，虞振辉与老罗在会安桥码头上岸，直接去了张炳炎的文具店。10年前，虞振辉老人说起这一段运河上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五年前，萧山新湾一位黎姓友人邀请我做客，他的老母亲那年90岁，是一位退休教师，名叫杭静芸。谈起笔者写的虞振辉回忆文章，杭老太太说她的丈夫当年就是鲍自兴的副官。六十多年以前，在祥符桥下的宦塘河，为策反跑过银饷。那时候祥符桥通往小河的流水，几乎就在杭老太太眼前。

她说，第一次策反是被人告发失败了，张华夫扣了鲍自兴后，又“仗义”地放了，并送了银洋，设了钱酒，同时也“请出”了鲍部的几个主要骨干。大家是在小河直街上的岸，各奔东西。杭静芸女士与丈夫，双双回了祖籍江苏。但鲍自兴并没有死心，第二次对“和平军”的策反成功，就不在本文述说的范围了。

二、说埠头，道船工

1

八十多年以前，杭城改为“市”辖，小河直街属杭县，与杭州市的交界处是会安桥旁的康家桥，此桥横跨余杭塘河。

从康家桥起，北至杀牛桥，小河直街长达一里。杀牛桥早就没了，旧址在如今的登云路口，属水塘支流的小桥。说这话时，“下乡”的邮驿店还在米店的隔壁，这也是前清的遗留。到了20世纪50年代，驿差的信件包裹几乎都委托给了各路船工。驿差只是从各埠头将它们扛到邮驿店分类，再背到各埠头托船家送出。

“下乡”来的包裹总是一些土产样品，也有客商要的小宗商货。小河直街上常见驿差的“信担”，扁担弓一样悠悠，直送省城内某某商号。从城里返回时，一副“信担”依然压得扁担发弯，那两头装的就是某些商号发往“下乡”的货了。

88年前，陈乃钊老人在小河直街呱呱落地，家里也有一条舱船，父亲陈德昌，专跑湖州埭溪一路。那时候，直街中跑“下乡”的船家有不少，直街的五个船埠头，停船难不次于如今的“停车难”。好在直街船民心平气和，少有钱塘江船户的剽悍，河埠头泊船，错时错位，相处甚安。

譬如，走埭溪一路，行的是夜航。每日两地对开，到了小河直街，船客上岸，船只即刻离开，停在不远的岸边，一根绳子，将船拴在岸的桩头上，不占埠头。只有即将发班的班船，才能在埠头停泊片刻。这时，船上人敲起了小锣，音色脆亮，也称“狗叫锣”。几家茶馆的伙计也会提醒茶客：“好嘞，某家的船‘狗叫锣’敲嘞！茶钱不要忘记付掉！”于是，挑夫、行客，匆匆踏上船埠头。航船待时不多，客不延误。

2

能叫得“航船”的，是大乌篷船，上下两层舱，摇的是四支橹。下舱装货，上舱能载三四十人。泊岸时，船头上有放锚起锚的绞盘，放时轻松，起时动静就大了，船工总要喊几声号子。顺风时，大船扯起高高的帆篷，宽三四米，高六七米，用几根拇指粗的苎麻股绳拉动，人称“抬索儿”。将绳子称作“索儿”，也是杭州老话。

扯起的帆上补丁纳补丁，要是吃了风，紧紧鼓起，扯帆更是力气活了。随了木质滑轮“嘎吱咕吱”，船工也喊起了号子：“哎呦！哎呦！”当然，这说的是走大运河的“江北船”。要是逆风，起航时要再加两支橹，咕啊咕啊地拼命摇。

顺小河去“下乡”的小乌篷船，只能载得一二十人，帆就要小多了，一舱前后两块铺板，两支橹。小乌篷船离岸时，船工撑篙，也会唱“一点深来顺顺流，二点浅来板梢走……”似乎是告诉大船的船工，小船离航，也是技术活。

冬日水枯，小乌篷船临近瓶窑、上纤埠，船工是要落地拉纤的。纤道狭窄，蜿蜒山脚，高出溪流许多。这时候的纤绳，拴在前舱板的那支毛竹上，称“纤竹”，近两米高，碗口粗。“纤竹”一旦弯腰，是纤夫着力的时候。大冷天，他们也只穿了坎肩，赤脚趴地地拱了腰，倾了头，喊一种能让女船客脸红的牵号子。遇到浅滩，船主出马了，撑篙探水。一旦搁浅，再寒的水，都得下了齐胯的河中去推。

要是夏日，纤夫一色赤膊，漆黑精瘦。也有光腩围一袭粗布的，让女船客们面红耳赤。这往往是船近桥洞，“头扳纤”（第一背纤人）走上桥去，这时，也见出他的巧来。只见他将纤绳慢慢盘在纤绳板上，瞬间一扬手，将纤绳板往下扔过桥洞。哪怕是乡村小桥，您看那纤绳板，拖了纤绳，准准地从桥洞一穿而出，鱼跃而起，稳稳地跃上桥头。只见“头扳纤”敏捷地一伸手，抓住纤绳板，再放出纤绳，下了桥，继续前拉。

待航的日子，船工们悠闲地在茶馆，冬天晒太阳，夏天乘风凉。顺便带一筐“下乡”的山货，放在茶馆门口，春有香椿，夏有鞭笋，秋有板栗，冬有野兔，卖不掉，也抵得一天的茶饭钱。

那时直街有七家茶馆，做的都是船埠头上下客的生意。一乐园、天乐园是双开间门面，拐角朝了河埠。小船嘎吱而过，摇橹的也会唱一首“摇进阿妹水埠头，等我天亮回杭州……”，也会唱一首“正月梅花带雪开，妹子送袄暖胸口；二月水仙堂前摆，一壶老酒等你来；三月桃花岸边延，船到埠头买绣鞋；四月蔷薇出墙头，妹子你可要等不及……”

也有泥鳅一样从水面滑过的小划船，喝茶的眼睛直勾勾地看，不吱声了，也不会去取笑。那些小船刷得锃亮桐油，土黄敞篷，头尾清爽。舱中夏铺草席，冬铺棉褥；舷有窗孔，尽收风景。这样的小船，划者或是船娘，或是船姑，清楚可人。船客可一人独雇，也可三五合乘，进得偏僻港巷，蒹葭白芦，野趣丛生。船客也有喝酒划拳，也有吟唱曲戏，尽兴与船娘作乐也有，袭的是前清士大夫遗风。

这些小划船大多停靠在后来的“长征桥”东堍。“长征桥”的名，也是“文革”时期的叫法。再早时，此段往北，河西多是曲柜敞屋的店铺，间隔船埠头。河东就无礮无屋，系了十几只如此鲜亮的划船。那船娘、船姑倒都是站在河西的。

要是来了黄包车，客官刚踏下车板，相熟的船娘、船姑就亲亲热热迎上去了，嗲气地叫一声“某少爷！”

“某老爷！”再放细声，叫一声河东的小船。于是，嘎吱水漾，双双落去。那划船的，据说只有两拨是直街上的人家，是父母与一对女儿搭档。

三、河埠头风情

1

春天来了，“下乡”的鲜茶来了，甞生茶叶店热闹了。彭公与径山的茶叶，满筐满筐抬上岸，清香满溢，茶叶店的堂倌开始“炒青”了。也有用竹箴的焙篮将鲜茶叶烘干，做成“烘青”。伢儿也躬身在河埠头，弯一枚绣花针，穿一根丝线，折一支竹竿，一条细蚯蚓穿上了钩，落下水去，石礮间大虾的螯就出来了。丝线噌噌地直，大虾噼噼地抖，钓满一洋铁罐，爹娘都会笑的。要是擗“鲳条儿”，钩粘了饭粒，上钩极快。

炎炎夏日，给酱园店送荷叶的小船来了，直街上的小贩也多了。卖瓜果杏李的是“下乡”人，背草把卖冰糖葫芦的是“江北佬”。卖刨冰的担子一踏上河埠头，那拨浪鼓就蝶飞似的响了。担子一头是隔年窖藏的冰块，另一头是各色碗盏调料。他“沙沙”地刨一碗冰屑，撒上糖，洒上薄荷汁水。喝得人一抹胸口，叫一声“凉！”

不过，在1928年《市政月报》的“市民须知”上，为了预防传染病流行，是禁止卖刨冰和冰激凌（时称“冰麒麟”）的。看来，偏僻而热闹的小河直街也给商人钻了一个“空当”。

树叶还没落尽，炒白果的来了：“盐炒盐白果，香也香来——糯也糯！”炒白果的落了船，上了船埠头，担子一头的铁锅“沙啦啦”地炒，那炒的是碎瓷片当幌子。热白果焐在另一头补丁百衲的棉袋里。

飘起雪花的冬天，上八府的铁匠顺钱塘江坐船来了。租了房，打起铁来。掌钳的从炉中夹出通红的铁，左手的小锤

“叮”一敲铁砧，徒儿停了风箱，操起一把大锤，“当”一声下去，“叮当！叮当！”星火飞溅，铁块从通红、暗红、灰青，变成了一柄锄头。这时，“下乡”的买主来了，一买就是两三把，捎带给乡里乡亲。

当“上乡”（上八府）补锅子的小船停在河埠头时，也就快过年了。补锅的拉得小风箱呼呼直响，炭炉生出烈焰，坩埚中的碎铁锅片熔成铁水。补锅的拿一块厚毡，抵住破锅的裂口，一手钳出坩埚，将铁水倒在裂口上，一手拿了另一块厚毡，摁平铁水，清烟徐徐升起。

2

过年的炮仗响过，船埠头来了武林班，也叫杭剧。六七个伶人，在茶馆里一坐，能变出

鼓板、丝弦、唢呐、锣钹，生、旦、净、末、丑，十几个角儿来。“为你小姐双珠凤，相公不做做书童”，晚上不出门的女眷，欢喜得脸都涨成了胭脂红。

最开心的是河埠头来了戏船，这说的不是“武林班”，而是说大戏。演大戏的雇的是大船，从嵊县或者绍兴过来。戏子的妆头箱一搬上河岸，一天半日是走不了的，小河直街像过大年。

这总是几个庙会的日子，一座关帝庙，农历五月十三关帝菩萨要做生日。此前要是再下一点小雨，那叫“关公磨刀”，戏就唱得更热闹了。在康家桥的北堍，余杭塘河的埠头边，有一座忠天庙，沿了余杭塘河，一色的青石栏，也叫“石栏兜”。一进忠天庙的大门就是戏台。一到土地菩萨生日，商贾乡绅，贩夫船户，都坐了船，鸭似的赶来。祭拜唱戏，整整热闹一天一夜。也有从苏州、宁波坐船来唱“宣卷”的，三四个人，三两把扬琴，唱白相间，曲调缓慢，总是一些劝人行善的故事。

只有“放焰口”的老小道士，是在安仁里住过两年的，直街人称“萧山道士”。老道士须发花白，每到庙会的日子，会露一手“调幡”的绝活。那是“放焰口”的压场戏，小道士在地上烧一个稻草堆，打开一个大布包。老道士握一支丈把长的晾（竹）杆，凭空擢划，口中念念有声。当晾杆的一头往布包上一掠，霎时跃出一只带了流苏飘飘的幡来，红黄相间，肚里亮起一盏灯，惊得一片呼声。

晾杆再一次往布包上掠去，出来的却是纸糊的“无常”。如此再三再四，黑无常一身黑纱，白无常一袭白袍，头顶高帽，足蹬长靴，露一副长舌，胸前是“一见生财”四字。萧山道士的“调幡”，总是以九盏荷花灯的莲花宝座收尾。当莲花宝座亮起，围观者一脸大惑，久久不愿离去。

四、远去的与找回的

1916年的夏日，直街西面的杭瓶公路在尘土飞扬中开通时，小河的船民们傻傻地在烈日下看着一个叫“汽车”的家伙。它竟然“卜卜”地屁股冒出烟来，人没着力，车却走了。摇船的骂：杀头的小娘养的，开得恁咯快？以后摇船的生意“介各”做哦？

这是杭州有公路以来，通往瓶窑的首班长途客车，起点就是小河直街，站台在如今的长征桥西口。这一路，在如今的104国道（莫干山路）还没有修筑之前，是号称“京杭国道”的。后来称了“和睦路”，也有误称“和睦支路”的。如今，高架盘旋，更是没了旧时的影子了。

杭瓶公路开通后，去彭公一路的坐船就少了，汽车的优势渐渐被乡人接受。不过，宦塘河尽头的“下乡人”，总还得靠船只来往小河直街。船民本以为就这么艰辛地过日子了，哪晓得抗战时期，祥符桥、康家桥一带又加驻了日本兵。从那以后，船舶更少了，小河直街的繁忙水运便渐去渐远。

等到运河中有了突突冒烟的小火轮时，因“下乡”的溪流时常滩浅，小河上依然是人摇纤拉的乌篷船。有意思的是，不通小火轮的小河，却被拥有小火轮的航运公司看中，后来公私合营的杭州内河航运公司的“大本营”，就设在小河路的南首。

慢慢的，直街人多了，棚儿延了棚儿，寮檐接了寮檐。一条小河直街，渐渐拥挤不堪了，连小弄小巷都不如。好在前几年运河整治，小河直街又出现了旧时的影子。虽然多了华丽，少了质朴，但毕竟还是找回了一点过去的念想。

三河交汇处

船上人家

三河码头：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篇

1959年，迎春花刚刚绽放的时候，小河地区骚动起来了，几十条精壮汉子把那里变成了热火朝天的码头建造工地。那些清早就扛着镐头和各色工具上工的男人们，有的虽然穿着棉袄却敞开前襟，让早春的凛冽寒风与喷薄的身体内火在胸前格斗厮杀，也有的笑嘻嘻拎着1.5匹离心式潜水泵，那是抽干河岸给水建造码头的有力武器，虽然马力偏小但“拳头虽小专打穴道”，作用不可小觑。这些造码头的精壮劳力，全部来自杭州航运公司的装卸中队，是几个月前刚组建的一支队伍。

开建码头进展顺利的消息，汇报到了党委书记张晓智那里，他正在接待一位退伍转业军人谈着他的转业安置问题。“好！很好，同志们要注意轮班作业，劳逸结合。你们有什么困难，也别吞吞吐吐的，让你们科长到我这儿来提，我们尽量解决！”因为连夜操劳睡眠不足，张书记的脸颊已经泛出青色，胡子拉碴的。撂下电话他的神情变得活跃，他为退伍军人沏茶点烟的时候，办公室的黑色电话机又响了。这回是省交通厅打来的：“上海民航社的17艘轮船马上转到你们公司，请你们注意接收。给你们算了算有525吨，呵呵，老张够你们消化的！”

“17艘船……噢……噢……”张书记喃喃自语若有所思，他的表情触动了退伍军人的好奇心，也使他迷惑不解，他小心翼翼试探着问道，“书记，俺是个老粗，说错了别怪，俺倒是有点闹不明白，咋上级给咱派船你不高兴？！咱不就是驾船跑码头的单位，船是咱的命根子，当然越多越好哩！还有么，就是俺们是个航运公司，开个船是咱本分，咋又干起修码头的活计哩？”

外行人的迷惑，正好给了张书记梳理思绪调整心态的机会，斟酌字句也许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不兜圈子一针见血给出答案，使对方领悟。“你是军人，咱们以前打仗，讲究有根据地，码头就是轮船的根据地。根据地少了，船来得多只能排队。现在全国都在大跃进，码头吞吐量，货物多得来不及卸运，所以要多造几个码头，疏散候港的船舶，让船走得快，货物动得快，这个意思懂么？”

“噢，一点就明白哩！”

“好！再说船给多了好不好，敢情好哇！打仗的谁不喜欢多些枪支弹药？跑船的喜欢船当然天经地义，咱们航运公司这些年一直在造船，上海求新船厂、中华船厂、江南船厂，都在为咱们造蒸汽机拖轮，造铁驳船。不过运力增加了，咱们要有胃口消化，没有人力消化运力，再多的船也是白搭！咱们班子过两天又要开专题会作个研究，这些事够我们忙一阵子的……”

据史料翔实的《浙江航运杭州分公司史》披露，杭州拱墅区境内1957年以前“仅有18座简易人力码头，大多数利用自然坡岸装卸”，但从1959年到1960年，境内小河地区石砌码头与木质栈桥码头数量激增，两年时间居然修建了19座，码头工人“自绘图纸，自制机具设备，日夜苦战”。如同同时代作家杨朔屡屡发出的赞美与感叹：“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跟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大禹媲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人面前，大自然的力量显得多么渺小啊。”（《永定河纪行》）……

储存油料的小河油库码头，虽然与航运公司建造的串珠成链的各式码头同在一个区块，但是它们的待遇几乎有天渊之别。油库码头是非请勿入的重地，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在它建成初期，需要配备经济警察，戒备森严地昼夜守护呢？因为它建成于1950年，是租用了“美孚”石油公司在当地2000平方米的简易桶装油仓库扩建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肃反”工作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些可疑分子需要甄别、审查，潜伏或派遣特务的活动并未中止，所以小河油库码头有必要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的突然袭击。小河油库经济警察分为两个班，24个人，属于企业编制，但在工作上接受企业与公安机关的双重领导。待各方形势都趋于稳定以后，这座新中国成立后省内第一座油库才由职工自行担任守卫，取代了经济警察的职责。

东濒大运河的小河油库码头，可停泊100吨级轮船。它的西部则是小河地区连片的居民

住宅区。1955 年小河油库扩建，省财经委与杭州市政府对油库的安全问题慎之又慎，反复权衡它存放汽油的利弊得失，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存放汽油以策安全。细看当年码头上成行成排的油罐，它们并非清一色钢身铁骨，油罐的组成可以分为三支不同来源的“部队”：新军、老兵和民兵。“新军”指纯粹最新制造的钢铁油罐，这一部分犹如油库码头的“少壮派”，在油库草创期仅占油罐总量的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二油罐，受制于国家重工业基础薄弱、钢材匮乏而不得不废物利用，把各地拆除报废的油罐钢板去粗存精，巧施妙手重组安装，使其枯木逢春发挥余热。至于“民兵组织”，是以水泥砖头砌筑起来的，身高七到八米，直径也有七到八米，头顶木头架子，底部接出一条输油管道的粗大笨重的储油容器。别看它们其貌不扬，外表寒酸，脾气倒是挺大：外界一有风水草动，热胀冷缩，它就会蠢蠢欲动，本来严密咬合的缝隙就开始游移晃动，水泥砂浆加耐油涂料的内壁容易渗漏，是土油罐的致命内伤，这是它走向停用乃至彻底消失的根本原因。

“新军”、“老兵”、“民兵”三支部队的“首脑机关”就在这个简易码头的简易泵房里，油库油料的进出，全部仰仗孤零零躺在泵房里的那台油泵。那里与其说是房舍，不如说是一个水泥保护罩，旧红砖砌成的墙上钉着白底红字“重点部位”的搪瓷牌标识，旁边还挂着一个可用来晒萝卜干的竹编大箩筐。河面吹来的罡风扑嗒扑嗒，掀动着房顶厚厚的落叶，以及房顶的玻璃钢瓦与防水板。用红色油漆刷于墙头的操作章程安全指南经过风吹雨淋，字迹早已斑驳，但已经化为操作工潜意识的一部分，指挥着他们手动付油、开关阀门的一举一动。戴银山是小河油库的老员工了，今天他的工作是卸一支船队共 10 条船运来的润滑油。防静电棉质工作服、塑料安全帽、绝缘手套和橡胶底鞋，这套行头都是不能离身的，如果码头溅开一点火星，惹来的麻烦可不是一点两点。像往常一样，他站在码头的水泥空地上，不断用哨子和手势指挥着船只靠岸。船队挨得很紧，是由一条船领航前行的，稳稳当当横泊在油库码头后，老戴一脚跨上船去，走向船尾，熟练地拖出船上安装的 10 米长的黑胶管，将黑胶管接口和岸上的管道接口“咔嚓”相连。这时二楼的工人徐师傅从窗口探出，用眼神等待着老戴的指示，老戴做了个“OK”的手势，大吼一声“好”，徐师傅按下红绿按钮，不锈钢按钮向上一扳，楼下泵房里的电机马达立刻“隆隆作响”。老戴走进楼下左边的隔间，手动关闭真空阀门，油开始通过 L 型 N 型碗口粗的银漆铁管，经过一个老式米桶大小的真空泵。真空泵里有个过滤网，阻隔润滑油细小的杂质，清洁油品。虽然过滤网被泵体包藏得严严实实，可经验老到的老戴只要俯下身子，听听真空泵里嘶嘶啦啦的声音，就可以判断滤网里杂质多不多，有没有到更换时间，还可以凭声音，判断油路去向。房间里的三条油路管道，通往不同的大型铁制储油罐，什么品质的油走哪条路，都有严格规定。经过 20 分钟的吸油过程，船身变轻了，慢慢浮上水面。一船油卸完，按动按钮，关闭阀门，松开胶管接口，把黑胶管递给船老大，开始卸第二条船上的润滑油……

骄阳似火的码头，老戴的身影来回晃动。他的蓝色工作服，黄色安全帽，在灰色的水泥泵房衬托下十分鲜艳醒目，犹如蓝色茎杆的黄色葵花，盛开于水波轻漾的运河沿岸。

下篇

1958 年以后，杭州航运公司虽然拥有庞大的船队和众多的船工，但是每每船到码头需要卸货，却不得受制于人，因为他们没有专业的码头作业工人，装卸业务必须依赖市属集体单位的搬运工。

1958 年“大跃进”热潮，码头吞吐量剧增的现实使公司党委不得不决定成立装卸中队。刚担任书记的张晓智拍板决定：在公司船员、排运工当中抽调 90 名精壮劳力，编制 7 个工班，组成杭州市第一家全民所有制的港口专业装卸队伍。

这支队伍，归公司运输科管理，组织等级分明，业务安排井然有序。每天早上正式上班前 10 分钟，码头作业班班长到码头作业的指挥中心调度室，领取作业单，认清作业码头货

品名称与具体数量，带领全班员工下船卸货，并运入仓库储存。工人们对待卸运的货物什么脾性，如何对付，都“哑巴吃馄饨——肚里有数”。譬如运来 100 吨钢材的货船靠岸了，一个班组 9 个人协同作业，不过几个小时，就干净利落地卸完了。

他们感到难弄的，反而是那一船船纸板箱垒成的百杂货。纸板箱大小各异、轻重不同、包装不一，搬运、装车、打包都格外费时。装卸工对付它，好似“大花篮提水——有力使不上”。

航运公司装卸队只为本企业的船舶运输服务，但忙闲时间并不均匀。货物密集压港时，作业时间密不透风。大家脚不点地，神经紧张，体力消耗惊人；而一旦无货到港，或天降大雨迫使作业中断，就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工人们挤在仓库里说说笑笑，打打扑克，班组长则在码头调度室里吃茶。

码头调度室只有二十来平方米，小小的空间坐着两个男性调度员，各占一张三屉桌，墙上贴着日、月、周的报表，偶尔会出现色彩鲜亮的电影海报。工人们路过调度室只是匆匆瞟上一眼，极少进门。一口小小的加盖水缸放在门口，一管长柄竹勺搁在木盖子上。路过的工人有谁渴了，就会停下脚步，取勺舀水。在他们畅饮的时候，有时会听到屋内激烈的争辩，调度员与船老大的在任务安排上出现意见分歧时，船老大的粗嗓门总是居高不下，这时往往有人居中调解，做起“老娘舅”，递两根烟，打打圆场，原本凶巴巴的吵闹声变成了欢快的笑声。

码头工人上班少不得做三件事：叼签、弄棒、喊号子。他们弯腰弓背摇头晃脑，把船上重达两百斤一包的米袋或者糖包越过跳板背到仓库。在上岸时，他们的嘴里都会叼一根长度超过筷子的竹签。竹签是码头工人与船员之间计算货物数量的凭证，竹签长 35 厘米、宽 2 厘米厚半厘米，颜色暗红沁亮，包浆厚实。

弄棒，是指缺乏机械化设备的时代，工人装卸货物时一般使用杠、棒、扁担、螺纹钢撬棍、绳索等比较原始的工具。手腕粗细的杠棒，长短不等，它可以穿越绑扎货物的绳索把货物提上码头；老毛竹制作的扁担韧性强耐得重量；螺纹钢撬棍是卸钢材、油桶等笨重物资时的工具；白麻绳之类绳索，妙的是打结时候的活结与死扣，兜来绕去，都是技术。至于挑酒坛子的专用铁圈，搬砖块的专用竹夹，式样古怪，但趁手好用。它们后来在吊车、电瓶车、钢丝绳、夹子网和抓斗等各种新型装卸设备的咄咄逼进下，一步步和码头告别了。

在单调繁重的装卸中，唯有劳动号子，是码头工人唯一带有诗意的象征。但是这其中也有局外人的误读：所谓的劳动号子，不是码头工人的文化娱乐项目，而是他们保持步调一致，控制货物平稳运送的一种辅助方式。两人或几人抬着一件货物，大家怎么才能用力均匀呢？要靠气息来控制肌肉的动作，通过号子传递给对方，对方和着

“嘿哟——杭哟”，“走过去啊——荡转来啊”，双方动作就能匀速掌控。即便在颠簸的跳板上，他们也能够踩稳步点，集中思想，像演双簧一样协调自如。最常听见的号子，是“哼罗——呵罗，哼罗——呵罗”，在码头工人到了年迈体衰时那永恒不变的曲调也会响彻梦中。劳动号子的节奏大同小异，其中的词倒是有发明创造的空间，20 世纪 60 年代流行过的劳动号子：“你要——给钱——走好，我要——给你——钞票，钞票——好买——手表，手表——送给——老婆，老婆——会生——儿子……”抑扬顿挫、节奏强烈，但它只流行于陆地上的搬运工口中，码头工人可没有太多闲情逸致去琢磨这些字句。他们最大的乐趣，还是比赛或打赌，谁装卸快，谁扛麻包多，谁饭量大，谁酒量好，一分钟之内谁棒冰吃得多……只要想得到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比个高低，决一雌雄。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打赌有时成了码头工人的乐趣！

码头工人王胜开二十岁出头时开始在哑巴弄码头当临时工，后转为正式工。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与人赌气斗殴，但是为了争一个奖金评定的等级，他自出娘胎以来头一回和人打赌比赛扛糖包了。工友们看到这样的场景，自然最是欢喜，他们有的争做裁判，有的

则要瞧个热闹。王胜开与同班的沈师傅各自面对一条 60 吨级满载糖包的货船，像初生的牛犊跃跃欲试。糖包一包重两百斤，吊车一次也只能起吊 5 包，沉重的砸得死人的糖包当时竟成了比赛的筹码。

沈师傅往手心里吐口唾沫，似乎志在必得。他的对手王胜开空闲时只喜欢躲在角落里看小说、画素描，白白净净的书生相，能有多大力气呢？两人几乎同时蹿上码头，一猫腰扛起了糖包，起初五六个回合，两人全部健步如飞，互相步点都咬得死死的，扛到十来趟，沈师傅的步子就有些踉跄了，他沉重地喘着气，看着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王胜开来回飞奔，步点慢慢松懈下来……旁边的工友也看傻了，他们从没发现王胜开有这般能量，仗着一股蛮力，不到半个钟头，把一叠小山似的糖包全部卸到岸上。王胜开弯着腰，双手拄住膝盖骨，额头滴着汗，望望沈师傅包办的那条船，只见沈师傅坐在剩下的七八个糖包堆上，苦笑着在那儿喘气……

豁出半条命，王胜开得了班组里二等奖。但这疯狂的半小时也耗尽了小伙子的力气，让他在床上躺了两天，第三天爬起来仍然腿肚子打颤，双手好比刚刚打好的糯米年糕。腰部陈伤就此落下，像一颗不褪色的图章，一到黄梅雨季就会敲打王胜开的记忆，提醒他年少轻狂的半小时付出的代价。

孙铁山，另一个学徒出身的轮机工，17 岁进航运公司时，精干巴瘦一个，人都叫他“小铁山”或“小铁头”。因为他人虽瘦小，干起活来却精神得很。150 公斤的大油桶他照样与人从晃悠悠的轮船跳板扛到码头上。由于他工作出色，学徒刚满师就被公司调入团委办公室。浮动颠簸的船上生活与清静的办公室看似是全然不同的世界，但当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浪潮却到处一个样。孙作为年轻一代的团干部和公司许许多多朝气蓬勃的团员青年一起，响应党委号召而组建了“青年突击队”并成为活跃在小河码头的一大亮点。凡港口有积压船只待卸，团委的鲜艳团旗和“青年突击队”字样的红旗就飘扬在一线码头。突击队出发前，开路的还有大小鼓乐队和“向前，向前，向前——”的嘹亮战歌声，沿路引起市民的围观，场面蔚为壮观。

突击劳动是繁重累人的，但大家的心情总是畅快活跃的。尽管手上磨起了串串血泡，尽管夜以继日地挑灯鏖战，毛泽东时代“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的热血青年始终毫无怨言。每每在极度疲惫又饥饿难耐之时，听到搞后勤的一声“点心来了”，大伙都会欢呼雀跃地汇聚一起，脱下黑糊糊的脏手套，接过后勤同志递上的两只表皮暗红发亮的香蕉酥，不过分把钟，便都狼吞虎咽地吞入各自空荡荡的胃里。而孙铁山则总是吃一只，省下一只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带回家里，给他儿子小军军。

因为码头工作的高强度与超负荷，相应的工资待遇及福利都比较丰厚。外表儒雅的王胜开受到每月 50 多元工资与 44 斤粮票补贴的强烈诱惑，放弃了小学老师的职业，改行做了码头工人。工人阶级！响当当的名气与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再加上凭着一张医疗三联单走遍全市各大医院，求医问诊畅通无阻的福利待遇，社会主义的阳光使王胜开倍觉温暖。曾经喝过的墨水，足够他为班组撰写总结报告，为大字不识的同事代写家书。虽然码头工作也给他埋下了伤痛病魔的隐患，比如腰部陈伤，颈椎骨病变，膝盖骨磨损以至于行动不便……但王胜开从来无悔他的选择。

尾声

建造小河码头的时候，班长会瞅准时机大叫“歇一歇了！”

“吃根香烟再做啵！”工人们摘下棉纱手套，甩甩胳膊，把衣兜里压扁的“雄狮牌”香烟掏出来散给众人，因为烟丝已经松懈，省掉了敲击其中一头的步骤，直接上嘴就吸。透过慢慢松动、飘散的烟雾，师傅们看见了清澈的水面上姿势优美的白鹭在盘旋飞翔，和蓄势待发的灰色鹭鸶。由于对于鱼类水下的行驶路线判断精准，鹭鸶精心策划的伏击战往往完成于一瞬间，鱼类来不及叹息就被它的长嘴死死啄住，毫无办法。但是这也是鹭鸶最后的英姿。

噩梦很快降临了，麻纺厂、印染厂、炼油厂，多少家工厂的工业污水汨汨排入运河。随同大小不等的黑块一同升起于河面的，还有鱼儿的尸体。40年后，多家企业纷纷迁离小河码头，那静水流淌、白鹭翻飞的优美画面才得以重回眼前。而此时，当年那些建造码头的工人，早已步入暮年、退休在家，他们辛苦建造的码头也因为河岸驳坎的改造、交通运输业的剧变而几乎消失殆尽。

“我的生命已近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昔日的风采和荣誉已近消失。它们随着对昔日事业的憧憬，带着那余晖消失了。昔日的记忆奇异而美好，浸透了眼泪和昨日微笑的安慰和抚爱。我尽力但徒然地谛听，渴望听到汽笛鸣响时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机动船螺旋桨急促敲击睡眠的动人节奏。”

这一段经过改写的麦克阿瑟将军《老兵不死》的演讲词，也许可以表达已经消亡的老码头的心声。

它们还在静静谛听吗？

三河码头雕塑

1959年团员义务劳动，有锣鼓相送

年轻时的孙铁山工作照

谢村码头：泛政治化的“行为艺术”

一、搬迁与憧憬

1970年的谢村码头，究竟具备了怎样的风姿、身段和魅力，才吸引它的主管单位杭州航运公司放弃盘踞18年的老巢小河惠安桥9号，不惜动用大量人力、财力，把公司总部搬迁到那里？

谢村码头地处郊外，没有水草丰密、鹿鸣呦呦的妩媚风景，只有纯粹的、男性化的码头风光。细加考究，是来自两方面的声音，合力召唤着航运公司前来。第一，1958年诞生的谢村码头命运坎坷，呱呱落地即遭逢“三年自然灾害”，停工下马，后来复建才得启用。后来省里重点开发长广煤矿，带动了各种土煤窑、小煤窑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使谢村码头成为省里煤炭中转重点码头。转运煤炭的码头，自家的命运也该“转一转”了；其二，高层设想将杭州东部艮山门火车站铁轨延伸北上，斜插至谢村，打破其单一的码头功能，让码头、车站互相借力，使煤炭既能涉水，也能飞驰。码车、站并存的格局甚至有可能扩大谢村的规模，使这个多年来宗族血缘关系牢固的乡村更加兴旺。

航运公司动迁伊始，内部的质疑、诘问、不满、牢骚，就没有消停过。“这年头，光听说知识分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国社科院的教授也下农村了！可我们工人阶级，怎么自己给自己下放了？”拱宸桥在当年一般被认为是杭州城市的北部边界，再往外就是郊区，而谢村距离拱宸桥的直线距离大约在3200米左右，距原来的驻地小河惠安桥当然更远，大大增加了职工上下班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对待搬迁，职工的心态各不相同，有的唉声叹气，有的随波逐流。老话说：“把耳朵放进人群里，你什么都能听到。”公司高层当然也洞悉职工的抵触情绪，但是他们更信任自己对于码头前景的判断：马上，这里会成为一个年吞吐量百万吨级的大良港、大码头。而疏浚港池前沿工堤、拓宽港池的工作，早在搬迁之前已经开始了。公司搬到谢村码头，对公司和码头来说，也许都是一次机会。

二、搏斗与拉锯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黑色明信片》中写道：“台历已经写满，未来难测”，“雪落在铅一般静的海上，阴影在码头上搏斗”。这两句诗用来形容谢村码头1970年前后的形势十分恰当。当年左右码头“转运”的两股势力和怒潮，在码头绞杀、拉锯，使码头本身进退维

谷，无所适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似乎有利于码头经济飞速发展。1969年8月、9月，杭州“文革”中两大造反主力军“省联总”、“红暴派”相继宣布解散，大规模武斗终止。1970年10月，曾经关押审查众多无辜群众的杭州“社会治安指挥部”撤销，社会秩序渐渐平稳。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闭幕，全会批准的“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与码头相关的交通运输，计划提出要建设“比较发达的交通运输业”。

庐山会议结束当月，谢村码头的“主人”：杭州航运公司召集运河沿线与码头相关的四家单位，开了一次“九月会议”，修筑从谢村码头到瓦窑头的公路，以拉近码头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加快货物流转。会议开得很成功，中国石化集团下属杭州炼油厂，以及杭州船厂等单位全部同意，这一计划预算中的18万元修路资金由各家受益单位分摊。“这条路修通了，咱们各家的货跑得快了，也给沿线老百姓得了实惠，他们进城不更方便了？！咱们赶紧起草个报告，送上审批吧！”

公路沟通谢村与瓦窑头两地，所以简称“瓦谢公路”。修筑“瓦谢公路”报告送到杭州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指挥组很快批复同意，于是在12月江南阴冷的瑟瑟寒风中，全长2.9公里的瓦谢公路挖出了第一锹塘路烂泥。1972年9月，瓦谢公路建成通车，比原先从城里进入码头的公路缩短了2.5公里。在瓦谢公路动工的喧闹中，公司陆续从原小河驻地迁往谢村码头。

然而，正当相关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意想不到的问题又悄然降临了。《杭州大事记》记载，“1973年2月，中共杭州市委、市革委会调整组织机构，一大批部局领导干部恢复工作，重新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同年11月，“帮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强占杭州屏风山招待所举办学习班，要求落实所谓新干部政策。他们在山上成立“浙江省上京控告团”，罗列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罪状”，图谋让老干部偃旗息鼓靠边站，为“文革新贵”腾出上升空间。航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呼应着屏风山的一举一动，动用公司资金12900元，作为活动经费赞助单位里的某些人“上山反潮流”。码头人上了山，好比鲫鱼跑进鸟巢觅食，偏离了自家的生存之道，对于脚下码头的提升改造与利用，也漠不关心起来。“跟上好人成好人，跟上巫婆学跳神。”公司内部也分裂成势如水火的“小河派”与“谢村派”两大势力，时有摩擦、冲突。

1974年5月的一天，“小河派”纠集几十人赶往谢村，欲进航运大楼请企业领导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听取意见，“谢村派”拦住他们去路，让他们离开办公大楼，被激怒的“小河派”死命往前冲锋，双方殴斗厮打，造成多人受伤。当年，航运公司亏损289300元，这是它在历史上的首度亏损，而此后两年航运公司也持续亏损。码头乱象激发了“民间艺人”的创作热情，他们凑出了一首琅琅上口的“头”字歌，很快在职工间不胫而走，广泛传唱：

党委书记爬山头，
阿毛舞棍动拳头，
浑水摸鱼捞甜头，
企业混乱无盼头，
广大工人吃苦头，
气恨难消心里愁。

1974年，拥有2593名职工的航运公司，像一条遭遇顶头风的漏水破船，在谢村码头孤独地漂流。码头陷入动荡、惊惶、痛苦的日子。直到1975年1月，中央下发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很快着手进行行业整顿的效应在谢村码头也立竿见影。1975年1月杭州市委下发4号文件，免去航运公司主要负责人职务，由“文革”前的一把手接任。在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公司另一派系“谢村派”忽然开始发难，他们纠集一批外单位人员，头戴藤帽手持铁棍，于1975年1月20日突袭“小河派”在小河地区的办公室，猝不及防间有人受伤倒下，但公司领导更替的事实已成定局，难以改变。

三、一次行为艺术

此前的1974年11月，航运公司已重返小河惠安桥9号。导致公司回迁的因素是多重的——内部职工的怨声；相关物资单位因路途遥远往返颇有烦言；相关公司领导在政治上的失势，以及码头一直期盼的艮山门方向的火车道迟迟不见接轨等等。航运公司初来谢村码头落户时，橙黄橘绿，一派金秋景象；而离别码头时，却落木萧萧心境悲凉。

其实公司搬迁到谢村码头的决定，仔细想来确实有欠考虑，似乎更具有现代“行为艺术”的色彩，而没有认真从经济管理的角度考量。谢村码头当年再有发展前景，何必一定把公司迁往现场？

梦醒之后，谢村码头跳出是非漩涡，静待时机。1985年，交通部及省市三级主管部门、企业共计投资400多万元，为谢村码头增设直立式壁岸泊位3个，装卸雨棚2200平方米，仓库、生活用房及装卸机器等配套设施若干，1987年谢村码头的年吞吐量达到了100万吨。那一年，码头虚岁三十，吞吐百万吨的底气，使它终于“三十而立”。

码头泊船

码头来船

2012：码头纪事

“杭钢”码头

进出杭州钢铁厂废钢码头的运货车辆在一个蓝色雨棚前排起了队，那里有计算废铁重量的一个地磅，类似过桥收费处。司机们拿着数据室里开具的黄色单据，正在等待车子过磅出门，他们手上的单据不仅是出门的通行证，也是结账的凭证。

“杭钢”废钢仓库四面透风，有五个足球场大小。相互间隔50米的六台吊机，沿着码头河岸线一字排开，有两台正在作业。今天运输废铁的轮船从江苏过来，船舱牌子写着“苏货9005”，这600吨大船运载的废旧钢铁，大部分是车辆的大型报废部件，传动轴、齿轮、轮毂，还有破旧的大铁锅。由于船的深度不够，被压扁的大铁桶摇身一变成了船身的挡板。正在抓铁的那台吊机，外形与拆房子的挖掘机类似，机身可360度旋转，貌似莲花瓣般的抓头深嵌于船身运输的废铁之中，一把抓起，转向岸上的卡车车厢，六枚两米长的巨型花瓣猛地一松，同时绽开，沉甸甸的废铁便一股脑地泄入车厢，与挡板撞击发出咔嚓的巨响，使车身微微摇晃。

大船边沿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戴着草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一副码头工人的扮相，仔细观察废钢从船上到车上的一举一动，看是否有石头等杂质混入其中。船头站着的中年妇女，四十岁左右，体态微胖，扎着麻花辫，身着大花婆婆衫，手持一根三米左右长，手指粗细，顶端有个弯钩的铁棒，把角落里剩余的废铁零部件拨动至船舱中央。看得出，她并非码头工人，那是船上的帮工么？打听之后，让人惊讶，她竟是这艘船的主人，也是这一船废铁的主人，旁边停泊着的另一艘货船也是她的。眼前这位穿着朴素、貌不惊人的大婶，居然是个百万富翁。这一船600吨的货物，如果按每斤废铁8毛钱计算，一吨废铁1600元，一船废铁进账就有96万，两条船上的废铁要卖到将近200万了！天上飘着小雨，这个大婶都没有打伞，仍然聚精会神地工作着，雨水打在她的麻花辫上，顺着发梢不停滴落。

走进矿粉码头，看见的是一座座像小山一样的矿粉堆。一斗一斗的矿粉，吊到岸上，放到传送机宽约1.5米的橡胶带上，输送到需要堆放的具体位置，形成了一座座矿粉山。每一座矿粉堆，用高约1.5米的水泥矮墙隔开，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沉睡在自己的地盘上。这矮墙的功能很重要：一、风吹下雨，矿粉不会流失；二、矿粉之间不容易混淆。

传送带环绕着整个矿粉码头。传送机的源头，有座约两米的铁桥，铁桥的另一侧有一间

二层水泥小楼。那小楼隔成三间房，中间是工人休息室。屋里摆着原本豪华的咖啡色三人沙发，但天长日久失去了本色，人造革已经布满破洞，沙发对面放置着一张简陋到极致的钢丝床，供工人小憩。走进隔壁休息室，贴墙摆放着四张两米长有靠背的实木长板凳，仿佛 20 世纪 80 年代火车站候车室的格局，木条已经被人坐得油光发亮。最有意思的，是两张大大的红漆实木写字台上，放满了琳琅满目各式杯子，老式的搪瓷杯、玻璃杯、保温杯、塑料杯、咖啡杯，还有一只喝得只剩一半的冰红茶，二十几个杯子，式样应有尽有，不由让人遐想杯子主人的神态，以及他们小憩时的惬意场景。

谢村码头

8 月的谢村码头，扑面而来一股热辣的气息：整卷的钢板，整捆长约 10 米、堆得山高的螺纹钢，整坨直径 1.2 米的铁丝卷，一起堆积在 10 个足球场大小的码头上，蒸腾着缕缕热气。码头上伫立着 10 台橘黄色的大型门机吊，操作工通过几乎呈 90 度直角的铁梯，爬进有 10 层楼那么高、三四平方米大小的操作间，控制吊钩上下左右起吊货物。

一台类似鞍马的巨型门机吊，吊着一捆螺纹钢，晃晃悠悠地掠过，最大载重 10 吨的吊机，正起吊一捆捆约五床席梦思大小的木渣板，从船上吊到一辆十几米长的巨型卡车上。吊机操作员、装卸工、大卡车司机的位置，各距 20 米，呈等边三角形，起吊过程几乎一气呵成。两个装卸工仰着头，像捉泥鳅一样，把起吊机垂下的铁索紧紧抓住，用铁棍撬起木渣板，让铁索能够套进板面。木渣板吊起来了，铁索拉得它们蜷缩变形，“咯吱咯吱”，发出刺耳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声音。每次起吊的惊险，都让偶尔到场的码头过客胆战心惊。第二次起吊，出现了失误，绳索没有固定住木渣板，吊机已经开吊，木渣板脱离控制溜出铁索，“哄”的一声落在船上，船舱腾起一股烟尘，整条船往下沉了沉，轻轻晃荡起来。还好，没有压到人。

装车工作完成以后，紧张忙碌的气氛随着装满货物的巨型卡车一起驶离了码头，装卸工之一徐师傅点上一支烟，做起了“活神仙”，码头的另一面开始展露出来。

这两位师傅，都是杭州近郊人，已经年近五十的人了，还在露天作业卖力气，月薪才 2000 多，他们不觉辛苦么？埋怨还是有的，徐师傅说：“上海的码头工人，奖金每吨比我们多九分钱，小不可大算，一个月下来，一年下来，差距就大哩，奖金收入比我们多一倍……”不过，尽管薪水微薄，但足够养家糊口了，再熬上几年就可以退休拿退休工资了，正是有这样的盼头，他们才一如既往地苦干。但码头工人已经青黄不接，再过 10 年，还有谁继续在码头上劳作呢？

码头的“老龄化”，不仅体现在工人的年纪上，也体现在设在简陋的青砖瓦房内的码头调度室和开单室里。电脑罩着落满了灰尘的蓝布，工作人员更加习惯原始的操作，开单据还是愿意手写和盖章，另一张办公桌上，放着一把算盘，那颗颗珠子倒是锃光油亮……

走到岸边，靠岸的二三十艘插着鲜艳五星红旗的 600 吨大船，将码头的老态一扫而空。为了缓冲撞击，船身都绑着硕大的轮胎，河岸上也固定着同样尺寸的橡胶轮胎。一艘来自泰州港的大船，满载着一船螺纹钢，船体随波晃动，正等待卸货。船上有两个老人、一对小夫妻俩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孩，真正的三代同船。孩子光着小屁股，什么都没穿，不时露出雪白的牙齿，冲着人微笑。呵，很可能，那孩子就是爹娘在夜半航行中孕育的呢。船头上种着火红的辣椒、绿油油的空心菜和青葱，还有五颜六色的太阳花，迎风摇曳，引导着货船长风破浪，驶向码头。

三堡船闸

运河进入钱塘江的咽喉要道上，墙体刷成粉红的三堡船闸，好比是鬓角插着粉色花朵的媒人，忙活着牵线搭桥，让运河水与钱塘江水牵手接吻。江里的船进了河，河里的船入了江，沟通江河，功德无量。大门口的左右两边都砌着围墙，水泥石碑上金漆描绘的“三堡船闸”四个大字，被花坛里茂盛的铁树、棕榈树叶挡掉了横竖撇捺，汽车进入，需通过蜿蜒曲折的水泥桥路。

外行看水上百舸争流，只看到闸门两边等候开闸放行的运送黄沙水泥、煤炭、石子的货船，只有行内人才对其中的转弯抹角了如指掌。三堡船闸管理处运行调度中心副主任徐建平说，从钱塘江进运河承运的货物，一半以上是黄沙石；从运河进钱塘江的货物，一半以上是煤。这些货物，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流向格局呢？钱塘江上黄沙船石子船多，因为出发点就在钱江上游的富阳、建德等地。杭州主城区以及江苏上海那么多建设工地，都在等着建筑材料的到来。它们由江上的小地方，逐渐进入运河边的大城市。

运建材的船多了，城区心急火燎呼啸来去的黄沙车也就渐渐失去了踪影。而由运河过船闸去钱塘江上的煤船，目的地大多是富阳、萧山、桐庐的电厂、造纸厂、水泥厂、化工厂、塑料厂。煤炭由天津、秦皇岛海运至杭州湾跨海大桥北侧的嘉兴乍浦港，再由运河船舶转运，比公路运输省了不少钱。

船闸的起降，还要看老天脸色。如果钱江潮水来势凶猛，大潮汛一天来两潮，船闸就只能歇业。而若雨量不足，江河水位偏低，船主又要叹气挠头——吨位大的货船顾忌搁浅不敢多装货，装多装少全凭自己拿捏，最保险的当然是抛锚停航，但又岂能甘心？

同时，像潮水般起伏的市场行情，也影响着船主赚多赚少，丰歉盈亏。煤炭行情好，大家争抢，货船也就多了赚头。比如煤从嘉兴乍浦运到萧山临浦，一吨运费给 20 元、21 元还是 22 元，都由行情说了算。

再有个门道，货船从进闸到出闸，吃吃力力将近二十分钟，每次可进四条船。进出如此缓慢而排队的船只又那么多，船主等得好生心焦。但是关心经济大势的人士从船只忙碌、码头船闸拥堵的景象中，看到了经济的活跃度和景气度。无货可运，船只稀少，往往显示经济凋敝；运河上越是堵越是忙，越说明国家经济活跃。

住在船闸附近的老人，从船只的声音中听出了门道，有个大妈说：“一天里，凌晨四点和晚上七八点的声音最大，船只也最多。”这也只有老年人能够注意到吧，到了七八点，年轻人结伴出门去过夜生活，老人却洗洗上床了。凌晨四点，月明星稀，船只过闸又成了早起老人的伴奏曲，那些声响仿佛不厌其烦的提示音：

你们家在船闸边……

信义坊水上巴士码头

乘游船来到信义坊码头，首先进入眼帘的是立柱上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小泊长行，船影自随流水远”；下联是“熙来攘往，市声何止卖渔桥”。中间“卖鱼桥码头”五个大字，写尽了来往码头的船影与市井繁忙的买卖吆喝声。

湖墅北路信义坊水上巴士码头坐西朝东。码头上层左侧是休闲处，矗立一座十几米高的仿香积寺九层八角石塔，塔身浮雕着很多佛像，每层围栏刻有飞鸟、花卉、云纹图案，最上层的八个檐角下伸出八条 S 型龙头，使得稳重的塔身有了动感和活力。塔尖的葫芦状顶端上，一根避雷针直指天空。

一楼左侧，是个倒 7 字型的码头值班室、房间约有 20 平方米。一张旧写字台旁摆着一只酱色铁柜，高约 90 厘米、宽约 40 厘米、厚约 50 厘米，四周密封中间空，一眼看去就像一个保险柜。值班的童师傅解释说，这是水位涨高时供游客上船使用的“垫脚石”。码头的左侧有长 6 米、宽 1.3 米盲人道，经过 20 多度的防滑斜坡道，就可到达码头平台。平台沿河立着三只黑色、短矮、均衡分布的丁字型泊船墩，好像是三只大蘑菇，这是系船缆的柱子。平台边缘绑着四只黑色汽车外胎，防止船身与平台撞击。水泥平台离河边一米处画着一条黄色醒目的警戒线，上写“危险区域，请勿靠近”。

童师傅是个撑船 40 年的老码头，每当船靠码头，有人踩线越规时，他总是严肃地大呼小叫：“退后，退后！不要超线……”

水上巴士游船小的可坐 18 人，大的可坐 48 人，“西湖号”双层船最大，一次可载游客 98 人。虽然游船每张船票售价 3 元钱，但每年用于船的保养、维修费、油电费、人工费、

设备折旧费等开支都很大，再加上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60 岁以上老人打折等等优惠，船票收入远远入不敷出，全靠着国家财政补贴，水上巴士才能在水上顺利运行。

2012 年谢村码头

2012 年谢村码头办公室

下卷

码头履痕

码头表情

一、打米店

1948 年春，三条装载 90 吨大米的货船，缓缓驶向了拱宸桥码头。这一年，国统区形势大乱，经济已近崩溃，整个杭州城也是怨声载道，物价特别是大米价格一天一变，有时上午与下午价格都不一样，老百姓称为“瞌充鬼（贵）”，就是打个瞌睡的工夫，那大米的价格就又贵了。恶性通货膨胀蔓延，一大麻袋法币换来的却只有一小袋米，大家恨恨地称这些不值钱的纸币为“猪头钞票”。日子本就难过，偏偏有的黑心米店老板又囤积居奇，有米不卖，逼得升斗小民忍无可忍，相约去“打米店”。

“打米店”，就是打开米店敞开粮仓，让老百姓自己抢米，而打米店的成员一粒不拿，显示自己不谋私利，仅为帮百姓出头。打米店的成员有擦皮鞋的，有拉黄包车的，也有挑夫，这些平时干粗活的汉子膀大腰圆，粗门大嗓，袖子一撸从闸口地区开打，一路上既打米店，又砸米店老板的家。队伍由最初的二三十人滚雪球般变成几百人，声势浩大，十分壮观。打米店的队伍下午打到了拱宸桥，大伙冲进一家米店，粮仓里空空如也，一无所获，米店老板已经逃跑，就只能把气出到米店老板的家中物件上。他们见东西就砸，甚至把二楼一只红漆马桶拎出窗口砸向地面，“咚”一声，秽物四溅臭气熏天。一队手执枪支准备阻拦闹事人群的警察赶到桥头，一见警察，本来就民怨沸腾的人们立刻冲了过去，警察一看老百姓人多势众也不敢开枪，只能掉头逃窜。

老百姓不依不饶，一味猛追，抱头鼠窜的警察分作两路，有的一路跑到了洋关附近，有的跑进运河边一片盛开金色菜花的油菜地里。一拥而上的老百姓揪住警察的衣领摁倒在地，拳头已如雨点般纷纷落下。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别打了！快看大米！”大家停了手，顺那人手势望去，只见三条稍作掩盖的米船，泊在油菜地形成的凹形地势里，静静躲藏着。那是桥东某个黑心米店老板的“妙招”：大米进了码头，暂不卸货，待到风头一过，大米再进粮仓，这样稳稳当当好再赚一票。

“米在那儿！大家抢啊！”

看着水上凭空冒出的大米，人们先是发呆，听到怒喝才如梦初醒，他们再没有心思收拾警察，还是转身抢米要紧！河上有米的消息传得比风都快，周围不相干的人听说了，老老小小全都向码头方向集聚过来，有端脸盆的，有拿袋子的，有脱了帽子嫌小又脱了裤子扎紧裤腿当米袋的……在饥饿面前，谁还顾及面子呢？这一场骂骂咧咧的哄抢与掩不住窃喜的狂欢，让三条船上的大米一下子全都见了底。

抢米的人散了，空空荡荡的货船在洋关码头附近的水面上悠悠飘荡。那片美丽宁静的油菜花地，像遭受过了狂风洗劫，东倒西歪。一群不知疲倦的麻雀，在菜地上叽叽喳喳地寻觅食物，打扫战场……

二、挑石子

1971 年 11 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前夕，杭州方面为了迎接尼克松的到访，全

力以赴，周密安排，几乎是昼夜不停地扩建狭小的笕桥机场。在扩建工程之前，笕桥机场的跑道全长仅 2200 米，只适合起降小型军用飞机。如果要起降美国“空军一号”这样机身长达 46 米的“波音 707”大型客机，就必须进行扩建，拱宸桥码头也就在这一年成为代号“118”工程的后勤基地之一。

扩建工程中消耗量最大的耗材是石头，这么多的石头从哪里来？这不成问题。位于杭州市郊余杭的市司法局劳改局下属樟山石矿，专门生产这种“青石子”。

它密度高，韧性好，浇得牢，绝对是上等的建筑石材。樟山石矿得知杭州笕桥机场改造需要大量的樟山石，立马拦截了对外销售渠道，不再出售给上海修路造楼了。石矿不分昼夜进行机械化开采，工人也加班加点来满足修造机场用石的需求。一艘艘载满石子的手摇船通过水路从余杭运往阳关煤码头以北、瓦窑头到麻纺厂南面的石子码头。

拱墅区祥符、康桥、上塘等乡镇成立了联合运输站，主要承担码头上的货物装卸。当时码头没有机械抓斗，全靠人力，一担一担地挑，从船上挑到岸上，再把石材挑到石子堆的顶端倾倒，这样的工程，听起来就觉得吃力。

挑石子是种技术活，石子的形状不一，有一寸石、二寸石，也有少量瓜子片，每一种石头挑的诀窍也是不一样的，外行人很难掌握。大石头挑的时候要适时适量，放太多了会挑不动；小石头挑的时候要步子小一点，因为运石头用的竹制土箕装上石头后会变软，如果步子一大，重心控制不好，石头就容易倒翻。工人们除了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别无选择。

这几天码头上到处都是石头，河岸边停靠的全是运石船，十几只船一线排开，几十名工人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地干着。工人还没干完今天的活，就接到明天要卸一艘 60 吨运石船的任务。第二天一早六名工人头戴草帽，身穿满是补丁的破衣裳，骑半个小时自行车，来到码头。船早已停靠在岸边，工人们人手一条扁担，勾着土箕，踩过只有 40 厘米宽的杉木跳板，进入船舱。船舱里有两名专门负责耙石的工人，他们不断地用“猪八戒”式的铁耙把石头耙到比家用簸箕大些的土箕里，“嘿”的一声，工人挑上土箕，一天八小时工作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有些力气特别大的工人，为了能减少劳动时间，加快进程，特意用铁丝在土箕边沿上围一圈竹子，增加土箕深度。这样一次可以多挑一点石头，也防止石头在挑运过程中外漏。他们挑着一担担沉重的石头踏着跳板，穿梭往返于岸和船之间。

正午时分，卸下的半船石头已经在岸上堆成了一座小山。工人们围坐在地上，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备干粮，有的还自带酒水，年长些的老李就是其中一位。老李人称“百事通”，他最喜欢临市面，假如马路上有人吵架，他一定是头一个“轧”过去，最后一个离开的那个人。老李眯着眼，剥着花生，小口喝着自家酿的荞麦烧，悠哉悠哉，仿佛忘却了挑石头的辛苦。

老李一边随手递上一把花生给工友们分享，一边指着船对工友得意地说：“你们知道这石头派啥用场？”

工友们顾着剥花生，没作声。

老李看了看周围，压低了声音小声说道：“尼克松要来了，石头是拿去修路用的。”

“尼克松是谁啊？”工友们连连问道。

老李回答：“外国的一个总统。”

“哦哦哦……”工友们附和地点着头。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挑石工在走跳板时不小心落水了，老李放下碗筷，直冲事发现场。他快速观察水势，二话不说，衣服都没脱，就一个猛子下去，双脚不停地在水里颠簸，用强壮的双臂，举起落水者，让她的头露出水面，再慢慢靠近岸边，在众人的帮助下，挽救了一个落水者的生命。幸好幸好，虚惊一场！

老李脱下上衣，拧了拧衣服上的水，穿上解放鞋，和工友们走向还有半船石子的大船，

继续挑着沉重的石担，爬上高高的石堆……

三、交公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到七月下旬交公粮的时候，拱墅区所有公社那几十个大队、几百个小队就会出动大小运粮船，满载一船稻香，通过运河水路，浩浩荡荡地涌向湖墅码头。短短几天时间里，喧闹的杭二米厂码头泊满了船头插着小红旗的运粮船。来自上塘、祥符、康桥、三墩、蒋村等地的木船、水泥船、钢板船等等运粮船早早来到码头，抢占有利位置，吃到“头口水”，以便早来早走，迅速卸粮返航。农忙时节，农民兄弟们要收割，犁田，插秧，时间宝贵呀！

杭二米厂的码头，只有一个可上岸的埠头。天刚蒙蒙亮，大大小小的运粮船如千军万马蜂拥而至，场面犹如赛龙舟，你争我夺。一阵骚乱过后，运河水面逐渐开始平静下来，船与船之间首尾相连，停在河岸边等待卸货。一条船上，一般有六七个船工，其中负责开票的，首先要跳上岸去排队。船工蹦跳着跃过大大小小的船只，上岸来到开票的地方，那里又是人山人海，有多少船，就有多少开票的人。开完票据回到船上，还要等待米厂工作人员来随机验米。工作人员跳到船上，拿着V型戳刀，随机戳入麻织米袋，检验稻谷的含水量。抽取的稻谷落到工作人员手上，瞄一眼，捻一捻，就能判断出这批粮食是否达标。如果稻谷颗粒过于饱满，没有晒透，工作人员就会用大拇指指向粮船来时的路，示意这批粮食要退回去，重新加工后再运来。

这天，一条不合格粮船收到了退回的指令，只得开启发动机，“啾啾卜卜”掉头返航。老孔领着祥符镇的三吨运粮船刚刚开到，看准时机，见缝插针，稳稳当地插进空当，排到了第四名。后面的船工看得眼红，笑对老孔说：“今年你运气好！真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老孔干了那么多年的活，这还是头一回，去年他的船从日出东方排到太阳西沉，也只能认了。

老孔的儿子小孔，今年也来帮忙运公粮。不待船停靠好，17岁的小孔一个箭步，跃过前面的船，急速蹦向码头跑去签单。第一艘船还在忙着卸货，老孔看时间还早，就和船上的一名船工下起了象棋，两人直接坐在麻袋上，抖开纸棋盘，布开了阵势，四周马上就围了一群人。不一会儿，米厂工作人员拿着洋铁皮做的扩音器，对着老孔的船吼道：“轮到你们了！”

大家立刻起身开始忙碌，六名工人，全部上阵。老孔扎着马步，背上垫了一块厚棉布，背对着两名工人，两名工人双手拉住米袋的四个角，一起喊口令“一！二！三！”，把足足120斤的稻谷甩到老孔身上。他双手反抱麻袋，轻轻往上一耸，走上十几步石阶上了码头。小孔手拿签单，对爸爸说：“我们是六号磅秤。”然后引着老孔穿过湖墅路，来到了六号磅前。老孔右腿上前一弓，身子向右一倾，沉重的稻谷“嘭”一声落地，顿时尘土飞扬。几个来回后，老孔和船上的另两名工人互换角色，终于可以短暂歇息一下。

没过一会儿，小孔跑来说：“爸爸，稻谷好像有点潮。”原来前一天的一场阵雨，使得放在上面的部分稻谷受潮。幸好数量不多，可以在杭二米厂的水泥地上摊开晾晒。老孔船上的稻谷终于完全搬上岸来。他和工友们拍去身上的尘埃，登上船先回去了，留下儿子负责摊晒谷子。儿子大了，能帮爹干活喽！望着码头上儿子渐渐变小的身影，老孔满足地呼了口气。

四、背纸张

1981年秋，国内尚未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市场印刷物资十分紧缺，印刷文件必不可少的52克凸版纸及60克至100克书写纸经常断货。通过关系，省劳改局下属杭州长征印刷厂从安庆造纸厂搞到了二十多吨各种型号的纸张，由水路运到了杭州哑巴弄码头。三十多岁的蔡厂长高兴坏了，一声令下，指挥着厂里的六个青工，驾驶卡车，兴冲冲地前去码头提货。

哑巴弄是个百杂货物码头，又叫明真宫码头、娑婆桥码头，也有人叫大关桥码头，其实它就是在马路至运河沿边上一百来米长、十几米宽，一字排开的几个露天河埠头，后面有几幢老房子做仓库。它可停泊40吨至100吨左右的船只，偶尔也有大吨位钢材船停靠。

印刷厂这船纸到了码头，必须马上提货，超期就要收取保管费。办完了提货手续，调度

室命令吊车抓起船舱内的纸张，一捆捆吊入已经停靠在码头上的货车车厢。跟车的几个青工，虽然体格强壮，实力雄厚，但论到搞搬运，个个都是新手。看到卸在车上横七竖八那些紧绷绷的成捆纸张，他们全部傻眼了。一件正度平板纸，类似一只老式电冰箱大小，足足 500 斤重，每件纸用两块木板夹住，上、中、下横打三道钢片箍，再直打一道钢片箍。手移，它不走；脚踢，它不动；搬运时双手无处着力，要想动它，真好比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脸上有几个麻点的戴师傅是哑巴弄码头的装卸班长，看着小伙子的笨拙样子，他卷起袖子，亲自过来示范。几个小伙子，刚才还在背后唧唧咕咕，叫他“点厂十八十八了一

”，就是“麻子”二字拆开后的叫法，现在也不敢多话了，只全神贯注地盯着戴师傅的动作。只见戴师傅反背身子，臀部紧贴件纸，两手反抓住夹板中间的横挡，轻松一转腰，沉重的件纸就跟着他屁股乖乖移动，才一会儿工夫，车上十几个件纸，就已经码放得整整齐齐。那动作，稳健、从容得近乎完美。

小伙子们回过神来，立马上前给戴师傅又敬香烟，又端开水。在那个崇拜技术工人的年代，他们内心里早已经对戴师傅佩服得五体投地！蔡厂长不紧不慢，话外有音，对刚才出言不逊的小伙子说：“小张呀！长见识了吗？是不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说得小张脸色一阵红一阵青，频频点头：“看见，看见了！”

热心肠的戴师傅抽着烟，语重心长，毫无保留地叙述自己多年积累的装卸经验：“卸货也是技术活，靠蛮力是不行的。你们回单位后，别急着从车子上卸纸，先去找几只破旧轮胎，放在地上，然后将一件件纸对准轮胎轻轻翻下去，这样既安全、也省力，蛮快就可以把纸卸光！”

戴师傅传授的这一招鲜，后来成为长征印刷厂装纸、运纸、卸纸的规范性操作，虽然厂长换了一任又一任，这一方法却一直延用。

五、水与火

身处码头，最亲近的是水，但水的脾性因时而变，温和暴烈，转瞬不同。

1988 年，七号台风洗劫杭城，陈家港附近，不少苏北老乡的船都集中在桥下躲避风雨。后半夜，河水突然暴涨，船身迅速抬起，船厢被紧紧地顶在桥梁上。他们慌忙撑起船篙，狠命地向桥洞口推船，然而，船厢被顶得实在太死，船篙都撑弯了，依旧纹丝不动。男女老少都在船上压舱，死活不肯离船。因为人一旦离船，船身变轻，巨大的浮力将木船推向桥梁，极有可能将木船压散架，他们赖以生存的所有家当连同大半年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

河水越涨越高，船身被挤得嘎嘎乱响，舷窗的玻璃啪啪地碎裂，眼看着就要船毁人亡，凄惨的哭声响成一片。这时，附近的居民闻声而来，冒着狂风暴雨帮忙推船。由于船厢已被压变形，如同生了根一般，死死地“咬”住桥梁，根本无法撼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大河造船厂的退休工人急中生智，冒险跳进船舱，在船底凿了个破洞。喷泉般的水柱立刻涌入舱内，船身迅速下沉，卡在桥顶的船厢随即有了松动。大家乘机用力，将船推出桥洞。然后，快速堵上破洞，拎起马桶将船内积水一桶一桶排出舱外。别的船也如法炮制，一一脱离了险情……

码头多水，水能克火，可是某些特殊时刻，水上也会失火。1992 年，从富阳方向开来了一条经过改装的运汽油的船。由于船老大不熟悉地形，过拱宸桥桥洞时船身与桥墩擦了一下，船体悄然开始漏油，船老大却蒙在鼓里，继续驾船向前。船开到登云桥附近时，停在登云桥附近的一条船上有人正在做饭，那人操起火钳夹起煤炉里快烧尽的煤饼，随手扔进了河里。煤饼一扔下去，浮满了汽油的水面好比点燃了一条火龙，登云桥到拱宸桥之间呼啦一下子烧成了火海。河里火光冲天，河两岸人山人海，有打 119 的，有大叫救火的，有干着急的，有看热闹的。居民干部来了，警察来了，消防队来了，港航工作人员也来了。最惨的是有两条运棉花的船，也受连累烧了起来。为了减少损失，消防队员和船主只得把棉花包推进河里，白花花的棉花包浮在水上，像开败了的白莲花。

六、香与臭

很多年前，运河人家会在每天早晨，从各自家里拎出各式各样新旧不一的马桶，整齐排列在狭窄的路边，等待走街串巷的掏粪工前来收集。掏粪工拉着木制的钢丝大粪车过来，把粪便倒入粪车，并用随车携带的清水稍稍涮洗。随后，钢丝大粪车就“空咚空咚”地向着娑婆桥粪码头出发了。娑婆桥粪码头的水泥化粪池大约能容纳十吨左右的粪便，经过发酵以后，粪便的味道就变得和气耐心了。

当时的粪便，可用一个“俏”字来形容。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买主通过运河水路，把这些农家眼中的液体金元宝装上三五吨容量的水泥船运往周边地区，甚至海宁、萧山等地的船只也会远道而来，排起长队等候。为了争个有利位置，粪码头时常会上演口水仗，船工嘴巴不够用了，手中的粪勺就会比比划划，代替他们发言，勺子一旦划过了头，就会把对方划个立足不稳，整个人掉进大运河。

粪码头的化粪池边缘离运河水面大致五米左右，漏网流窜在运河的细小粪便，成为了河中鱼虾的盘中餐。这样的地势环境，不但招来了大量成群结队的浮游生物，还招来了周边很多小伢儿玩耍嬉闹，调皮的孩子们潜入水下，摸鱼捉虾，还有的手钩船沿，免费坐船“趁惬意”直达大关桥。

与粪码头相隔二十米路的地方，有家生意红火的副食品店，出售的是当年十分紧俏的民用物资，店里的人都有一副笔挺的腰板，说话也比较响亮。到副食品店里买猪头半夜就要排队，而下午熬猪油的香味，更让孩子们口水直流。粪码头一天到晚交织着两种味道，又香又臭，排队买猪油渣的人接受着两种味道的熏染，最后鼻腔就会糊涂起来。粪码头的臭味似乎变得亲切了，而油渣的香味里呢，也隐隐约约，混入了一股“好闻”的臭味！

拱宸忠秋

码头案件：半山电厂码头的“煤”与“没”

一、煤，没了

1988年9月9日清晨，从上海港出发的几十条运煤船驶入属于运河支流的电厂河，杭州半山电厂码头在晨光中近在眼前。电厂等待的“口粮”送抵码头了。所谓电厂的“口粮”，就是锅炉燃煤。半山发电厂装备着四台火力发电机组，只要机组想启动发电，必须先用燃煤“喂”饱锅炉，把炉子烧开。炉内烧化的水蒸气通过管道输入汽轮机，以异常强劲的高温动力冲击汽轮机叶片，叶片高速旋转带动发电机作切割磁力线运动，从而源源不断地输出电流。燃煤断供，犹如部队后勤供应中断，前线也就无法作战。

就在那一年，国内工业过热与煤炭市场畸形膨胀造成的“用煤荒”蔓延全国，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电网用煤不足，各电网都在千方百计争取用煤。今天这几十艘“粮船”由上海港中转而来，使将陷“断炊”之危的电厂大大松了口气。在码头边靠稳、停妥，电厂码头作业班将按照一套沿袭已久的验收作业流程进行操作，但是今天这套流程刚刚开了个头，作业人员就发现了异常。他和船老大稍作交流，马上转身走进调度室，向调度员紧张地汇报着什么。几分钟后，电厂派出所接到码头报警，出动警力跑步抵达现场。

运抵码头的煤船这时静泊岸边，船上黑色的煤堆乌金闪亮，看不出什么异样。只有抵近察看，才能发现它在刚刚过去的黑夜遭受的厄运：船上的煤遭遇“水上黑手”，窃贼扒运后造成的巨大豁口在天亮后彻底暴露出来，张开的口子犹如惊惧莫名的巨大口腔，似呐喊似申冤，再也无法闭合。船老大这时仿佛如梦初醒，神色沮丧地接受电厂派出所干警的询问。干警初步判断：窃贼是在午夜时分趁船老大不备爬上运煤船，偷挖燃煤装进自备小船逃之夭夭。在公安部门刑事档案的卷宗上，清晰地写着“九·八义桥盗煤案”的字样。

半山电厂工业自用码头建造在运河支流通往杭州钢铁厂方向的东西河道上，最初只有一个泊位，1978年以前电厂未通铁路，所有燃煤均从该水路输入，电厂码头由此也成为不折

不扣的一只煤码头。电厂于 1958 年开始建造，1959 年安装了 1.2 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到了 1960 年各项配套设施尚未全部到位，但咄咄逼人的用电形势容不得电厂鞍马齐备再行出发。全杭州当年用电仅靠闸口发电厂两台装机容量为 0.75 万千瓦的机组发电维持，电力供应朝不保夕，无奈之下，上级决定半山电厂只要获得最低的发电保障，就必须不惜代价提前发电。

1960 年春夏之交，电厂码头开来了运煤船，全厂员工几乎倾巢出动奔赴码头，抬着一只只大箩筐，以肩挑手提的原始作业方式卸下船上煤粉，送进岸上排列的一辆辆翻斗小车。小车推到距离岸边 500 米的锅炉燃煤提升机，再提上 40 米高的大煤斗，开始了步履维艰的简易发电。鼓风机铆足劲儿拼命向炉内送风，但是炉膛火势仍然摇摇晃晃，将熄未熄，早有准备的电厂工人在炉旁置放了大堆杂木块，锅炉工接二连三把木块丢进炉膛助燃，木块与煤粉共燃的合力总算拽住了膛内火苗的一线生机……

一晃 28 年过去了，电厂燃煤发电早已步入正轨，煤码头上船来船往，运送燃煤时有些缺失损耗也属正常，但像今天这样损失巨大的盗煤案件却十分罕见。一夜之间，船运燃煤失窃了 30 吨，这无疑是团伙作案，他们分工明确手法老练，借着夜色掩护猖狂下手。这一码头盗案使电厂派出所干警隐约感觉：盗贼敢于如此，背后一定连接着不可小视的利益链条，各个环节理应环环紧扣，偷煤——销煤——买煤，只要揪住其中一个环节拎出水面，就能使整个盗案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二、没人接手的案件

“九·八”码头盗案发生后，因为码头特殊的地理位置，案件归谁承办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

这一趟燃煤运输，是由航运部门派遣的船只，在燃煤抵达码头、电厂调度员验收之前发生的窃案，所以不但损失应该由他们负责赔偿，相关破案工作也应由他们来负责协调。但航运单位回应：我们只是负责运输的，航船行经的水域，水路治安管理部门理应为我们保驾护航，燃煤被盗现场既然在水路，就该由水路治安管理部门担纲负责。

负责水路治安的相关单位也是振振有辞：燃煤在水上被盗确是事实，如果窃贼现仍活动于水面，那么他们介入处理义不容辞。但窃贼得手后已从旱路逃逸，人赃出水，只能由陆地的治安管理部门追查到底，水上管理部门出了水是难以行动的。

码头盗案没人接手，电厂派出所干警苦笑。码头盗案无法落地的困境，有时候也是码头本身的困境，码头一面濒水，一面连着陆地，看似左右逢源，却又进退失据、处境尴尬——就像寓言中的蝙蝠，它究竟是鸟还是老鼠？它与两头都似乎沾亲带故，就会上演可以同时被欢迎接纳，又可以同时被拒绝抛弃的悲喜剧。

“九·八”盗案陷入了没人接手的困境，主要在于法制体系不够完备缜密，存在疏漏。法网织补得细密紧致，实际操作时发生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情况就会减少。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电厂派出所干警为案件寻找承办方来回奔波，却依然徒劳无功。干警们面面相觑，内心十分焦灼：这一个多星期嫌犯可以做多少事？他们可以安排路线脱逃，可以转移赃物，而类似案件难保不再发生。在派出所分析案情会议上，所长车进心情郁闷但语调平静：“好吧，既然没人来接这只烫手番薯，那就我们自己来吧！求人不如求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这就向上级请求，由我们来承办这起案子！”

干警们分析“九·八”码头盗案的关键点，就是盗走的赃物不会流失太远，“水耗子”销赃范围极可能就在码头周边地区，所以在实际办案阶段，赃物的流向成为了电厂派出所的首要清查目标，查到赃物后再由此倒查，上溯到倒煤者与盗煤人。这一招“倒查法”果然有效，侦查工作持续到当年 11 月 7 号，涉案的嫌犯全部落网。不过，负责押送的民警看着眼前那垂头丧气的嫌犯，在惊讶之后又难掩沉重之情：那 33 名作案者，清一色都是女性，年纪最小的只有 19 岁。

三、没有廉耻与没有办法

这些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的女性，为什么抛弃正途而化身“水耗子”，做起了码头盗贼呢？翻看她们的交代资料，她们最初的犯罪动机可以总结为“有头脑”与“没头脑”两条。“没头脑”的女人因为心态不平衡，看到煤贩子收煤倒煤发财，家里有了彩电、摩托车，认为偷煤倒煤发财，所以跳进了这趟浑水；“有头脑”的女人是因为明了女性抱团作案，即使被船老大擒获，也往往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把人放走不了了之，可以逃避打击，逍遥法外。不过这两类女性都明白同一个道理：只要放得下廉耻，凭借色相就能从运煤的船老大那里换煤。女贼的“头头”当年24岁，盗龄已有5年，她交代说，女人家去偷煤，比男人容易，也比男人要难。一次去扫煤，我被他们捉住了，他们剥脱了我的衣服和背心……后来（他们）给了我不少煤。

繁忙古运河上船工的生活枯燥乏味，一接到运输任务，储备一塑料桶用明矾过滤后的运河水作为饮用，再准备些下饭的咸菜，他们就马上收锚起航了。寂寞的长途航行无所事事，只能听听半导体，望望星空。这时如果发现船上有了女贼，船工们就像食欲不振者忽然碰上了“开胃小菜”，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看到女贼柔弱无助，犹如待宰羔羊无处藏身，个别老大和船员甚至会淫虫附体淫欲难耐，而女贼因为有错在先也不敢声张。老大和船员泄欲之后，送女人一点船上的煤粉权充“淫资”，这就算两清了。不过此事有个关键点：船上燃煤都是国家物资，这些人莫非吃过熊心豹胆，敢拿国家物资为他们个人所用，他们哪来的底气呢？

这里的缘由，就要追溯到电厂码头的燃煤计量验收方式。

电厂码头燃煤数量验收比较原始：运煤船满载煤粉抵达码头的载重量与卸煤清空之后船只的重量之间有一个差值，当班调度员在船身四个方位，持四面水尺线比对出二者差值，经过对排水量的修正换算，得出煤粉载重的数据，同时他还要对照船舶出港时的运单数量，做好盈亏验收。这种验收方式使人联想到古老三国时期的“曹冲称象”，其间的误差难以避免。个别船老大、船员就在误差的缝隙里挖出了“淫资”，把煤粉揉搓成香喷喷的胡椒粉，洒在送上门来的，令他们浑身滚烫火烧火燎的“夜宵”上。

每当夜幕垂落在电厂码头，无声无息游荡的偷煤小船便游弋过来，煤贩子驾驶机动水泥船就泊在偏僻处等候接应。翻开煤贩子莫某的小账本，他在10个月里收了100吨燃煤，同时出售给余杭东塘等乡镇企业。这些煤贩子遍布附近的水乡村镇，他们夸口说，只要古运河上还在运煤，他们的地下煤仓就会货源充足，不用担心“断货”。沿着煤贩子收销账本指引的失窃燃煤流向，办案人员追查到了余杭东塘一家乡办企业。这家厂的厂长倒是十分坦率，承认厂里收了煤贩子卖来的煤，可是不收这样的燃煤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活路，厂长双手一摊：“你们这样搞，还要不要我们生存了？”乡镇企业渴望煤炭，犹如干旱土地渴望春雨，他们也十分期待拥有自己的煤码头，可是国家能源指令性计划落到他们头上的概率像彩票中奖一样小而又小，他们需要能源，需要生存，向煤贩子买煤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煤贩子在他们眼里宛如神通广大的财神菩萨。

案件追踪到此，码头生态的复杂带给办案人员许多的困惑和忧虑，办案过程变成了追寻、思考码头与社会错综关系的心路之旅，这让他们始料未及，深感自身的无力。

缉拿雁过拔毛的“水耗子”和偷吃“煤粮”的煤贩子，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只要夜晚来临，偷煤船就会出动游荡，“白昼的清新是有限的，黑夜却无处不在”。码头自己开不出清除周边“病毒”的药方，这样的“复方制剂”不在码头内部，而在码头的远方。

四、煤码头的未来

电厂码头为煤而生，为煤而长。燃煤发电，是成本低效益高的发电方式。但在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正千方百计降低燃煤发电的比例。《国际金融报》报道，2012年美国能源部下令关闭57座燃煤电厂，而用天然气、太阳能、风能来替代燃煤

发电。半山发电厂在 2005 年投产的三台 39 万千瓦发电机，全部使用清洁能源——天然气。电厂煤码头正在没落，这也意味着燃煤发电厂的升级与转型，对渴望蓝天绿水的公众倒是个福音。

火力发电厂的粮草——燃煤 运煤船到了

码头行当：“五行八作”之外

码头“五行八作”的五行指：车行、船行、店铺行、脚行、衙役行；八作是：金匠、银匠、铜匠、铁匠、锡匠、木匠、瓦匠、石匠。“五行八作”泛指各行各业。在运河码头，这些行当约定俗成，卖个力气学门手艺，就能得个温饱。在这些行当以外谋生，则要开动脑筋，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另念一本“生意经”。

马桶帮

对于“马桶帮”而言，运河上能靠船的岸边都是码头，有码头就有生活做，有生活就有饭吃。陈家桥河是贯穿拱宸村的运河支流，东起热水港河，西接瓦窑头港。20 世纪 80 年代，陈家河南岸有了七八艘木船。这些木船的甲板上都建有方型平顶船厢，船头生灶，船尾洗漱，船厢吃饭，下舱睡觉，典型的水上人家。由于人多货杂，每只船的船帮都被压得很低，甲板几乎与水面持平。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座漂浮的村落。“村落”中的某条木船便是顾师傅的水上之家。

顾师傅来自苏北宝应，几年前，与同村的几户村民，拖儿带女摇着船，沿运河一路拾荒，来到大运河的最南端，在陈家河一带安顿下来。起先靠捡垃圾、捞鱼虾、下苦力为生。在杭丝联码头背茧包，在北星桥挑沙石，往南星桥拉钢丝车。辛苦一整天挣个块儿八毛的，勉强糊口。顾师傅他们不辞辛苦，离井背乡，无非想多赚几个钱，但就这么卖卖苦力，何时是个头哇？日子一长，有些村民熬不住，有了返乡的念头。

一天晚上，顾师傅蹲在船头抽烟，一只漂浮在河面的旧马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眯起眼，吐着烟圈，陷入了沉思……顾师傅的父亲生前是小有名气的木匠，擅长方作（打家具）、圆作（箍桶）和细作（雕刻）。顾师傅从小耳濡目染，也学得十之八九。修个盆，补个桶，紧个箍，小菜一碟。他拍了拍脑壳，忽觉灵光一闪，一条生财之道油然而生……

当时的杭城已开始旧城改造，大批居民告别低矮破旧的平房，搬进了有卫生设施的洋房。原先那只“半夜三更更要紧桶”再无用处之地，反倒成了累赘。倘若将这些马桶回收，再加工翻新，运回老家，即使以新马桶半价卖给村民，其中的差价亦相当可观。顾师傅兴奋不已，连夜与同来的村民商议，大家一拍即合，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次日一早，他们分头行动，走街串巷，回收废旧马桶。半日功夫，便满载而归。收购的价格大都不到一块钱一只，几乎没有碰上讨价还价的。有些大方的居民干脆白送。

顾师傅挑选了几只造型普通的红漆马桶，卸去抱箍，将拆散的桶板一片一片浸入老碱水里。大约浸泡一个钟头，捞出来沥干，用铲刀将马桶板内侧的尿垢铲净，抛光，接下来就可以拼装了。这绝对是项艰难繁杂的技术活。首先要将翻新的马桶板围成圆桶型，中间用竹钉镶紧，连接处必须严丝密缝。再将底板卡入桶板下端的凹槽。这些旧马桶大多是手工制作，每片桶板的尺寸都有点误差，而且呈圆鼓形。经过污物的常年浸泡，多少会有些变形。拼装时，只要有一片桶板的次序不对，或者底板的位置稍有偏差，那么，即使鲁班再世也无法拼回原样。

顾师傅连着失败了十来回，总算慢慢地摸索出经验来，他重新选了只完整的旧马桶，将所有的桶板按前后次序一一编号，再在桶板与底板的连接处标好记号。组装时，按事先编好的顺序将马桶板拼装成桶形，卡底板时，按照上面的记号一一对齐，两头同时抱箍，镶紧。

加工过的桶板就拼回了原样。拎桶河水试试，果真密不透风，滴水不漏。

其实翻新一只旧马桶远比打只新马桶繁琐，接下来还得揩桐油腻子，二次砂光，涂漆上光。若是考究的雕花马桶，还需用刻刀勾勒、上色、描红。木工共分长作、圆作、方作、细作四大类。长作上梁，圆作箍桶，方作打家具，细作刻花，各类都有各自的技艺。然而，翻新马桶的工艺除了长作，别的三类都得会一些，几类手艺融会贯通才行。顾师傅经过几个月的精雕细琢，俨然成了半个工艺大师……

一整船簇新的红漆马桶终于新鲜出炉，运回老家出售，不到半个月便被附近的村民一抢而空。这些翻新的老式马桶用料考究，做工精致，价格又便宜，自然大受欢迎。宝应县城最大的箍桶商闻风而来，要求包销他们今后的所有产品，还付了不菲的定金。初战告捷，顾师傅信心大增，立刻招兵买马，将周边村落的箍桶匠都请过来，浩浩荡荡杀回杭城。他们将河道里不知何年被人遗弃的沉船一一打捞起来，两个一对，面对面竖起来，将船尖深插入河堤上，两头用碗口粗的竹竿固定，顶部铺上油毛毡，一只只蚌壳形的工棚便拔地而起。每当夜幕降临，河道边就回荡起“嚓嚓嚓”的铲刀声和“扑通扑通”的敲箍声。一盏盏飘忽的烛光从蚌壳型工棚破缝处漏出，映着河面倒影，仿佛蚌壳精叽叽喳喳，破壳而出。

捉蛇佬“人中白”

老顾的儿子小顾高中毕业后随父亲来到杭州，一则来大地方见见世面，二则也想助老顾一臂之力。小伙子虽说高考落榜了，但毕竟是老顾家首位喝过十年墨水的读书人，不仅能写会算，脑瓜子也蛮灵光。只可惜他对父亲的马桶事业没有丝毫兴趣，整天找借口出去胡逛，总说一闻到工棚里的味道就头昏脑涨。小伙子在杭州城里晃荡了个把月，没寻着合适的行当，反倒落了个水土不服，三天两头头痛发烧拉肚子。外乡人没有医保，自然不会去正规的大医院，有点小病小恙，便寻个土郎中要个方子，服几帖草药了事。

马桶帮们都喜欢到捉蛇佬那里抓药。捉蛇佬也姓顾，人称顾半仙。每逢阴历初一、初五、初十，顾半仙准会在拱宸桥百货店大门口设摊，数十年来风雨无阻。他总是背着只半人来高的葫芦形竹篓，里面关着新捉来的毒蛇。地上铺一方八仙桌大小的黄布，上书“妙手回春，救死护伤”八个大字，布上摆满了各种草药和大小不一的蜡封药丸。老头儿有些倔，给钱多少无所谓，实在没钱白送也行，但必须要说他的药灵光，稍微有点怀疑则马上翻脸。

一次，几个“市二医院”的实习生在拱宸桥脚下搞科普活动，空地上支起七八幅宣传图片。一位梳中分头、戴眼镜的瘦高男生正站在条凳上，手提电喇叭高声演讲：“市民朋友们，社员兄弟们，秋夏正是毒蛇频繁出没的季节，一旦被毒蛇咬伤，一定要用如图所示的方式，科学地处理伤口，尽快到就近的正规医院救治，注射相应的血清，千万不要轻信江湖游医，服用所谓的灵丹妙药。”捉蛇佬碰巧也挤在人群里凑热闹，听到这些话，气得胡子都翘起来。只见他猛地拨开人群，一步跨上条凳，“唰”地从竹篓里抽出一条三尺来长的眼镜蛇来，挽起袖口，任其在上臂上猛咬一口。随后，他迅速摸出一颗蜡丸，扔进嘴里嚼了嚼，敷在伤口上，一把夺过电喇叭，声嘶力竭地大叫道：“大家看看清爽，这是条剧毒的狗污泡，帮忙作个证，老子的药到底灵不灵光？”学生们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缩在一旁直发抖。

小顾去捉蛇佬处抓药，总要蹲在摊前端详半天，摸摸这个，捏捏那个，不时还问东问西。顾半仙对这位小本家似乎也不太讨厌，性子好的辰光还应付几句：这个红的是五味子，壮阳补肾的；那个绿的叫蛇舌草，清热解毒的，有些癌症都能治。小顾听得认真，时不时摸出牛皮纸面的笔记本作记录。几次下来，他还真认识了不少草药。

有一次，他看到药包里有一种灰白色的小石片，一面光滑，一面松泡。凑近鼻子闻闻，有股淡淡的骚腥味。

老头儿见状，故作惊奇地“哎呀”一声：“这味药可不得了，人称马碱，又叫人中白。虚火攻心，口舌溃烂全靠它来治。”

“这么说，它相当金贵？”

“那是当然，数十年的马桶，所积的人中白也不过七八两，岂能不贵？”

小顾内心一阵狂喜：乖乖，没得命啰。没想到自己家中竟捧着只聚宝盆。他又详细地问了人中白的炮制过程，最后与顾半仙谈妥，以十元一斤的价格向他长期供货。

回去后，小顾向马桶帮们一一告知：从今往后，所有的尿垢他一个人全包，一元一斤。条件是绝不能用老碱水浸泡。直接铲尿垢须多费些气力，但能额外多挣钞票，大家自然也蛮乐意。两三日工夫，小顾就收了十多斤马碱。他用清水一遍一遍清洗，直到基本闻不着骚腥味，再摊开在阴凉处晾干，用上好的宣纸，按一斤一包整整齐齐地包好，上书“顾氏人中白”五个蝇头小楷，盖上一枚顾家药业的方印。他晓得仅凭顾半仙一人，绝消化不了这么大的量。于是，便走街串巷，将杭州城的旮旮旯旯翻个遍，又联系上数十个土郎中。空余辰光，他还沿着运河两岸，在杨柳树上找知了壳，在河堤的杂草丛中寻蛇皮。三个月下来，小顾净赚了四五千元，比他老爸辛苦一整年还多。不过，他心中明白，这些零零碎碎的小生意形成不了长期完整的产业链，要想成气候，还得另找商机。

搞收藏

当时的拱宸桥是该地区附近唯一一座连接运河两岸的桥梁，从早到晚，桥上行人络绎不绝。桥坡两旁，聚集着不少小摊贩，沿着桥栏，一字排开。有卖水果蔬菜的，卖鱼虾螺蚌的，挖鸡眼卖老鼠药的，修鞋补雨伞的，卖牛皮糖兼收废铜烂铁的。叫卖声整日里此起彼伏。小顾每次路过，总能见到一位戴银边花镜的长须老汉，端坐在桥顶的美人靠上，捋着山羊须，颇有仙风道骨的味道。脚下摊着一幅太极八卦图，四周围着一圈虚、实线组成的符号，上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个小篆字。图上摆放着一只微带铜锈的罗盘，周边散落着一些古铜钱、古箭头、小玉块等。老汉摊前，经常会有几个神情严肃的顾客。老汉一会儿看看来人的脸，一会儿看看手掌，然后微闭双眼，口中念念有词，撮起五个细长的手指，不停地拨弄。接下来便摇头晃脑，说些似懂非懂的话，直说得来人心花怒放，心甘情愿地掏出三五块钱来。老汉从摊上随便捡起个玩意儿递过去，来人便千恩万谢，兴高采烈地走了。

小顾觉得好奇，便经常坐在一旁，细心观察，时不时给老汉递递烟，聊聊家常，一来二去，两人就混熟了。老汉姓许，大家叫他许五伯，祖籍江苏扬州，算是小顾的半个同乡。许五伯确实有些学问，五行八卦、奇门遁甲、紫微斗数、梅花易数没有他不晓得的。替人看相，往往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繁杂玄妙的爻辞命理，他总能用简洁明了的道理形象地阐述出来，说得相客连连称是，心服口服。

一天下午，小顾见许五伯的生意清淡下来，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鼓起勇气问：“许老师，见您给所有人看相，说的大多是同样的几句话，为何他们都连连点头，还满心欢喜呢？”

许五伯哈哈一笑，捋着长须道：“相面测字，如同医院里的心理咨询，大凡人都有一定的共性，比如贪财、好色、爱慕虚荣等等。人人都希望平安和睦，长命百岁。同时代的人的经历也大体相同，结合他们的年龄、穿戴、谈吐以及当时的神情，便能猜出八九分了。再说，来看相之人，无非想讨个吉头，听几句好话，图个心理安慰。只要投其所好，岂有不喜之理？何况，我送的辟邪之物，也差不多抵过相资，他们自然会喜笑颜开了。”

“哦——”小顾恍然大悟，“原来许老师看相是假，卖古玩才是真正目的。”

许五伯略一点头，又接着说：“这倒也未必尽然，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凑热闹，真正的好东西当然要卖给识货的行家。你看，摊上就有件很不错的东西，只是一般人不认识罢了。正说着，一位身着花格西服的老先生突然来到摊前。他拣起一块龙形玉佩，对着阳光一照，随后张开五个手指来回一晃。许五伯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老先生立刻掏出五张百元大钞，转身走了。小顾大吃一惊：“这小玩意儿居然值铜钿！”他已打定主意，向许五伯拜师学艺。

“许老师，晚辈想请您吃杯老酒，还望赏光。”

“客气了！小老乡，老头儿今日发了笔小财，理应我请。走！”

二人下了桥，踱进大众电影院附近的天禄园酒家，寻了个僻静的座位。大半斤黄酒落肚，话自然多了起来。小顾趁着醉意说出自己拜师的请求。

老头儿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好！小老乡，你聪慧好奇，一点就通，倒是块搞收藏的料。至于算命打卦，毕竟是旁门左道，还是不学为好。搞收藏，最好找到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就说眼前这条京杭大运河，千百年来，天天帆来桅去，且不说翻船、沉船，即便是木船间的磕磕碰碰，会有多少好东西洒落河底？你我都生活在运河之滨，近水楼台先得月么。现在，整个杭城都在大兴土木，不少明清年间老房子即将拆毁，如能收藏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雕花构件，或者花格门窗、砖雕、瓦当，亦能为过来人留点念想。你家是做马桶翻新的，这马桶的故事最早可以说到西汉，据说汉武帝刘邦与群臣议事，突然便急，就随手摘下一个大臣的官帽盛尿。大约受此启发，能工巧匠便铸造出精美绝伦的青铜容器，名叫兽子，平日由随从端着，随时为皇帝行方便。马桶虽不雅，却是人人必需，谁也离不开它。它还是老百姓重要的嫁妆。在送嫁妆的队伍中，红漆马桶首当其冲，由几个男娃儿抬着，里面放些红鸡蛋，生花生，寓意夫妻和睦，早生贵子。小老乡，你搞马桶收藏，蛮有自己的条件，你若能系统收藏反映各朝代、各民族、各地区特色的马桶，不仅能挣到大把的钞票，还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小顾听得都快发呆了。没想到这马桶里的学问，如此博大精深。二人谈到深夜，直到酒店打烊，才各自回家。

背纤·篮儿手

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小顾大体了解了许五伯独特的人生经历。十七八岁时，许五伯曾在扬州的一家洗澡堂当学徒，给人搓背按摩递毛巾。由于碰上还乡团抓壮丁，便只身一人逃到杭州讨生活。起先在拱宸桥码头上替人背纤，纤夫的艰辛自不必说，弓形的纤板往身上一套，整个身子便不再属于自己，必须挺直腰板，身体尽力前倾，紧紧绷直纤绳，小腿用力后蹬，一举一动都得跟着头纤的号子和动作节奏。背纤不能光靠蛮力，关键是要步调一致，七八个汉子在河堤上背纤，隔岸望去，如同一连串提线木偶，抬手举足，都整齐划一。运河上有不少水段没有纤道，纤夫须时常下水，衣服经常一脱一穿，不仅麻烦，还容易受凉。所以，运河纤夫爽性光屁股作业，仅靠吊在腰间的两块布片遮羞。即便是寒冬腊月亦是如此。

许五伯毕竟读过好几年私塾，算得上半个读书人，成天光着屁股亦确实不成体统，有时碰到大姑娘小媳妇，更是羞得无地自容。何况，背纤的收入并不高。四五位纤夫，拉着满满一船瓷器，从拱宸桥码头一直拉到塘栖的广济桥，单程 60 里水路，统共不过三四块大洋的纤资，还得确保货物不得损伤。若拉的是黄沙石子之类，则纤费更低。许五伯背的是尾纤，风险最大工钱却最少。他早想调行当，可一直没有机会。

一个寒冬的清晨，许五伯与几个同行在码头边等业务，忽见对岸河堤上围着一大群闲人。原来是酱酒店后门的河埠头下，漂浮着一具白涨白涨的男尸。尸体显然被机器船的螺旋桨绞过，肚皮划开一道半尺多长的口子，五脏六腑都浮了出来。酱酒店老板已经出到两个大洋，依旧没人敢下河捞尸。许五伯见状，二话不说，要了只大号麻袋便“扑通”跳进冰冷的河水里。他三下五去二将尸体连同花花绿绿的脏器一股脑儿塞进麻袋里，顺着河埠头背上堤来。

这下，许五伯交了好运，不仅得了两块赏银，死者的家属又随后送来一篮子礼品及三块大洋，请他帮忙处理后事。出殡当天，家属还从城外请来“翻九楼”的神汉请神。所谓“翻九楼”就是在出殡现场，竖着叠起九张八仙桌，神汉从第一层徒手翻到顶层，没有任何保险措施，还不住地摆出各种造型，如童子拜佛，大鹏展翅等等，风险之高，自不必说，神汉的出场费当然也不菲。许五伯突然感觉到，同丧事搭边的行当最容易挣钞票。于是，便暗下决心，要做“篮儿手”。

篮儿手是一种专门处理无主死尸的特种行当，整天拎着只空竹篮，一到出事现场，便将

空篮往显眼处一搁。等事情安排停当，人家自会往篮里放满烟酒点心，外加两三块大洋。那时兵荒马乱，街头巷口时常有冻死饿死或连冻带饿病死的叫花子。按照当时的规矩，人死在谁家门口，丧葬费就由谁家出。实在没钱，才由当地的民间慈善机构负责安置。这些死尸好像生前都商量过的，统统喜欢死在大户人家门口。

处理无主死尸相对简单，只等当地的警察开出死亡证明，许五伯便用草席将死尸一裹，平放在一辆特制的大板车上，拉到荒郊野地一埋了事。他还会做上标记，万一亲人来寻，也好让亡灵魂归故里。有时，寻常人家有家人惨遭横死，也会请篮儿手帮忙，那是必须要拿出看家本领的。没点分量，攒不过钱塘江。由于事出突然，家人毫无准备，自然手足无措，哭成一团。篮儿手成了丧事的主心骨。买水、净身、更衣、报丧、设灵堂、立牌位等等全得由他操办。所有的仪式都有特别的讲究和独特的技巧。

比如买水，就是从运河里舀一盆给死者净身的活水。买水的一般是长子，穿上死者生前的衣裤，先对着河面磕头跪拜，烧香烛黄纸，然后再向河里抛几个铜钲，示意此水是买来的，据说这样才能保佑后辈太平安康。再如报丧，不论晴天落雨，都得让报丧人倒挟一把雨伞，路人见了这特殊的标志，便会主动避开。到了目的地，报丧人绝对不能进屋，亲朋好友一见，来人倒挟报死伞，就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难度最高的，要数给死尸穿寿衣了。暴毙者的尸体早已僵直，四肢硬如木棍，根本无法扳动。倘若用力过猛，很可能扳断骨骼，这是犯大忌的，要吃丧家拳头的。许五伯却有一套特别技巧，他在死者身上东摸摸，西捏捏。不一会儿，死尸的关节竟然松动起来，有时，还会主动平举起双臂，仿佛迎合别人帮它套袖子。旁人看了，毛骨悚然，以为许五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能与死者通灵。其实，早在洗澡堂给人推拿按摩时，许五伯就懂得一些经络穴位，死尸身上亦有一些较敏感的神经，如果刺激到位，也会抬手踢腿，偶尔还会突然坐起身来。坊间传说的诈尸，就是这种现象。篮儿手还要为丧家介绍花圈店、棺材铺以及选阴宅、看风水的阴阳先生。当然，这都是能从中吃回扣的。

与许五伯合伙的风水先生是歪头派的昆仑大师。昆仑年近七旬，依旧精神矍铄，经常为探测龙脉走势，连翻五六个山头。他仅凭一面罗盘、几条红线便能定住龙穴。破土前，他还会观天象，避太岁。如若在太岁头上动土，那是要遭天谴的。考究的人家，篮儿手还负责请僧道，诵经超度，请戏班，吹拉弹唱。安灵三日，逝者入棺，篮儿手的事情才算告一段落。余下的仪式由八仙完成。所谓八仙，就是抬棺材的八个人，其中两位是专职封棺的，其余都是临时帮忙的。封棺亦是门独特的技艺。篮儿手高喊一声：合龙口！立马有人吹灯熄蜡，封棺人必须抬起棺盖，严丝密缝地扣上棺口，在四周漆黑一片中抡起拳头大小的榔头，将七根八寸来长的钢钉，准确无误地镶入棺木。

和平年代，暴死街头的流浪汉少了许多，偶尔有个把，也由人民政府安排处置，篮儿手的生意一落千丈，许五伯只得跟着昆仑大师看看风水，算算八字，弄几张钞票补贴家用。后来政府开始丧葬改革，普及火葬，并提倡丧事简办，破除迷信，这下，篮儿手彻底断了生计。许五伯又一次面临改行，他思前想后，最终决定从事苏北老家一种特有的行当——趟螺蛳。

趟螺蛳

江北佬趟螺蛳用的是三角形的大口推网，网沿上装有机关，系着一根绳套，绳套一拉一放，网口便随之一开一合，如同一张巨大的嘴巴。“嘴巴”的根部，连着一一条七八米长的竹竿。趟螺蛳时，将推网放置河中，网沿紧贴着河床，一手捏着绳套，一手紧握竹竿，尽力推向河心，河底螺蛳河蚌连同淤泥都被套入网中。随后，拉紧绳套，关闭网口，再用力摆动，筛去网中的河泥，剩下的便都是猎物了。

午夜时分，许五伯摸黑来到大运河边，他要趁机器船停航的这段辰光赶紧落网。否则，过往的船只很容易将网兜缠住，那可是要出人命的。运河里的螺蛳又肥又大，密密麻麻，铺满了整条河床。不到三个钟头，许五伯就趟到了两百来斤，挑起担，满载而归。回到家中，他用一把特制的长嘴剪刀，一颗一颗地剪掉所有螺蛳的尾部，浸养在清水中。等到天光大亮，

许五伯便骑上脚踏车，一家一家地给客户送货。做篮儿手时，他给许多酒店介绍过“豆腐饭”（丧宴）生意，多少有些关系。此时虽然早已公私合营，但酒店的负责人大多仍是原先的老板，只要货色新鲜，价格公道，人家也会卖个面子，照顾一下生意。

许五伯趟螺蛳的辰光，经常会趟起一些绿锈斑驳的铜镜、钱币以及布满青苔的小玉器。直觉告诉他，这些物事非同寻常，说不定将来能卖大价钱，便细细清理干净，按年代、材质、用途一一分类，珍藏在卧室内的五斗橱里，有事没事就拿出来把玩一下，碰到看不懂的东西，便向昆仑大师讨教，或者去图书馆查查资料。几年下来，许五伯不仅收藏了一整橱的古玩，还成了地道的古玩行家。20世纪80年代初，政策有了松动，他便在拱宸桥上摆摊卖古玩，赚了不少外快。

每天晚上，望着清养水中的剪尾螺蛳，许五伯就会点起一支烟，慢慢欣赏，同时心底浮起两句话来：一是“惟有一招鲜，方能吃遍天”；再一句么，就是“穷年饿不死手艺人”，只要肯花心思，动脑筋，运河两岸总归有自己的活命之地……

卖烧饼

磨剪刀

修棕绷

织补

码头青楼：拱宸桥畔福海里

上篇：男性视角下的福海里

拱宸桥东到金华路，西至丽水路的“福海里”，是在民国年间仿照上海石库门格局建造的建筑群落，同时也是青楼女子集聚、色情业发达的地带。当年的“逛福海里”，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词汇。

这天午后，在拱宸桥福海里出现了一个男人，面目清秀而略带忧郁，衣着体面举止斯文。但他来得不是时候，有谁会在午后时分来逛花街柳巷呢？经过一个漫长而迷乱的夜晚和上午的休憩，青楼女子需要梳洗、用膳，她们没有太多心力去对付那个在弄堂口问这问那、充满好奇心的中年男子。老鸨与一班小姐妹关在堂屋里正在“哗啦哗啦”打麻将，只有她那双仿佛下过秋霜一般老于世故的双眼，才有可能大致掂量出此人的身份与来头。

这天是1932年10月23日，星期天，天色阴晴。那人将当天的行程记入了他的日记：“午前作养吾信，出去游拱宸桥，果然萧条之至，妓女聚居之处，在张大仙庙西边，为福海里。新福海里，有苏帮、扬帮、本帮的三种，本帮者以绍兴、湖州人居多，永兴里永和里亦有妓女，当系二等以下的暗娼……”

日记的主人，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先生。他在当地的观察寻访，既是了解民情动向，也是为创作积累素材。郁达夫对拱宸桥是不陌生的，1927年1月18日他在上海写就的《清冷的午后》，已经直笔写到了拱宸桥的妓女，文中讲述了延龄路上出售化妆品与妇女杂用品的聚芳号老板，与拱宸桥花名“小天王”的妓女纠缠不清的情事。那小老板的情感十分缠绵，“想起了去年也是这样下微雪的夜晚，他和‘小天王’在拱宸桥她的房里烫酒吃猪头肉的情趣。”郁达夫反复强调过一句话：“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所以拱宸桥畔的色情行当的描写，大部分都应来自他的亲身体验。他笔下的“小天王”，该是福海里轻易不出卖肉体的“长三堂子”，也就是最高等级的妓女。小说里的种种细节都印证着这一判断：那个小老板“一想到小天王房里的那一种温香娇艳的空气，眼前就会昏花起来，鼻子里就会闻到一种特异的香味，耳朵里也会响出胡琴的旋律和小曲儿的歌声来。他

若把眼睛一闭，就看得见一张很光亮的铜床，床上面有雪白的毡毯和绯红的被铺着。床面前的五斗柜上摆在那里的描金小钟，和花瓶香盒之类，也历历的在他心眼上旋转”。长三堂子一向标榜“卖唱不卖身”，但这里的不卖并非绝对不卖，而是指要经过若干步骤，层层深入地交往，最后才能抵达合枕交欢、红烛香罗帐的境界。

拱宸桥长三堂子待客之道虽无第一手证词，但综合各方信息，可与旧上海规矩相参照，与纯粹的单刀直入卖淫嫖娼大异其趣。小宝先生在《吴姬压酒劝客堂》一文中引入了这方面的考据材料：“饭店酒市，欲念方动，便可一纸花符飞去书寓，只要能举出芳名，书寓里的‘先生’就会带着娘姨（现在叫助理）应约而至，喝一杯酒，坐上一坐，收费相当于现在的300元，这是叫堂差；几位客人相约到‘先生’书寓坐坐，送上瓜子香茶，南北果点，‘先生’高兴了，给你唱上一曲，收费总在千元左右，这叫打茶围；做花头，是在‘先生’寓所摆桌请客，一桌的花费在3000元以上。在做花头到落相好之间，客人要请几回客，每次要摆几桌酒，并无定规。”所谓“人情已够钱亦够，才能变熟客为恩客，姐儿才肯灭烛留髡”。

对于郁达夫结缘福海里的事情，如果只是作点对点的考察，那就限制了可供故事发生的广阔空间。这段故事背后，至少潜伏着两条线索值得探究，一条由此上溯，指往过去；一条由此下探，指向将来。指往过去是指自古文人墨客与妓女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这种交往除了生理愉悦的部分，更多是精神上的互相慰藉与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感，文人会沉溺于其中的风雅韵味而丝毫不觉得污秽不洁。古今中外文人都对这一问题有过严肃认真的思考。就在郁达夫去福海里同一年的11月28日，英国作家格林在日记里探讨了妓女与情人的问题：“究竟妓女好还是情人好？妓女的责任是取悦人，而情人得被取悦。”（转引自恺蒂《话说格林》）而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在还是世间俗人李叔同的时候，在津沪两地交接的不少风尘女性，更是触动过他难以遏制的诗情。他或作于1905年的《为老妓高翠娥作》充满了怜香惜玉的深切关怀：“残山剩水可怜宵，慢把琴樽慰寂寥，顿老琵琶妥娘曲，红楼暮雨梦南朝。”这条上溯的红线看似散花满地，但是万象同宗，就是超越于肉体之上的精神交流，可以令人长久回味，不断吟咏。

由郁达夫在福海里下探的那条线索，它引发的思考可能对于今天的现实更富于启示意义：青楼女子的职业在排除了被人强迫并非自愿的因素以后，这种职业有多少正当与合理的成分？剧作家沙叶新曾被胡耀邦誉为当代的“田汉、莎士比亚”。他在1995年出版的《精神家园》一书中专门谈到了对于色情业的思考，引述了一个未获通过的正式提案：“建议像西方国家一样设立红灯区，使娼妓合法化。理由是：一、扫黄禁娼，没有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能够行之有效，既然久禁不绝，钱、性的交易就必然有它生存的合理性，符合情理，顺应人性；二、设立红灯区，便于对娼妓的管理，避免性病的滋生蔓延；三、凡是性开放的国家，性犯罪率反而降低，性的需要获取容易，性的暴行自然就会减少。”沙老言辞犀利，思想大胆：“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民族仍需要一次全民族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探险运动！”沙老引述的设立红灯区提案的第二点理由是“便于对娼妓的管理”，这在民国的实践中已有先例，至少在拱宸桥福海里，“持证上岗”是对挂牌妓女的基本要求。

白色健康证里，有该妓女照片及个人基本信息，还有每月在医院检查身体的健康记录，只要持有这份证件，就表明她是健康的，否则证件会被吊销。嫖客进入挂牌营业的妓馆，据说先要索阅这一证件才行乐。虽然《杭州运河史》记述，那种身体检查并不严格，有部分妓女隐瞒病情，坚持“带病作业”，但至少这一制度是有的，有没有制度是一码事，制度执行严不严格是另一码事。1929年的统计数字是，拱宸桥地区有妓馆223家，妓女434人。当然，这是指办理了合法手续的在册妓女，她们是名正言顺，必须按时缴纳“花捐”的“纳税人”。

下篇：1949年以后的福海里

1949年早春，福海里的姊妹们每天都惦记着邮差上门，为她们送来最新的时政军事要闻，读了报纸赵钱孙李免不了扎堆聊天，谈谈时局的变化。解放军开赴江南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大军驾到，她们的生意肯定关张，是留在故园还是远走他乡？姊妹们各有主张，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两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正因为想着想着就走了神，有的姊妹“孔凤春”阴窖后清澈透亮的生发油只搽了一半就出了门，也有的把牛角梳忘在了灶台，这都是因为心事重得像秤砣。走和留都不容易呀！小年夜去台湾的豪华“太平轮”走到舟山群岛附近，居然撞了一艘货轮沉没，932人葬身水底。但福海里决意离开的姊妹，还是收拾了金银细软，咬咬牙走了，她们大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去往香港。

三十多年后，留居大陆的妓女、老鸨，有的已经“黄土陇中独自眠”，活着的则蛰居家中。这一年丽水路上开出一家劳保茶室，花一角钱买杯茶，有人捧牢茶杯可坐一天。有个苏州籍的早年老鸨，隔三差五喜欢到茶馆泡一泡，找她的老姐妹碰头吃茶。苏州老鸨姓戚，时年八十开外，出门一趟对她是个“苦差”，因为她腿脚不便，每次去茶馆都要借助一张齐腰高的高脚木凳稳定重心，扶着凳子一步一挪。她肤色黝黑，脸如皱皮柑，与茶馆里等她到来的白白净净的老姐妹恰成鲜明对比。那老姐妹，是杭州日据时期驻守洋关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官的干女儿，早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与优良的基因帮她在人老珠黄时多留了几分姿色。那年拱宸桥文化站新来的小姑娘，报到前夕常去茶馆坐坐，时间久了当然也对那对老姐妹的历史有所耳闻。看着那对老姐妹交头接耳相谈甚欢，有时也会捻着辫子，托腮沉思：“她们这么老了，为什么还喜欢到茶馆里来凑热闹呢？她们有怎样丰富迷乱的过去呢？”

戚老太和那老姐妹发现了小姑娘好奇地扑闪着大眼睛，招手相邀：“来来！姑娘儿过来坐坐。”戚老太到老还一口苏州乡音，闲谈中也免不了以吴侬软语抑扬顿挫地说她的过去：“我们‘长三堂子’，是卖艺不卖身。”集中于福海里的“长三堂子”，数量不多，约有一二十家，堪称妓女中色艺出众的头等角色。在部队大院长大，性情单纯的小姑娘，大概勾起了戚老太对早年红颜未褪时的记忆，她拉着姑娘的手，语气有些伤感地说：“姑娘儿，难得俵待吾侬亲热，我好做俵亲婆哉！可惜我珠宝首饰都当脱掼脱脱没了，本来好拔俵几个戒指哩……”戚老太拿起腰间手绢擦擦眼角，“唉，人老珠黄勿值钱，酒盅甩到酒缸边，不像俵，日脚还长哩……”

娼家留些珠宝在身边原是惯例，既可以对付穷灾荒年，嫁了好人家做起夫妻也是个资本。赠人珠宝首饰，其实是娼家出身的女人对他人极高的礼遇，是她们的待人接物之道。而像日本电影《望乡》里做过南洋妓女的阿崎婆在海滩边扔掉珠宝，和中国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都是对生活灰心懊丧到极点，把希望念想都一并扔掉的表现。年迈体弱终老福海里的娼家，生活起居少不了邻居的帮衬照顾。像“杭一棉”退休职工、块头蛮大做事风风火火的赵阿姨，就把照顾老太，为她们送饭、洗衣、倒马桶变成了她的日常功课。

这些福海里老鸨、妓女，在解放后大多都经历了妇女教养所改造。浙江档案馆一份编号为23-8-23的档案，是由杭州市军管委撰写的《筹设杭州市妇女教养所计划书》，这份尘封多年的档案透露了她们解放后的行踪。杭州市军管委于1949年5月杭州解放几天后成立，主任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兼第7兵团政委谭震林，副主任谭启龙、汪道涵。该计划书决定以半工半读方式，收容妇女200人，收容对象是：“a、私娼及有不正当行为之妇女；b、无自救能力之穷苦妇女。”职业训练原计划定五项，以训练妇女工作及生产能力为目的，但计划书上涂掉了第五项，只留下会计、缝纫、纺织、针织四项。收容人员的起居工作娱乐时间由所里规定，膳食由所里供应一日三餐（以一粥二饭为原则）。所里计划配备30架缝纫机、50架纺织机、30架针织机，同时还准备配“钢琴或风琴一具”，以及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其他文体用具。计划书特别提及可介绍职业给“教养妇女成绩优秀者”，“已达法定结婚年龄而无配偶者可介绍婚姻”。

另一个在福海里从业过的金老太，经社区查证，出生于1915年2月19日，1949年嫁给

了一个穿四个兜干部制服、表袋上别一支黑杆水笔的《杭州日报》编辑。丈夫知书达理，待人和气，金老太自然满心欢喜。遗憾的是两人没有生育，于是商量着要领养一个孩子。正巧有户人家经济困难，想把五岁的孩子送人，精挑细选后，选定了金老太这一家，收了金送去的200元钱把孩子交给金家，并约定从此不再相见。六七年后，孩子读小学了，上学路上见一个陌生阿姨，等在路边直勾勾盯着他，那眼神看得孩子心里发毛。他三步并两步，连忙跑进校门。回家后他把陌生阿姨的事情说给妈妈听，妈妈心里一沉“呵，讨债的要上门了！”孩子亲生爹娘这时反悔了，想要回孩子。金老太气不打一处来，据理力争“我们家里条件比你们要好，跟着我们，能让他少吃苦喔！”几番交涉，孩子留下了，但这事给金老太留下了伤痕，她恨孩子的亲生爹娘出尔反尔，更恨自己的肚子不争气，自己要是会生，也就不受腌臢气了！

1980年孩子成家了，金老太把市区房子腾出来给了孩子，回到了她熟悉的大运河边，住进了临河的小屋。金的丈夫在瘫痪九年后走了，金老太孑然一身，依靠捡拾码头和工厂丢弃的垃圾变卖几个钱维持生计。夏天她靠一架老电风扇度日，冬天用被子裹身在门口捡来的破椅子上晒太阳。早上起来就在门口发煤炉，做够一天的吃食就马上把煤炉灭了，再冷的天也是如此。家里的一个电饭锅，为了省电也不太用。社区成立后，她得到了每月170元的低保补贴，手头有了几个钱，就会买一只小甲鱼拎回家清蒸，或者到附近小饭店炒个“钱江肉丝”改善改善伙食。

文化干部蔡老师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近金老太的，如果老太愿意开口讲述她那段一直讳莫如深的经历，那么她就会像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山打根8号娼馆》里的阿崎婆一样，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史料。但是老太对于蔡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她并不拒绝蔡嘘寒问暖，送上营养滋补品和生活用品的好意。当她把吃不完的东西叫媳妇来拿回去时，还有一点扬眉吐气的自豪感觉。对蔡接近她的动机，金老太心知肚明，但对那段蔡急于了解的历史，她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兜圈子、打太极。她愿意说说她与丈夫的恩爱，丈夫因病瘫痪在床，金老太说我对他很好的，他瘫在床上的时候从来没让他吃过苦头的。她也愿意说说她的骄傲，她孙子在澳大利亚留学，是个留学生。

蔡感到了无奈。几次采访后，她说，金奶奶，你说说过去的事吧！

过去？好。

金老太说了，她小时候和妈妈相依为命，从未见过爸爸。她家有一条小木船，在拱宸桥周边靠短途运输为生，偶尔也载人，雇了个船员，男性。收入分为三股，即母亲和她本人分得二股，雇员得一股。但好景不长，自日本人进驻拱宸桥后，一律禁止任何船只下水，她家的小木船就此烂在了岸上，后来也没钱去修理，从此断了这条生路。没有船的日子靠金老太四处打工养活母女二人。当问及具体做什么的时候，她又含糊不清了，说做什么嘛，什么都做。几次碰壁，蔡决定剑走偏锋，她想也许是同性相斥，换个男性试试或许情况会有改观，于是她请来一名男性摄影师到金老太用油毡和碎砖搭建的棚屋，为金老太留影，跟她聊天。阴暗狭小的屋子，因为老太常年尿失禁飘荡着不雅的气味，但在一个陈旧破败的小橱上，具有职业敏感的摄影师发现了一束塑料花、一只金发洋娃娃。那是老太捡垃圾时的收获，回家后清洗干净，将它们陈放在橱子上，给小屋增添了一点生气。洋娃娃、塑料花，一个在穷困中的独居老太，要有对生活怎样的热爱和雅兴，才会在一堆垃圾中把它们捡回来放在家中呢？摄影师久久凝视着它们。摄影师让老太说说过去的事。好啊。老太又说了，她结婚后，母亲一人住在拱宸桥。有一天母亲突发急病，倒往地下时曾想着用手去抓毛巾架，但没抓到，只在门板上留下了几个抓痕。等金老太坐51路电车赶到拱宸桥，母亲已经离世。

你们还想听什么？

摄影师与蔡面面相觑，他终于也无功而返。

福海里那段经历，带给老太的是永远的痛么？是难以结痂的伤口么？从她闪烁其词的片

言只语中，那意思似乎也不尽然。但蔡老师已经无力追问了，不仅感到了疲惫，更感到了某种残忍。

留在蔡老师记忆里的，是老太破败小橱上清洗干净的塑料花、洋娃娃，那里显示着挥之不去的家的气息，以及青楼女子渴望的一缕温情。

旧时的福海里

金阿毛老太

码头建筑：姚宅七十年

晚年姚金淼

1991年深秋，94岁的姚金淼在姚宅一楼南耳房已经躺了一个星期。原先每餐吃一碗饭，这些天一口也吃不下了。

那天早上，他对二儿子桐藤说：“我可能不行了。”

桐藤问父亲：“您有什么要交待的？是想土葬么？我给您想办法送回老家。”

姚金淼摇头：“人死万事空，土葬没意思，太浪费了。”

桐藤转身去给几个出嫁的姐姐打电话。

姚金淼仰望窗外的蓝天，看悠悠的白云飘过，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一、姚宅，生意场的门面

姚金淼是姚宅的老当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做木材买卖赚得盘满钵满，成了杭州小河一带十余家木行中的龙头。

好面子的姚金淼，为了生意有一个更像样的门面，决定建一幢洋楼。

1942年秋，姚金淼的洋楼破土动工了。姚金淼跑过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脑子里有很多洋房的轮廓，所以他自家的洋楼式样是他自己设计的。

北下杭州的运河航船，由拱宸桥南行两公里，便可抵达大运河、余杭塘河、小河三水交汇点，于是那里便有了“航泊三水”之称。三水交汇点有座桥，叫会安桥，与会安桥相隔百余米，是惠贞桥（原称小河洋桥）。姚金淼这幢占地半亩的青砖黛瓦洋楼，就在惠贞桥东侧东河下2号，正门朝西，面向小河。

因为兵荒马乱，运河商路时断时续，房子建筑材料老是凑不齐全，一会儿缺洋灰，一会儿短钢筋，房子建建停停、停停建建，直到日军投降的次年（1946）3月才完工，一共耗时四年。

楼共两层，每层净高三米六。五开间格局，一楼中间三间打通设为大堂，地坪是精打细磨的水磨石；北耳房是厨房，南耳房是账房；两间耳房各有两扇钢窗，用的是压花玻璃；二楼为工人住房；大门是混凝土石库门；墙砖是青砖，凸显着“甸75”的字样，老泥水工知道，那是在有名的桐乡屠甸砖厂定制的；砖块之间嵌着灰白色的进口“洋灰”，那时一磅洋灰价格昂贵，要两块大洋，而一担大米也不过三块大洋。

门楣上，黑底金字的“永达木行”大招牌格外引人注目。

二、永达木行的来历

永达木行的前身是明来木行。永康人姚金淼早年在临安于潜麻车埠开铁匠铺。后来他发现做山货生意要比打铁轻松、来钱多，就跟着当地跑船的汉子做起了茶叶、桐油、山核桃之类买卖。后来姚金淼扎根小河直街做木材生意，渐渐地成为了杭州小河直街明来木行的供货商兼合伙人。

变身永达木行的老板，又有一段机缘。

那是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了杭州。杭州的北大门拱宸桥（《马关条约》后就已割为

日租界），堂而皇之地驻扎着日本军队。“塘店”（木材行）老板们感到前景不妙，纷纷关门歇业，明来木行的老板也有意将木行清盘转让。战火纷飞的年代自非扩张的好时光，但明来木行欠了姚金淼多笔货款，眼见得无力偿还，只能以店抵债；再者，经过战乱，很多人家的房屋被烧被炸，木材需求量一定不会小。想明白了的姚金淼咬咬牙，盘下了这家木行，更名“永达木行”，取“永远发达”之意。

永达木行的新门面气派很大，在小河直街近百户木结构民居商铺中鹤立鸡群。客户走进敞亮的大堂，一位穿长衫的管事殷勤地迎上来，让座、上茶，然后谈生意。如果是大客户，管事会亲自陪客人去外面的堆场、锯板厂看货；如果生意不大，那就由小伙计接待了。至于生意大不大，主管和伙计两人目光一对就能默契地知道这位顾客该由谁应付。生客买木头，一般不赊欠，当场银货两讫；而老主顾，通常是记账，到阴历年底结清。

谈妥了生意，照例要请客户吃饭。姚金淼请客，无论规模大小，都亲手给客人倒酒、夹菜，而自己不吃一口。这是名副其实的请客。著名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八千岁》，说一个米店老板请客，“客菜他不动一筷子”，客人要让，老板就说“我饭陪、饭陪”。在姚看来，请客就是请客人，自己也一起大吃大嚼，是对客人的不尊重。另外一个原因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在饭桌上会透露很多信息。自己不吃，就可以听清楚客人说的内容。

门面房建成后那几年，门前河埠头经常能看到停泊的木排，从惠贞桥一直延伸到二里开外的和睦桥。

三、老东家的生意经

永达木行的木排，是从几十里外的望江门堆场运到小河直街的。望江门堆场的木材均来自临安山林。为何木材不直接从临安山上运来？只因木材刚从山上砍下，又经江水浸泡，里面蓄满了水分，得先上岸在露天下让烈日暴晒，以逼出水气和脱尽油脂。这个过程少则半年，多则三五年。然后再取用，材质方稳定不至于日后开裂。姚金淼深深懂得木材对主顾的意义，无论是盖房还是打家具，都是几十年的打算，质量必须保证。所以他小心遵循行规，绝不将“生木”（尚未干透）卖给顾客。

赚了钱，姚金淼就买临安的山林地，五亩十亩不嫌多，三分五分不嫌少，他在临安的数万亩山林就是这样攒下的。对山林资源他实施了滚动开发，砍下多少树，补种多少树。

姚金淼做生意对老主顾非常通融，他不急于回本。有的拖欠货款五年、十年，账一直挂着，他都不催讨。他想得开，所有的木材均来自临安自备山林，成本较低，无非是出点砍伐和运输的人力费，不像他那些做转手生意的“塘店”同行，需要大笔垫货资金。

木行生意固然红火，姚金淼却意识到传统木业占用资金大、回本缓慢以及需要很大的场地等诸多缺陷，又在家附近办起了锯板厂、珐琅行等几家实业。锯板厂用简单机械对原木初加工，“吱嘎吱嘎”冲锯成造房所需的各种规格的板材、椽子、梁柱，方便了四方客户，比光卖原木显然进了一大步；而珐琅（又称搪瓷）行，是将珐琅粉高温烧结在黑铁皮上，做成杯、碗、盆等容器，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姚金淼重金延聘上海的高级技师和熟练工人，为他独家生产填补杭州市场空白的搪瓷产品。这些产品的统一商标是一架蓝色的飞机，生产搪瓷的配方仅由姚金淼和一位高级技工掌控。

姚金淼雇佣的工人最多时有四十多个，姚妻亲自下厨，为工人做饭。开饭时，按姚金淼立下的规矩，分作三批，头一批是厂里的把足师傅（重要的、掌握关键技术的师傅）、木排工、账房先生；第二批是普通工人；最后一批才是姚和妻子儿女们，天天吃的都是“回烱儿”（残羹剩饭）。

工人上夜班，姚金淼提供可口的夜餐。工人吃剩下的饭菜，姚都叫妻子打包带回家。对他来说，大钱要挣，小钱也要省。

四、实业成功催生梦想

姚宅落成后几年，姚金淼的事业达到了高峰。那个春风和煦的早晨，五十出头的姚金淼

绕着永达木行楼房走了一圈。河埠头上，几个排工正七手八脚地忙着拆卸木排。太阳照在河面上，闪着粼粼波光，妻子抱着二儿子桐藤看河上的木排玩。姚金淼抚摸了一下桐藤的头，对妻子说：“如果到七十大寿那天，我手里有一百万大洋流动资金，家门口停满汽车，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

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份信心也感染了他的小弟姚金录。

1949年3月的一个晚上，打完坐的姚金淼正要上床，小弟金录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敲开了他家的大门。金录天资聪颖，在大哥姚金淼的资助下，从武汉军政大学毕业，当上了桐庐县长。后受蒋经国赏识，官运亨通，做到了上海四行（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大银行）两库（金库、银库）的特派员。金录第二天将从笕桥机场飞往台湾，是特意来辞行的。

姚金淼瞥了一眼金录手中的机票，很不以为然地说：“哪朝哪代都会用有本事的人，你又何必走？留下吧，留下吧。”小弟一向尊崇大哥，就留下了。反正大哥家大业大，不愁没地方住。

姚金录一家笃笃定定地留在了大陆，留在了杭州，留在了大哥身旁。

几个月后，杭州解放了。

第二年，姚金淼最小的儿子姚桐枝出生。

五、公私合营，木行门面房变成了住宅

打有记忆起，姚桐枝没离开过姚宅。在这栋老房子里，他目睹了家庭的变故和命运的跌宕。

那么，木行门面又是怎么变成住宅的？

1955年11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正式启动。公私合营，将姚金淼多年积累的动产、不动产都划归了公家主导管理。在临安的山林、老家的田地一夜之间归了公；小河直街的多间房子（大多是姚家和工人住房，房契上有1955年年份及杭州市长吴宪的签名），由房管站转租给公家单位的职工；木行、锯板厂与其他几家木行一起合并为“杭州木材厂”；广大珐琅行并入杭州热水瓶厂成为后者的一個车间，名叫“公私合营杭州热水瓶搪瓷厂”，搪瓷车间日后又分出去改名为“杭州搪瓷厂”，广大珐琅行原址住进了杭州热水瓶厂的职工。

只剩下了姚宅，尚归姚家自有。

幸好还有姚宅。

在小河直街的邻居们看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偌大的一幢洋楼只住金淼金录两户人家，也够奢侈了。

六、兄弟先后入狱 姚宅物是人非

没过多久，住在姚宅的两兄弟，居然前后脚离开了姚宅。

1956年5月的某个夜晚，天气有些闷热。金录的老婆，姚桐枝怀孕的小婢娘看到有一条蛇盘在梁上，吓了一大跳，惊叫声把桐枝三兄弟都吸引过去了。小叔金录上去把蛇打死了。按老年人说法，宅子里若有蛇出现，是凶兆。第二天清晨5点，一辆警车悄无声息开到姚宅，带走了姚金录。姚金录犯了什么罪？“历史反革命罪”。

1955年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上级在7月1日发出指示，“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需要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肃反”。于是在当年全国开展的新一轮“肃反”运动中，姚金录很不幸地成了那个“百分之五”。其实，他不过是国民党的文职官员而已，没有扛过一天枪。

两年后，1958年“国庆”节前的一个深夜，正在搪瓷厂上夜班的姚金淼也被几个警察带走了。几天后，孩子们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还不回家？姚妻流着泪说：“你爸爸被抓走了。”姚金淼被捕，罪名也是“历史反革命”。

他的“罪”源于20世纪30年代在临安时，某天遇见一年轻寡妇被一个警察调戏，姚金淼路见不平一声吼，对方恼他多管闲事。一来二去，双方动起了手，姚金淼一拳将那警察打入溪中。事后，警察受了处分。过了半年，那警察得病死了。这桩旧案，被组织上的外调人员翻出，说姚金淼打死过人，身上有血债。姚百口莫辩。事实上也根本没给他申辩的机会，甚至连“缺席审判”的程序都没走，就让他成了阶下囚。

姚金淼被捕的深层原因，是他得罪了公家厂长。他虽为“公私合营”副厂长，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企业的管理权和话语权。他发现搪瓷厂里的工人干活不那么上心了，配方随意更改，废品大增，忍不住向“一把手”厂长责问。意见提得多了，领导便对他记了恨。说到底，他属于没有认清形势的人，所以也是在劫难逃。

姚金淼入狱当年，姚宅作为被改造的私房，就归房管所安排进来一户热水瓶厂职工。之后，又陆续进来四户人家。姚家七八口人被挤到一楼南面的耳房里，姚金淼的小弟金录的媳妇被居委会赶出姚宅，到附近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黑暗破旧的木房栖身。对被安排住进来的那些房客来说，这栋楼房敞亮又结实，虽然没有自来水，但比小河直街任何房子都要高级，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姚金淼在狱中呆了一年半，又转到金华劳改农场监督劳动了八年多。

而他的兄弟姚金录，再也没有回到姚宅，他在入狱两年后绝食身亡。

厂归了公家；六个孩子五个下了乡，最远的去了几千公里外的大兴安岭；唯一的房子住满了杂七杂八的人家。

姚宅住人多了，时间久了，便生出了摩擦。

姚家在二楼有间堆放杂物的房子，二楼一房客老喜欢将内衣内裤晾在楼梯上，姚家人上下楼得从三角短裤下穿行，甚觉尴尬。于是向房客提出。对方不但不接受，还恶语相向，惹恼了探亲回家的二儿子桐藤。他一拳过去把对方打下楼梯。事情搞大了，邻居们纷纷过来围观，房客单位保卫处来人，附近派出所也介入了。派出所在做了笔录搞清事情前因后果后，也觉得房客过分，对桐藤说：“你以后脾气不要太暴躁了。”桐藤警告那家房客：“如果我被抓进去，出来后一定找你算账！”起因这么小的一件事，姚桐藤竟发那么大的火，显然内心积怨已久。

七、为房子，古稀老翁常年奔波

10年刑满释放回家，姚金淼已经70岁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姚宅物是而人非。除了吃饭睡觉，姚金淼就干两件事：一是扫地，二是上法院。

扫地，是在居委会监督下从家门口一路扫，扫过昔日自家的厂房、堆场，扫到杀牛桥，工作量相当于现在的四个清洁工。长征桥北面有块空地，居委会把它当做公共集会之所，要开批斗会了（包括批斗姚本人），就下令姚金淼打扫干净。姚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几个孩子过来帮着倒垃圾。

“如果我们动作慢一点，老头子就会冲我们发脾气。”二儿子桐藤回忆。也难怪，费尽力气打扫干净的场地，竟是用来侮辱自己，实与“唾面自干”无异。

上法院，是不服自己的“历史反革命”案，同时希望房子能够失而复得。为此，姚金淼每周都要跑一趟。家里距珠儿潭巷区法院有北站路，通电车，但姚金淼总是步行，心境无奈又悲凉。30年前，他每周也要出一趟门，是去十多里开外的望江门木材堆场。那时家里已经有了木炭汽车和黄包车，他不坐，宁可起一大早走两个小时，心甘情愿且愉悦。法院工作人员每每见了头发全白腰板尚挺，但口中轻微喘气的老人，心中不免暗生同情。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姚金淼终于彻底平反了。区法院的曹院长这时跟他交了底：“姚老先生，我们早就知道您的案子是冤案，可是……”姚金淼摆摆手，打断了曹院长的话头。

八、“姚二代”眼里的姚宅

从姚金淼的角度，这么大的家业都没了，无所谓了，只希望姚宅名正言顺回到姚家手里。

毕竟它是自己一辈子辛劳的见证，况且，它还解决了三个儿子的婚房，这是年迈的父母对子女最大的物质支持了。

六个孩子中，小儿子桐枝与父亲相处最长久，感情最深厚。记忆里，父亲除了偶尔聊起当年开木行、珐琅行的一些旧事，基本是沉默的。1968年，18岁的姚桐枝被居委会安排到拱墅区建筑公司挖土方，他在这家公司一呆就是十多年。80年代辞职后，他办了制钉厂、门控器厂，很快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目前，他经营着一家装潢公司，专门承接高档住宅装修业务。以他的职业眼光看，姚宅这座老宅不中不西，不土不洋，有点不伦不类。看到父亲居然为它付出这么多心血，姚桐枝有些不以为然，但父亲多年来树立的老式家长的威严，使他不敢流露半个字。

那几年，姚桐枝办厂赚了一些钱，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买了汽车，安了空调，装了电话，还养了藏獒，很有些得瑟。

已退出江湖多年的姚金淼有一天淡淡地对儿子说：“我看你一年忙下来，利润也就这么多（姚金淼报了个数字），别太大手大脚了。”桐枝傻了，他从没具体跟父亲说过销售情况，这账父亲怎么算得这么清楚？

“我老了，不知还能不能看到房子回来？”

桐枝一阵心酸。

多年以后，姚桐枝才彻底理解了父亲对这栋房子的情感。

九、水流千遭归大海，姚宅，重回姚家

2007年小河直街改造，姚金淼已过世16年了。

姚金淼身后的姚宅，何去何从？

政府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出资一千余万元赎买。杭州著名的照相机收藏家高继生与姚家是世交，有意将姚宅作为照相机博物馆。中国美院对姚宅也有兴趣；二是交给国家，由政府补偿姚金淼六个子女每家一套一百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三是修缮后原屋归还。姚家后人选择了第三个方案。

姚桐枝代表姚家，与政府进行了谈判。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为此事作了批示，姚宅终得回归姚家，姚家人另得政府一套一百余平方米的住宅。

趁姚宅修葺之机，姚家将占了他们“鹊巢”的几家房客请了出去。其中一户是离休干部，死活不搬，政府给了他两套大房才走人；另一户是借住姚宅二楼北边的热水瓶厂职工周家。周家儿子在80年代开了家小餐馆，小河直街重建，他的餐馆更名“新腾飞”，专做“蒸菜”。因物美价廉，生意红火，店堂面积不断扩展，在此地已雄踞第一。事业发展得如此顺利，不知是否沾了姚家擅长经营的光。

姚桐枝将姚宅重新装修了一番，南面又开了一扇门。于是，他和二哥两家都“独门独户”了。

想到父亲“一辈子不吃酒、不抽烟，不喝茶，不听戏，几乎没有嗜好。平时整天泡在工厂，难得呆在家，也就翻翻账本，打打坐。甚至，都没吃过一只整鸡”，桐枝有不尽的感慨。

十、姚宅的几个巧合

回首姚宅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姚桐枝发现了几个巧合：

一、姚宅位于惠贞桥畔，距三水交汇的会安桥仅百米之遥，恰与父亲名字中的“淼”对应；

二、60年前，姚宅住了父亲和小叔两家，兄弟二人先后入狱；60年后，姚宅又住兄弟两户，至今相安无事；

三、姚宅是当年姚金淼事业顶峰的标志，如今，则是姚桐枝延续姚金淼商脉的见证。

无常的世事，兜兜转转，改变了姚宅的走向。但幸运的是，它终究成为姚家两代人最后的归宿。

1956年姚宅地契

姚宅老墙

姚宅外景

码头作家：“无名氏”蛰居华光桥

一、蛰居码头

1951年6月的一天，杭州郊区华光桥河下15号的大院里，新搬进了一家房客，这是一位卜姓的中年男子与年近七旬的老母及表妹刘宝珠。据房东女儿后来的回忆：“卜先生当时有肺病，搬来时是抬着进来的。”当时的邻居们，无人知道这位卜乃夫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无名氏。他一面调养病体，一面研读历史与宗教。令当年的房东及邻居们不解的是，卜先生病体渐愈后，不仅没参加任何工作，也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除了白天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晚上出门散一会儿步之外，其他时间卜先生几乎闭门不出。他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在香港的二哥卜少夫的接济，还有在上海一家幼儿园工作的妻子刘宝珠的工资。

同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结束了第五次战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停火。小小的华光桥15号，在杭州的卖鱼桥轮船码头旁边，与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有什么瓜葛吗？有！那其中的联系，就是无名氏的成名作《北极风情画》。

抗战期间，无名氏抱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在金九领导的重庆韩国临时政府里从事文字工作，担任过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奭的秘书。正是以李范奭为原型，无名氏创作出了风行一时的小说《北极风情画》，讲述的是苏联西伯利亚境内一个名叫托木斯克的小镇上，一位韩国上校参谋与一个波兰少女之间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1948年韩国独立，李范奭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1951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一年，李范奭正在台湾担任韩国驻所谓“中华民国”的“大使”。如此敏感身份，在如此敏感时期，如果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李为原型的小说显然不合时宜，《北极风情画》只能在黑市出售，一些书摊也在偷偷出租。但再后来，黑市与书摊也都不敢染指无名氏的作品了。

无名氏搬入华光桥的时候，倒并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他反而比较乐观。当老舍、巴金、曹禺、冰心等人，因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不安，不得不自我反省的时候，无名氏却依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为正在构思的“无名书稿”后三卷而激动不已。在给二哥卜少夫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最近的生活，真是感慨万千，要写，真是永远写不完。我的灵感永远洋溢着……如能如期完成这个多年计划，我相信无论在艺术上、思想上，对中国和世界总有涓滴贡献——我相信一个伟大的新宗教、新信仰即将出现于地球上。这是一个广泛的人类运动的高潮，我的艺术著作及今后的理论思想著作，主要即在配合且迎接这一高潮，我预觉将有一系列新的名字出现，而我将努力插足其间。”

那么无名氏蛰居华光桥河下一心一意要完成的《无名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该书共分六卷，前三卷在他来华光桥时已经出版。据他自己介绍，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要表现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壁画中表现过的崩山裂岩式的精神状态；第二卷《海艳》写的是“象牙之塔”的境界；第三卷《金色的蛇夜》是反叛时代的地狱的激情。《金色的蛇夜》是他居住大陆期间公开出版的最后一部书籍。

无名氏虽然不能算政治眼光十分敏锐，但是在“胡风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他的头脑终于清醒了。他认为必须躲进小楼，做些外界认同的好事才更加安全，所以在1956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他“一声不吭”，写出了18万字的《我是怎样养肺病的？》，接着再写一本《大众作文入门》。两书的出炉，犹如两面盾牌，掩护他在其后三年写完了探索神的境界与宗教境界的《死的岩层》，和直追空灵的星球境界的《开花在星云之外》。到了1960年，

“三年自然灾害”使大多数人为求得果腹、增加营养开动脑筋，无名氏却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及其《欢乐颂》的光明感，写出了第六卷《创世纪大菩提》。写完此书最后一个字的搁笔之时，正是1960年5月4日青年节，无名氏清晰地记得这个时刻。全书六卷，260.4万字，能够完成实属幸运，它令无名氏欣喜若狂：“我终于获得新的生命。”

二、邻居恩怨

为完成巨著，求得“独立王国”的安泰，无名氏对所有来自外界的侵犯都采取唾面自干、绝不还击的策略。在蛰居的30年里，他的隐忍功力已经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超强境界。芳邻的关爱，于他是意外收获，因为他没有奢望；恶邻的欺辱，他亦处之泰然，因为他心中另有梦想。

房东傅瑞禾，是杭州绸业银行总经理兼丝茧厂老板。傅有一位同乡至交何燮侯，是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的“民革”领导人，曾到无名氏府上拜访，见他一屋子图书，谈吐不俗，便邀他出山当助手。无名氏称病谢绝，说：“肺病才趋稳定，病愈后会前去拜访，再追随左右。”因何先生对无名氏高看一眼，傅自然更加敬重这位当时才三十来岁的青年才俊。有一天，傅瑞禾派大儿媳去请无名氏到他的小洋楼做客，取出他舅佬送来的御茶招待无名氏。傅老是旧社会过来人，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第二个妻子是西湖边翁家山人，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享用御茶的先天条件。傅老招待客人有三部曲，他先对无名氏讲“茶经”，说这份茶的来之不易，“翁家山我舅佬对我说，龙井18棵御茶树，十四五斤茶叶，现在规定要上缴12斤，我们自家只能留两三斤。姐夫，往年你要三四斤，我们都可给你，今年最多只能分你半斤，要的亲亲戚戚朋友太多，僧多粥少啊”。之后，他才转入泡茶实际操作。用备好的雨水倒入瓦壶，木炭烧火煮水，水沸后让儿媳注水于放了茶叶的盖碗瓷杯。傅盖上杯盖，稍盖即开，解释说：“盖得稍久，即伤茶色。”

无名氏回忆：“至于茶味，其清醇爽口令人遍体皆爽，说不出的舒适。我不禁赞不绝口：‘傅老！这真是天上神仙饮液，非人间凡品啊！’”

“宝剑赠英雄，佳茗送雅人”，于是引出傅老待客的第三步，“来，我还为你准备了两小包，带回去，再泡两杯，享受享受吧！”

直到晚年，无名氏还记得傅老这一杯茶的温暖，除了追慕他温良恭俭让的古风，也因为无名氏当年夫妻两地分居，亲情缺失，感情荒芜。在寂寞的旅途上，能得到一声问候，于他都是珍贵的慰藉，更何况一杯珍贵的狮峰龙井？借孙犁先生的说法：“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噩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

无名氏于1954年与表妹结婚，对方工作在上海，只在暑假、春节回杭州，加上他的探亲，每年相聚时间不过两个月，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常有相思之苦。不过夫人容许他长期不上班，专事写作，他对此也颇感满意。但“文革”中他含冤入狱一年零三个月，出狱后，夫人迫于组织压力，不得不与其离婚。

华光桥大杂院有新屋旧宅二十余间，邻居有一二十户。无名氏入狱期间，恶邻吴家连他家中的晾衣竿也不放过，拿去劈柴生了煤炉。他母亲去讨公道，吴家说竹竿要积灰尘，不卫生。

出狱后，吴家对无名氏依然强凶霸道。吴家蛮横的原因是：一、无名氏甘居人下，逢恶不抗；二、无名氏长期不工作，与他们生活方式不一样，他们视之为异类，看不惯；三、1969年无名氏以“反革命罪”入狱，政治地位低人一等。

到了“文革”后期，社会已强烈厌倦相互揭发、告密、派系争斗，渴望结束动荡回复秩序。待业青年也开始有的学习英语，有的练习书法，那些旧学根底深厚的老先生也重新获得

尊重。有关资料称 1976 年拱墅区文化馆举办书画展，无名氏也位列其中，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无名氏做过北大旁听生，精通写作，研习过书画，于是有许多青年人投到他门下，学习书画写作。

有一位小陈在“文革”时期曾是著名打手，此时也拜无名氏为师，恶邻对老师的欺辱，小陈看在眼里，怒火中烧。邻居中待老师最粗暴的是吴家，考虑到吴家老头年事已高，经不起打骂，其女固然泼辣，然好男不跟女斗，吴家小儿子精通拳术，一言不合就要开打，若与他硬碰硬，难免两败俱伤，最后小陈决定旁敲侧击，使出“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招数。一日，他找到另一个平日对无名氏不太客气的邻居，挥起一拳，打得那人鼻血满面，然后厉声警告：“从今以后，再有哪一个敢欺负我们卜老师，我就要他的狗命！”他放开嗓子敲山震虎，使骄横跋扈的吴家老小全体龟缩，再也不敢寻事。

吴家本可以做到斯文有礼，举止有节，但生活的剧变，使他们的精神也发生了改变。吴家的老太爷曾任中央银行浙江分行科长，兼任中央信托局某科科长，抗战后负责接收敌伪在杭州的房地产，全家住过水陆寺巷建有亭台楼阁的豪宅，用过多达 11 人的仆人。但“三反”、“五反”时吴老头被查出了问题，不得不上交了埋藏在地下的金条及存在银行里的成千上万的美钞，换取了宽大处理。退休以后，每月只能领到 22 元退休金，全家的生活好比从天堂跌进地狱，只好通过各种途径发泄忿懑之情。无名氏以小说家的洞察能力，体察到他们的心态，所以也就不多计较。

1977 年，无名氏的老母仙逝，此后他在大陆孑然一身，再无牵挂。凭着兄长的海外关系，无名氏于 1983 年到台湾定居。在他赴台前夕，学者丹晨由高松年先生陪同来到华光桥河下 15 号，拜访了无名氏。丹晨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了回忆文章，记叙了如下场景：

这是一座老式的民居，原来可能是一家大户人家留下的。现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好几户。进门是座花园，有一方水池、桂花树、月洞门、假山……只是有点久无人收拾的颓败景象。无名氏就住在抄手游廊旁的厢房里，椽柱的木头坚实油亮，显然是有年头的老房子了。室内陈设却极简陋，除了床铺桌椅，看不到有什么藏书、衣物和别的装饰，一派清贫的样子。

无名氏戴着一副眼镜，瘦怯怯的，很斯文温和，说话轻声细气，给人诚恳的感觉。他长得比较年轻，看似五十岁左右，实际却已六十六岁了。

他说，他出生在南京，祖籍是山东，1946 年起先后与老母一起定居在杭州。与林风眠、赵无极等大画家是好友。他在 1949 年前出版过十部书，约计 160 万字。1949 年后，出版了五本书，都是偷运到境外去发表的。

1958 年，有一天半夜 12 点，公安局忽然来人到他家搜查，然后他被送去蹲了 37 天学习班。原因是“莫须有”。1960 年，他又被遣送去“光荣支农”。在农场劳动一年多，每月发 13 元生活费。他写过一篇关于市商会历史的文章，两万多字，在浙江省政协编的《文史丛刊》上刊登。1966 年 8 月，“文革”发生，被抄家，家里的书都被抄走。他“采取拖延软磨的对策，总算把手稿保存下来了”。因当时社会动乱，他预先就把稿子转移隐藏起来。1968 年 6 月 30 日，又被拘留了一年零三个月，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起因是受一位朋友的株连，那位朋友想偷渡去澳门，到他家住了两天，经他劝说，终于打消了这个想法去了上海。1978 年平反。

从 1946 年 4 月 13 日迁居杭州，到 1982 年 12 月 19 日离开，前后 36 年，无名氏是在杭州度过的。初来时还未到而立之年，离别时已年近古稀。

三、移居台北

1985 年 5 月 19 日，移居台北的无名氏与他的崇拜者、27

岁的马福美小姐举行了盛大婚礼，政界名人黄少谷、蒋纬国亦到场祝贺。马毕业于台北师专音乐系，曾得过台湾电子琴大赛冠军，她几乎通读了无名氏的所有作品，倾慕之至。但 10 年后，因性格差异，两人感情宣告破裂。此时的大陆政治环境逐渐宽松，无名氏的小说

《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纷纷出版。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都对其作品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去世前一年，无名氏在杭州度过了中秋。

2002年10月11日凌晨，无名氏因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86岁。马福美并未出席无名氏的葬礼，心怀怨愤的她此后出版了一部《单独的新娘》，记叙她与无名氏的恩恩怨怨。书中大曝隐私，并随书附送了一张她偷录的无名氏与杭州某情人“西湖女”的情语CD。

无名氏的传奇，在他身后仍未结束。

码头一家亲：两代女子的饭碗

一、小凤的第一只“饭碗”

小凤11岁的时候，父母给她安排了一只“饭碗”，送她到拱宸桥堍的“竺记”杂货铺做“童养媳”。进了铺子，每天环绕她的是香香甜甜的桂圆、红枣，用不完的针头线脑，临街柜台竹丝匾里放着茶叶。但是小凤很快明白了，这些好吃的东西是卖钱的，不是给她吃的。而她在余杭乡下的老家，那几间黄泥巴糊起的茅草屋，她是再也回不去了。小凤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已经是“老公”的人了！晚上闷在被窝偷偷哭过几场，早上还要没事一样，去炉边用小柴引火烧水做饭。

在没有真正嫁给少东家以前，小凤在“竺记”杂货铺的地位就相当于一个雇工，脑瓜灵活、拾掇家务麻利是个基本条件。婆婆当然也在观察这个未来儿媳，小凤虽然身材瘦小，但力气不小，像切鞋底这些活计一教就会，而且干活自觉，无须大人去催。婆婆的眼光就像个电闸，稍稍一扫好比电闸一推，逼得小凤马力十足，手脚勤快。养到十六七岁，小凤顺理成章成了竺家的儿媳，竺家省掉了啰啰唆唆的彩礼钱，给家中的独子和小凤换身干净体面的衣裳，这就拜堂成了亲，小两口的日子算是开了一个头。

生下女儿后没多久，小凤的老公、竺家的少东家就病倒了。这场病来得凶险残酷，像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几乎把小凤打到了谷底——两个人还没来得及过上几天好日子，命薄的少东家就拳头一捏咽了气。出殡那天，插在小凤头上的白花瑟瑟发抖，孤女寡母相依为命的惨相使平时粗声大气的婆婆也没了声息。做婆婆的虽说喉管粗犷，平日里喜欢骂骂咧咧，但良心倒不坏。她那粗手把小凤的脑袋箍在怀里，叹口气说：“以后小凤你就做我们家女儿吧！”小凤头上的白花又瑟瑟抖动起来。

唉，婆家不说我晦气败家丧门星，克死丈夫已经算好了，现在要收我做女儿，这婆婆倒还有这么慈悲的一面哪！只是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料理完了儿子的后事，竺家老板娘也心事重重，小凤这个“女儿”，今后的日子怎样过呢？

小凤手脚勤快肯吃苦，寒冬腊月里，就算衣衫单薄也仍然拎着铅桶去埠头洗洗涮涮，刀子一样的北风把她原本俊俏的脸刮得通红。她的种种优点被一个姓张的小伙子，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

小伙子名叫张永泰，是竺家斜对过张记铁匠铺的小铁匠，腰板精瘦结实，腱子肉收束紧绷，年纪比小凤大了10岁。他是海宁人，到拱宸桥西白手起家，开了这爿铁匠铺，到拱宸桥码头停泊的船只，纷纷到他铺子里来订货，生意闹猛到踏破门槛。

码头边船民多，船上用来固定船板的钉子两头尖尖呈n字型，体积大约小手指头粗细，造船修船都离不开它，张记铁匠铺就专打这种“蚂蟥钉”。用蚂蟥命名铁钉，可知它牢固扎实堪比蚂蟥叮人，船家行走江湖要的就是一份稳当。小张和学徒们加班加点朝夕不停，货物还是供不应求。大客户上门向他们订货，只伸出一个手指头“张老板，蚂蟥钉要一件！”一件是个切口，事实上是指1000枚。而且张铁匠也会见机行事，哪怕生意忙歇不下手的时节，碰上谁家办丧事，孝子贤孙要到老张这里订做棺材钉，张铁匠总是以“死者为大”，擦把汗

歇歇手，先做好这笔急如星火的生意，让死者尽早入土为安。新打的棺材钉一尺二寸长，正方形，上头粗下头尖，灰得发蓝，看上去宛如一支粗头尖尾巴的大毛竹筷，敲进棺材，能使棺材严丝合缝。

铁铺与竺家杂货铺近在咫尺，对家有啥动静早就一清二楚。现在小凤失了夫君，好比孤雏单飞，正是“糖炒栗子，难过日子”。而张铁匠一天到晚打铁，6月天在脖子上挂一个拖地的大帆布兜，活像个穿山甲门神捏着个大榔头，埋头生意可耽误了婚事。现在小凤落单，张铁匠如果请人上门提亲，不但解决了自家的个人问题，也是扶危解困雪中送炭，这等好事何不试上一试？这铁匠铺要有个老板娘张罗，操持里里外外，他在火炉前站得就更加放心了。

而小凤对张铁匠也并不陌生，她平时从桥弄街进进出出，都要经过张记铁匠铺的门面房，好奇地朝里望望，堂前四壁烟熏火燎的，全是灰蒙一片。墙上的钉钉钩钩挂满了各色器物样品：有扁的，是铲、锹；有圆的，是钉、钎；有弯的，是刀、钩、火钳、铁耙。大小家什应有尽有，那铁匠铺也就缺个女当家了。倘若有了张铁匠做依靠，捧起铁匠铺“女当家”的饭碗，从此寄人篱下，看人眼色的感觉就一扫而空。张铁匠不嫌弃她是改嫁又生过孩子，特意请了邻居做媒人上门提亲，要给小凤来个明媒正娶，她就更觉郎心可贵。于是简简单单地摆几桌酒，撒几圈“哈德门”，请左邻右里喝几杯老酒高兴高兴，小凤就算过了门。

这个“过门”倒也方便，几步路就走到了对门，也就是从桥弄街北面杂货铺，走进了南面的铁匠铺，从此小凤做起了铁匠铺的老板娘。

二、小凤的最后一只“饭碗”

杂货铺里卖南货干果，整日价有一种凉丝丝甜滋滋的味道。南来北往的客人，进来都要笑脸相对，要寒暄要招呼；铁匠铺就不一样了，味道是热烘烘辣乎乎，铁匠也没工夫多啰唆浪费唾沫星子，他的眼力、脑筋，全用在手中的铁块上。脑子不闲着，嘴的功能相对就减弱了。打铁究竟有什么讲究诀窍，小凤要尽快摸清底细，进入角色，张铁匠娶她过门不光是为了找个伴儿，生一堆孩子，她还要干活操持，担当女主角。

打铁是一门无声无息的艺术，锻打过程无须开口交流，全凭师傅榔头指挥，徒弟配合默契。师傅左手握住鹰嘴钳不停翻滚，右手榔头打到哪里，徒弟的大锤就要正确无误落点在哪里。师傅在墩头上打得重，徒弟就要高举大铁锤狠狠落下来；师傅榔头击打匀称，徒弟的大锤就要稳健地落在同一个位置上。徒弟半点儿不敢偷懒，因为他们知道此锤不重，下一锤铁冷了更累人。猪头型的大铁墩固定在树桩上，师傅的榔头在墩头上连续敲两下，徒弟才会停止击打，放下大锤，一面擦汗，一边帮师傅拉箱。如果要锤打较大铁件，就会有两个徒弟抡大锤，趁热打铁，叮叮当！叮叮当！

连续几个轮回，师傅把成型的铁器放入一个蓄满水的大铁桶，温柔的“嗤啦”一声，一阵白烟倏然飘起，淬火完成。但打成的器物只是毛坯，还要经过磨削、再淬火、上油……才会大功告成！

嫁入张家，小凤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头一件事，就是用小柴引火，发旺门口那青砖垒起的四仙桌大小的火炉，确保张铁匠和徒弟们在七点钟能准时开工。

开工了，她还要配合师徒，“唧咕嘎咕”地来回推拉风箱把手，使得风箱里的风通过管道直达炉芯，催促膛内煤块尽情燃烧，炉灶火焰在劲风中迅速升腾。洋铁皮倒漏斗状的大烟囱，把炉内的烟灰接出房顶外。火从暗红色变成黄白色时，铁条就要一根根放入炉中煅烧，如果时间烧得太长，铁块会熔断，时间太短了，又打不动。看准火候，马上拿起长柄鹰嘴钳，夹出红光满面的铁条，放到齐膝高的大铁墩上开始锻打，短柄榔头叮当骤起，争分夺秒，要让铁块在最短时间内铸型。铁匠铺的气势，有时堪比金戈铁马。

本来小凤以为做个铁匠铺老板娘，可以安安稳稳到老，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锻压机问世以后，费时费力的打铁工艺渐渐让位给机械化制造，铁铺的生意渐渐门可罗雀，好容易来一个生意，还讨价还价地挣不了几个钱。公私合营后，铁匠铺关了张，老张去了建筑公司工作，

干的还是打铁老本行，原先练就的一身本事让他一直干到了八级锻工。当不成老板娘的小凤，也不愿呆在家里光做家庭妇女。她和老张一共生了六个孩子，这六个孩子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特别是大女儿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掏尽他们家多年的积蓄。小凤和老公一商量，“还是外头再找个饭碗吧！”于是经人介绍，小凤进入国营大厂“杭一棉”，做起了幼儿园的保育员。第一天走进高大的厂房，小凤的脚步怯怯的，没想到年纪过了三十，忽然做了大厂的职工，吃起了食堂饭，可以在浴室洗热水澡，享受到职工的劳保福利待遇，真是恍若一梦啊！这只饭碗，给了她 15 年的工龄，还有退休后按月支取的退休金。

三、姊妹花的“小饭碗”

张铁匠家六个孩子，老四是个男丁，学会了爸爸的手艺，最拿手的是打火钳和进户门上的门球。19 岁插队落户去了黑龙江虎林的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城后进了爸爸所在的建筑公司。再说张家五朵姊妹花，大姐到了找工作的年纪，可是她得过肺病，林黛玉似的病病怏怏，只会啃啃书本，干不了重活，哪个单位会收她？居委会几个领导干部碰了头，决定让张家大姐到水文站抄水位，每月补助八元人民币，多少能缓解张家的经济压力。

运河水文站，是一个观测及搜集水文、气象资料的基层水文观察点。张家大姐以前从未接触过这项工作，水位刻度怎么看，记录怎么做？她一头雾水，不过有居委会小李领她进门，连摸带问不怕学不会。

早上八点，出家门朝东走一分半钟，来到拱宸桥西面下口，再往右 100 米，就是水文站的水位表位置了。走下十几步青苔石阶，一根白底红字的搪瓷标尺，附在布满河藻的石墙上，若隐若现反映出今天的水位尺度。水中鱼儿嬉游着，不时啄食着漂浮在河面的水草。张家大姐扎好马步，弯着腰，侧着头，眯着眼，反复观察水位线后，用圆珠笔在厚厚的表格本上记录下当天的时间、天气、水位高度。如果碰到汛期时期，水位涨幅大，监管水位更是耽误不得，因为水位关系到航道、船闸、船行过桥的安全。

梅雨季节，钱塘江发大水，运河水快速上涨，从苏州、无锡开往杭州的客轮无法通过新大关桥，有时只能停泊于拱宸桥附近码头。小小的水文记录，直接关系到运河航运安全。正常情况下，数据可以每周邮寄南星桥，由南星桥水文站信息采集员老吴综合分析以后，把数据报上级部门。遇到异常情况和特殊天气，则要电话汇报，以便上级部门及时发出警戒水位公告。

抄了四年水位，街道看张家大姐做事顶真，而且能说会写，就推荐她到华丰造纸厂子弟学校做代课老师。这是多么难得的一只饭碗！她把抄表的圆珠笔往空中一抛，欢呼一声：“我当老师喽！”女儿的那份喜悦，让当娘的躲到旁边，偷偷抹起了眼泪。可水文站的工作谁来做呢？肥水不流外人田，抄表好歹有个津贴，而且几年后津贴从 8 块涨到了 13 块，这活儿就移交到张家老三手里。

张家老三如花似玉，古灵精怪，但事情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抄了几次表后，她不肯干了。原来每天两次的抄表规定在早上 8 点和晚上 8 点。上午大街小巷热闹非凡，没关系；可是晚上 8 点，路上几乎看不到人。特别是隆冬季节，每天晚饭后干等两小时，就为了 8 点钟抄表，孤身一人出去实在恐慌至极。怎么办？张家老三灵机一动，召来了老五，把一叠厚厚的表格塞在老五手里。老五其实早已知道姐姐的心思，她接过表格，回答说：“好，就我来吧！”从此，读小学五年级的老五开始投入水文站观测工作，同时还承担起了记录地下水位的任务。

记录地下水位，要去“杭棉厂”。走进杭棉大礼堂，绕过围墙来到后门，眼前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废弃庭院，风化的残砖烂瓦布满一地。空地上唯一的一条路，是张家姐妹们抄表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踩出来的僻静小道。后院中心位置有一口水井，石井圈上长满青苔，井圈上面加了像装甲车铁盖一样的盖子，以防杂物掉入井中，污染水质。每次抄表，都要掀开盖子，五妹人虽小胆子倒蛮大，“哐”地掀开盖子，脑袋凑近 60 公分宽的井沿，把 3 米长的一根木尺伸入水井。一会儿，把尺子拿上来，细细端详被水浸湿的刻度位置，记下数据，再

合上盖子往回走。春天万物复苏，小路上常会有花瓣蛇游过，倏忽钻入草丛不见了；夏天能听到各种鸟语；而秋风落叶中的蟋蟀鸣叫，给她带来无限乐趣。张家老五在抄表中悄悄地长大了。

潮汛时期，暴雨来袭，运河水位不断上涨，老五光脚穿一双中帮黑套鞋，顶着风雨照样出发。有时候风太大了，撑伞反而更危险，一次春夏之交，下雨刮风，她一不小心连人带伞被风吹入河里，双手死死抓住木桩，大声呼救，过路人听见了，赶紧把她拉上来。冬天的运河，水位平稳，老五偶尔也会偷偷懒，自家估计估计，写个数字算了，但是隔天必去一次。

“文革”后期的一个秋夜，张家老五孤身一人手持电筒去河埠头抄水位，遇上河边的联防队员正在巡逻。他们警惕性极高，看到河边一支手电筒一亮一暗晃动，以为是坏分子搞破坏，马上在拱宸桥上大叫“有情况！抓起来！把他抓起来……”吓得老五魂飞魄散，扔掉手电筒飞奔回家，“扑通”反锁了房门，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抄水位了。聪明的老六出了个主意，她召集了隔壁的“僵歪佬”、“招妹”等几个邻居，给姐姐结伴壮胆。在路上妹妹还会分发点梅片、甘草等消闲果儿给邻居甜甜嘴巴，算是个慰劳。水文站的抄表工作，张家姊妹前后足足干了10年，直到老五初中毕业，才把这工作转给了邻居摆小摊的人参伯伯。

源源不断的千年运河水啊，你见证了多少抄表人？

张家姊妹花合影

前排左起：老五永珍、老六永珠、祝根娣（小凤与前夫之女）

后排左起：老四永娣、老三金龙、老二银娣、老大金娣

水文站的水文计

码头“小型张”：河埠头

上篇：河埠头轶闻

运河上的河埠头是杭州人胸口青色的胎记，是杭州人隐秘的文化DNA。杭州城所谓“百河千桥万埠头”，说的就是星罗棋布的河埠头覆盖了城市的角角落落。老杭州的道路并不宽敞，货物运输主要依靠水道。人们一般把运河边停靠大客船大货轮及装运货物的场所称为码头，把内河小船停靠的斜坡阶梯，统称作河埠头。在杭州人眼里，一只河埠头，就是一只小码头。河埠头又分作公共河埠头与私家河埠头。运河人家沿河而建的房子后门，推门可见各种大大小小的河埠头。河埠头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一、公共河埠头是宝库

公共河埠头几乎可视作时代的风向标，在那里能够打捞出属于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在“三反”、“五反”的高潮期，深夜的河埠头常会出现一些慌张的身影。他们将某些东西装在黑色的拎包里，或在外裹上旧报纸旧衣服，瞅准四下无人时下到水边，让那些“麻烦”无声无息地沉入水底。那些在黑暗中湮没无闻的东西一般是一些枪支弹药刀剑等物，它们或者是亲属遗留的，或者是因某种机缘而在家中收藏的，如果公开上交势必讲清它们的来龙去脉，而那些东西却是越讲越糊涂的，为彻底免除麻烦，不如干脆就丢给河埠头吧！

“文革”时期破“四旧”，但凡家中存有金银玉器古董字画的人家也是求助于河埠头，跑到那里把东西一扔了之。东西有人扔，自然也有人捡。“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月，挖地三尺寻觅废铜烂铁上交国家百炼成钢成了一种风尚。这时候，有人想到了河埠头。于是水性良好者从河埠头潜入水下搜寻，有的用竹竿绑上吸铁石伸到水底。水底果然有锈迹斑斑的铁器，每每有人淘出一件，岸上“噢……”就是一阵欢呼。

二、公共河埠头是小舞台

所谓舞台有两层含义，第一它在夏夜纳凉时的确是书场。众人在威信高口才好、肚子里装着数十部古籍的骆师傅身边井然有序地摆上竹椅木凳，围成一个书场。至少一半以上的大人孩子都是“赤膊佬”，摇着蒲扇，足蹬拖鞋，脚下燃着粗大呛人的含有“六六粉”农药的木屑蚊香，在熏得蚊子迷迷瞪瞪的烟雾里，听老人家大讲“金台三打少林寺”、“岳飞精忠报国”。强大的气场钉住了过路人的脚步。大书先生的表述有声有色，但要论吓人倒怪的气氛效果，居然比不上非专业演员出身、只会讲讲鬼怪狐狸精空房子刮阴风故事的方奶奶。

方奶奶的要求不高，只要送她一支“飞马牌”香烟或捡五六个香烟屁股给她，她的鬼故事立即开讲。老太太讲的鬼故事为什么吓人？因为那些狐鬼妖怪本来就令人毛骨悚然，更要命的是方奶奶缺牙的瘪嘴巴“啾啾”漏风，讲故事的词儿一粒粒由她的瘪嘴漏出来，仿佛喃喃自语，把人引向步步惊心的场景。再热的暑天，也保你敛汗止暑，舌根发麻。然而怕归怕，听归听，有的小孩子怕得晚上一个人不敢睡觉，但是越怕越爱听，第二天天黑了，照样呼朋唤友，又噫噫跑去了河埠头。

“小舞台”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年月居民家中不通自来水，河埠头一年四季不断人。如果是艳阳高照的大好晴天，河埠头挤挤攘攘，人贴人人挤人，没点儿忍让精神就要演出你争我夺占踏道的闹剧。等到泼妇悍妇铜头碰了铁头，骂得不过瘾就会互相扑上去撕咬扯头发，于是河埠头就变成了看“武戏”的剧场了。

至于在河埠头东家长西家短、传播流言蜚语引发的纠纷就更常见了。比如刘师母挎着大篮子来河埠头洗一个大冬天积存的衣裳，碰到王阿姨的小女儿来汰被面，刘师母说得高兴，就轧起了吴干娘的是非：“干娘昨天轧姘头被她老公二阿弟发现，二阿弟上去撞了干娘一拳头，打了她姘头老公三巴掌……”刘师母正在眉飞色舞，吴干娘老公二阿弟的老婆听到刘师母正揭人隐私，就上去叫刘师母：“牙齿笃笃齐，自家事情先管管牢，你自己不是有相好么？……”这一闹刘师母火了，巴掌要掴对方，两人纠缠不清。马上有看热闹小孩跑到居民区治保主任——一个精明干练的中年妇女家里，气喘吁吁向她汇报紧急情况。而她只需听上三五句话，便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判断。马上扯一扯衣襟向河埠头赶去。治保主任一登场，90%以上纠纷都能摆平。只有一小撮顽固分子好比“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死不倒担。这便要请本辖区派出所片儿警赵某某或朱某某出场。只要他穿着翻毛皮鞋“噔噔噔”走来，再是犟头倔脑的人，在民警同志威慑力极强有如捷尔任斯基双眸的注视下都会心虚胆怯，低头认错并喃喃自语：“我们相信共产党、相信赵同志……”

三、河埠头是女人命运的见证

杭州屏风街社坛巷 54 号(大河埠头)，位于运河支流中河之上。1912 年出生的陈金宝女士，从小在河埠头旁边长大。她爷爷早年开摇丝作坊，后来家道中落，但家中拥有的木船仍然可以租给他人赚钱，一天可挣一块大洋租金。陈女士在河埠头的踏脚上，汰衣裳、淘米、漂洗丝绸。晚上去河埠头从来不需打灯，河埠头石阶两丈半宽，四尺多高，共分七档踏步，每块踏步档哪几块翘哪几块光滑，哪里有断疤哪里有缺口，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住在下焦营巷 53 号的李家外婆，1924 年大年初二生孩子，上午她还挺着肚皮，拎着篮子到河边，举起洗衣棒槌一下一下凿开薄冰，准备洗几件衣裳。这几下破冰的动作惊动了肚里的孩子，她感觉身体已经在发动，就不敢再洗了，让旁边的女人扶她回家。下午孩子就平安降生了，是个女儿，女儿的哭声弱弱的，做娘的对接生婆说：“本来女儿还想再在我肚皮呆几天的，哪晓得去河埠头汰汰衣裳，好比为我打了催产针，催她快点落来！”小毛头的外婆在厨房捞起了一碗清汤挂面，撒进红糖，端上来：“来，又驱寒，又暖身子，快趁热吃！吃了好有力气喂伢儿奶吃。”河埠头洗衣催生其实并不夸张，更夸张的是有勤劳的女人直接把孩子生在了大冬天的河埠头，一时叫不到帮手，就只有自己咬断脐带，抱着伢儿回去。因为在冰冷的冬天降生，伢儿成年了也不怕冷，大冬天可以穿单衣踏着三轮拉煤饼，俗称“蒸笼头”的脑袋上热气盘旋，体内火力强旺。

因为河埠头女性多，青年小伙子总愿意往那里多看几眼，如果有心上人在那里操劳辛苦，爱屋及乌的小伙子对河埠头也牵肠挂肚，没人时到那里站一站，看看河水发发呆。像下焦营巷的海民，因为“吃对”住在三佛厂口的胖姑娘卜佳英，常捧着饭碗捏着筷子，在离家不远的河埠头等佳英。佳英18岁就统管家务，对为人忠厚的海民也有意思，她算准海民上河埠头的时间，就在篮儿里放点东西去河埠头，名为洗刷实则约会——家里要洗要汰的东西有的是，要找几件，还不便当？

河埠头可以发蒙爱情，但决非滋养爱情的风水宝地。爱情要生根发芽，只有从河埠头走向电影院、公园、西湖边，而海民和佳英也确实一道走进了电影院，同时还带上一个十来岁的邻居小孩阿标。当时的青年男女找对象总是怕难为情，好像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个小孩夹在中间，反而可以让他们说说笑笑更加自然大方。但是事情偏偏就坏在孩子嘴里。爱打听他人隐私的隔壁邻居套阿标的话，让阿标说说大哥大姐带他去干什么，阿标老实说：

“看香港电影。”又问他大哥大姐做了什么，阿标说：“佳英姐剥香榧肉，塞到海民大哥嘴巴里。”

这番话传到佳英娘的耳朵里，佳英娘火冒三丈。她根本看不起海民一家，海民人又老实显得“木”。所以平时就凶悍霸道的佳英娘不但让佳英跟海民断绝来往，而且连河埠头也不让佳英去了。河埠头上，再也看不到佳英的影子，海民三魂就像丢了两魂半。后来听说佳英为了他跟家里吵翻了天，海民上门解释，才说了几句话，佳英娘一个巴掌打得海民热泪横流。事情闹大了，居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平……一段在河埠头生长起来的爱情，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海民看到河埠头就会发呆，因为，那是他的伤心之地。

四、河埠头是接神灵、送鬼魂的地方

运河上以比较大的河埠头为圆心，划一个方圆几里的范围，在某条弄堂深处或某个茶馆的常客之中，总能找到个把会关肚仙、通神灵、驱鬼魂的权威人士。特别是在解放前，家里有人病倒，求医请郎中是第二步，请个会做法的巫婆神汉来施展神法，驱赶妖魔倒更重要。

“术士”请神送鬼的场所往往选择视野开阔的河埠头，只见河水无声静静流淌，普通人肉眼无法看见的大神小妖也许就在水上穿梭往来。隐形的神魔踏水无痕，术士们利用河埠头是水陆交界点的特性，立于其上，营造出仿佛脚踏阴阳两界来去自如的幻象。病人家属与旁观者只觉其人法力无边，河埠头在术士念念有词中显出神秘。

名噪一时的阿陆干娘有专门的祭祀服饰用于这项工作，她为某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做法，要先穿祭祀服，对着病人手舞足蹈闹一场，再带三荤三素、一壶好酒到河埠头席地供奉，点香燃烛。烛光里她黑色瘦小的身形就代表了神灵，在与妖魔搏斗，在奋力驱赶那些邪祟。河埠头上她大呼小叫的声音又凄楚又有震撼力，老百姓称她在送“夜头鬼”。按照旧时“医巫同源”的说法，那些巫术是否相当于现在的心理干预心理治疗？它有几分合理性呢？很少有人像对待风水堪舆一样，对它作审慎的全面研究。有时病人已经病入膏肓，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家属“死马当作活马医”，让阿陆干娘显显神通。如果某个病人被她歪打正着弄得好转，那就说明她巫术“高明”；如果病人第二天死了，人们就反过来怪那个病人命短，是命中注定要死的，任华佗转世也没用。

五、河埠头偶尔是地狱

河埠头什么时候成了地狱？就是有人失足跌落，活活淹死在水里的时候。那时它在死者家属眼里就是鬼门关。长辈们关照儿孙“河埠头不可乱走近去，河港里的河尸鬼要上岸，要拖人落水！”他们吓人的动机，是要小伢儿敬畏那些公共的河埠头，远离河埠头。因为伢儿河埠头玩耍不慎跌落，捞救不及，小小尸体打捞上岸，家人呼天抢地的悲剧年年发生。

项鹏先生是德胜坝老居民，他家后门就是一个小河埠头。他姐姐小小年纪勤快懂事，才10岁就晓得扫地抹桌收拾家务，餐后家人的碗筷都由她带到后门河埠头洗刷。1948年的一

天中午，项鹏在二楼爬桌翻凳，玩得不亦乐乎。妈妈在楼下问他：“你姐姐呢？还在河埠头汰碗盂吗？”项鹏趴在窗口朝下张望：“妈，水里只有彩色的泡泡，姐姐不在！”当时项妈妈尚未意识到问题严重，待后来问第二遍时，她才感觉情况不妙。项家邻居中有船工出身的“浪里白条”，一听此事马上到河埠头下水搜救。估计项姑娘在洗碗时失足落水，不远处虽有一条船只停泊，但船主中午都在舱里睡觉，姑娘落水无人看见。待到在水下搜到项姑娘，已经气绝身亡。项妈妈看到女儿小小的尸体，瘫倒在了河埠头。

河埠头发生的这些悲剧，使船民驾船停靠河埠时，各种规矩禁忌犹如“江西人卖瓷器——一套又一套”。船碰到埠头，须先退一退再进靠。据说船只直接停靠河埠头，冲撞了河埠头的淹死鬼，他就要找上船来寻替身，所以船要先退再进。倘若船只夜宿河埠头，船上人不可只管自家吃饱，不管水下亡灵。自家吃夜饭时，淹死鬼也饿不得。所以船家倒一点米饭在水里，是对死者的敬畏与尊重，也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种种做法都以确保阴阳两界互不干扰为最终目的。

下篇：建河埠头的讲究

河埠头可宽可窄，既可以伸出驳岸双面落水，也可以小巧玲珑单面落水。最考究的是廊屋式河埠头，晴天晒不到，雨天淋不着，把河埠头的趋利避害发挥到了极致。塘栖地区的河埠头甚至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演青衣花旦，又演小丑莽汉。这是什么意思呢？自小塘栖长大的蒋豫生先生介绍，那里的河埠头由青石、花岗岩类块石砌成，大多分左右两边成梯形。一边是淘米洗菜的清爽河埠，另一边是专洗尿布、拖把之类的邋遢河埠。清爽河埠与邋遢河埠近在咫尺，打成一片。

运河两岸河埠众多，沿河房屋必须造得高于水面一大截，才能避开水位上涨龙王进门的祸害。但房基既然远离了水面，若想再亲近运河水，只有请石匠来修造河埠头，由此拾阶而下才能享受河水的便利。河埠头要造得根基稳当、称心如意，建造工匠要精通木石。木指木料，石指石料。河埠头的平台、踏级、石墙，看似皆由石材组成，但是在看不见的水下，支撑河埠头的恰是深且密的木桩。没有它做无名英雄，也就没有河埠头的风光。木与石如何搭配妥当？打桩木料宜选松木。常言道，“千年不烂水底松”，松木油性重，常处水下可保不烂。那些纹理紧实质地坚硬的上等河埠头石料，在杭州地区乃至郊县几乎都找不出，只有不辞辛劳远赴绍兴或者安徽等地才能觅得。有了它们在，石匠心里才比较踏实。

造河埠头，必须用到黏合的灌浇浆。早先哪来的洋灰水泥？老派的工艺是用十几口大锅烧起糯米粥，拌入石灰以及其他材料，连煮两天两夜化成灌浇浆。大凡稍大规模的露天作业，工匠们开工前要感谢神祇的恩惠，祭拜水母娘娘，以祈求建造顺利使用安心。但是在烧粥化浆的大铁锅里投放砒霜，那就颇费人猜测了：倘若避邪，可以投放艾草；倘若讨彩头，不如投放当季花瓣。工匠却要投放砒霜，有什么道理呢？一说是工艺需要而用此独特配方；一说是十几口铁锅同煮糯米粥诱人馋涎欲滴，砒霜一放任谁都心惊胆战，就没人敢偷吃了，而偷吃糯米粥，据说是得罪河神菩萨、水母娘娘的。

运河两岸，河埠头数以万计。但你若看过卖鱼桥边信义巷蔡家石匠的河埠头，那真应了一句老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粗粗一看，蔡石匠家的河埠头没有多少异样，但是走近之后呢？河埠头选用上等的绍兴青石板，用捣衣棒槌轻轻敲打，它会发出“壳壳”的金属声。一块离水面半尺多高，长三尺五，宽二尺五，厚约两寸半的大石板与水面平行，形成一个爽亮的石板小平台。平台两边翘起约半寸，可以遮挡零碎什物；左上角一个拳头大小的洞，有船来时拴系缆绳，船只不来就做了洗衣棒槌的插孔；左侧一组三角形突起，洗衣擦布正好借力；右侧一个浅槽，供人放置刀具肥皂；青石板中央，阳刻四个大字：“财源广通”；周边的云纹粗细不等，看似为了漂亮，实则意在防滑。

平台上的踏步档，一共 12 级。扭头细看旁边石墙，墙面纹理色泽基本一致，块石大小基本相同。每块石头的中心，石匠的凿子工整地阴凿了小巧玲珑的图案：四时水果、五谷杂

粮、花鸟鱼虫；每级踏步档中央，都刻着一朵荷花，因为荷花亲水，不怕水浸。石墙上面，挖出了斜向排列的若干凹扣，让老人小孩上下时有个抓手。石匠业的行话：“造桥最难，造牌坊第二，造河埠头容易。”但是河埠头与河埠头终究是不一样的，蔡石匠家的河埠头，已经达到水乡河埠头的极致。

石匠家河埠头虽好，但房屋狭小，家具也比较破旧。老石匠过世，他老伴守着老屋，视墙上挂着的帆布袋子为珍宝，谁都不能乱碰。小辈们心中有数，那袋子里只是放着几把擦得光亮的钢凿子和劈子，却曾与石匠爷爷相伴一生。奶奶把它们视为传家之宝，每到黄梅天晒霉季节，她照例要取出袋子里的工具，一样样摊开晒太阳，为它们擦锈，上油，使它们保持光亮如新。这些工具，收纳了石匠当年开工下锤的精气神，见识过江南水乡多多少少朴素美好的河埠头。

物换星移，运河整治填平了许多支流河道，抹去了诸多河埠头，有的河道改造成了大型下水道，只留一块路牌或者一个空名任人遐想。大河埠头的青石条，被人挖去造房子、建墓穴、修凉亭、建土高炉、修桥铺路，或干脆就地砸碎当石子用。

旧的去掉了，新的莫非就不来了么？不，河埠头是生生不息的。小河、半山一带居民临河再造敞亮楼房，他们总不忘浇筑一个河埠头。有的是钢筋混凝土浇筑，有的是原汁原味的青石板。汤汤河水中，河埠头是江南的休止符，是江南的逗号或省略号，石缝中勾抹纵横的深绿青苔像大大小小的绿色嘴唇，年年岁岁，长歌不息。

家家踏级入水，河埠捣衣声脆

单落水河埠头

突出驳岸、两面可用的外双落水河埠头

撰稿手记：

要翔实，也要好看.....安峰

一、一部书

本书写作之初，一部大师之作在我们写作小组中间传阅并引发讨论，那就是美籍华人黄仁宇的历史巨作《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写的是明朝旧事，黄先生凭借大量的阅读积累，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爬梳剔抉出一根根线索。“（《明实录》）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耗费功夫之大，钻研之深，在写作态度上为我们树立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标杆。

通观全书，对于细节可谓极端重视。苏俄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一个恰到好处的细节可以使读者对整体，对一个人物，对他的处境，对事件，最后对时代产生一种直觉的、正确的概念。”黄仁宇写到明朝皇帝登基以后，还要参加每月三次的名为“经筵”的讲学，“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

种种看似无关大局的毫末枝节，却使文章充盈饱满，信息丰富，且便于调动节奏，制造出抑扬顿挫的美感。这部著作，也几乎成为我们写作本书的教科书。

二、一比五原则

一比五写作原则，是我们在写作当中逐渐摸索而得。意思是落到纸面上的文字，背后有五份以上的素材作为支撑。一个重要细节，背后有五个相关细节作或隐或显的支撑。如此，整个作品才会显得骨骼匀停，肌肉丰满，姿态舒展。

举例而言，我们写到1972年尼克松访问杭州之前，为了方便起降尼克松的大型波音客机，政府紧锣密鼓扩建杭州笕桥机场，把拱宸桥码头当作了运输石子等建材的后勤基地。我们写的是码头，着眼点是在码头挑石子的卸运过程，但为了落笔时做到“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我们查阅的背景材料，涉及了《尼克松回忆录》、陈敦德的纪实作品、1972年2月本地媒体对尼克松来杭的报道以及当年参与接待的工作人员的回忆，此外还采访了参与过扩建笕桥机场人员的后代。这些素材，绝大部分没有化为文稿，但却仿佛一大片营养丰富的肥沃土壤，为最后的成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

一比五原则当然只是个大概的约数，一个码头的历史脉络，往往需要理清多个关节点。比如作者撰写《姚宅七十年》，要摸清解放前小河地区首富姚金淼的产业在公私合营后的流变，不得不对1956年底基本完成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家赎买政策深加探究。当年国家对收购的私股实行了定息制，年息几厘？时长几年？资本家小业主的工作怎样安排？历史大背景落实于不同个体，又有怎样的差异？一旦扎进故纸堆中，那真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当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资本论·跋》）

有作者因时间安排上的冲突，没能参加区里组织的码头原住民座谈会，就专门花去几天时间，把10场座谈录音从头到尾听一遍。写作中，几种材料互相参看，不但有助于整理出新的思路，同时也便于纠正错讹、查漏补缺。比如在《姚宅七十年》的相关原始采访记录中，有这么一条：姚金淼的弟弟姚金录在“肃反”中被捕，送往青海，“与黄维、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战犯关押在一起”

。但是深入了解黄杜两位的生平，发现他们的关押地是在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如果再要逐年核对他们的行踪，势必耗费更多的精力，所以这条口述材料只得弃而不用。一比五原则的运用使我们尽量避免错误，然后再争取写得好看。

三、一种观念

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在序言中点破了他的写作目的：“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具体操作上，他是“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高屋建瓴，气势不凡。

以我们薄弱的学力，要在本书中提出统摄全局的高深思想观念，显然力不从心。但是能不能选择一种有意味的叙述方式，使人既得到阅读快感，又有所体悟呢？这不妨看作是一个值得孜孜以求的目标。新改版的《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有三个主题词，“真相，趣味，良知”，可以说与我们的写作观念十分契合。解读历史，不仅是为了寻求真相，诉诸良知，也要能从中得到乐趣与回味，这是思维的乐趣，也是人生况味的品尝。那么，以何种方法入手来完成这项工作呢？简而言之，我们的方法是“发现空白”。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说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

发现空白，就是找到鲜为人知的事实，就是在事实中找到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揣摩玩味，再加以解读。甚至，还要在无字句处说出意思。我们试图让这种方法的触角，伸到书稿的各个神经末梢。

比如“码头行当”，写的是迫于生计逼出来的“偏门行当”，捡拾的是码头人的生存智慧；比如写“洋关码头”，避开了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从微观的四份旧档案入手，解读隐藏其间的管理精髓；甚至，更有作者在拱宸桥大同街40号船埠，挖掘到被浙江巡抚府保送去北京陆军部速成学堂的40个学生的行踪。其中有一个20岁的蒋志清，也就是后来搅动中国现代历史的蒋介石。（《客运码头（上）：旧船票与卖鱼桥》）

这块尽力耕作的“空白之地”，能开出鲜艳的文字之花吗？这，只有静聆读者诸君垂教了。

2013年2月18日，于杭州梧桐公寓

>>>>> 撰稿手记：要翔实，也要好看

后记

经过无数次的修正和打磨，《运河南端说码头》一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拱墅区各界社会科学、人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士及文化工作者们经过半年多时间细致扎实的求索和艰苦不懈的努力的结果。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贯穿南北的大动脉，具有交通、水运、灌溉等多种功能。运河沿岸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沿河兴起的城镇、仓库、船闸、桥梁、堤坝等各类建筑，形成了世界罕见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尤其是那些历经时光雕琢、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运河码头、临水河埠、石阶等文化遗存，不仅目睹了千百年来运河人家的悲欢离合，见证着运河沿岸城市商贸的兴衰，更像是运河的脚注，无声地阐释着运河两岸的历史沧桑和民俗风情。

一千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在其蜿蜒流经杭州的旅途中，拱墅区占了绝大部分。于是主动承担起挖掘、整理千年大运河历史遗存的任务，以真实的文字图片来填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空白，是拱墅区委、区政府认为顺理成章、责无旁贷的工作。

拱墅区委、区政府对这本书的编写空前重视，自2012年6月确定写作项目后，区委书记许明同志亲自挂帅，多次召集区四套班子联席会，成立分工明确的编辑委员会，听取各项目责任人的采编进展汇报，还专门邀请专家顾问分别召开《运河南端说码头》编撰工作座谈会和“运河拱墅段码头河埠文化研讨会”，共同为此书的编撰出谋划策，并指定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督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实施具体业务。期间，局领导班子成员把本次工作任务当成一次科学、严谨的文化实践，多次带队深入基层，组织辖区10个街道的分管领导和文化干部召开调查会，落实本书的具体采编工作要求；普查、采编人员们不辞辛劳和酷暑，奔波在炎炎夏日的杭城，以各社区了解运河历史的老人、省内外运河历史专家和运河沿岸的老居民等群体为普查、访谈重点，多次召开专家学者研讨会、群众座谈会，并进行个别访问，从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线索。此外，采编组也根据普查调研情况和采编构思情况，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实际工作，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使本书的资料收集、史料考据、编纂构思等阶段性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带领采编组开展工作的安峰同志，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无论是烈日酷暑的前期调查，还是寒冬腊月的后期编写，他都亲力亲为，一场不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本书的编撰中。在他的影响下，其他采编组成员也更加积极努力，特别是后期重点对象入户调查时，不厌其烦地寻根问祖，深挖当事人，深访当时事，甚至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三番两次去码头体验生活，多次往返于档案馆、图书馆等部门查找资料。

尽管本书的内容只选取了大运河拱墅段的几个节点，我们却期望能够实现“用活‘字儿（资料）’、写透‘事儿（故事）’、突出‘味儿（韵味）’”的编撰初衷，为运河申遗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同时，也向先人开凿运河的智慧和孕育出如此璀璨的运河文化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运河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当许多美好的东西与我们渐行渐远时，我们无法穿

越时空一一还原，但我们可以留下记忆，在回忆中细细品味它的存在，比如运河南端的众多码头。

本书的出版和编辑，得到了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杭州海关、浙江东方嘉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粮食局义桥仓库、中石油杭州小河油库等单位的通力协作，拱墅区各街道党工委、文化站的鼎力支持，沈祖安、丁云川、仲向平、汪宝焕、吴理人等专家、学者们的诚挚指导，以及基层 92 个社区、全体文化工作者、非遗保护志愿者们的积极参与，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3 年 2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运河南端说码头/许明主编.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33-1198-4

I. ①运… II. ①许… III. ①码头—历史—杭州市 IV. ①F5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3813 号

运河南端说码头

许明 主编

策划统筹：陈卓

责任编辑：陈卓

责任印制：韦舰

封面设计：金剑奇

版式设计：刘洁琼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本：720mm×1000mm 1/16

印张：13.5

字数：130 千字

版次：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1198-4

定价：3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